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世界古代前期军事史

 **eBOOK**  
网络资源 非纸质

## 内容提要

军事史是国家产生以后才形成的历史。在最早的奴隶制国家里，军事战争构成了从奴隶制城邦到一统大国，最后达于帝国发展史的强有力的主旋律。古代中国很早就形成了自己一套完整的征兵、教战、征战等军事制度；古代印度较早出现人道主义军事法规；地处近东多事之地的西亚、埃及在上古时期更如当今世界一样时局动荡，英雄辈出；从希腊文明到孕育到古罗马的伟绩，西方军事艺术达到了古代世界前所未有的高度，提供了在尚不知如何使用火药的时代所发明的最完善的一套步兵战术。本书就是以此为主要内容，注重中西文化比较，分章描述了古代军事文明的伟大成就。

本书西亚、埃及部分分别由丁迅、朱海忠执笔编写了其中战事部分内容，古代中国部分是由康德文执笔完成的。

## 一、概 述

### 1. 古代世界军事文明的巨大发展

在古代社会的早期，人们在世界领域内的广泛来往和交流是不存在的，他们只能生活在自己周围的狭小区域内。即使建立起疆域广阔的奴隶制大帝国，他们也主要生活在自己所创造的文化氛围之内，与创立另外文明的其他民族之间的交往是很少，甚至不存在的。但就在这种有点相互隔绝的环境中，古代的人们创造的军事文明却沿着相似的发展规律前进，东西方社会都对古代军事文明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兵制建设上，最早产生的兵制是公民兵。公民兵的主要特点，一是只在战争需要时服兵役，这既是公民的权力，又是公民的义务。一旦战争结束，则解甲归田，重操旧业；二是自备武装，除长期对外作战外，一般没有薪俸。公民兵的征集，在氏族社会按血族征集，国家产生后按地区来征集。从中国西周的乡遂制度到雅典的诺克拉里兵役制，都是按地区出兵的。西周的六乡六遂各有 1.25 万家，每家应征一人服兵役。雅典最初 4 个部落各有 12 个诺克拉里，每个诺克拉里提供一艘舰船（配备以武器和船员）和两名骑兵。当后来德莫代替诺克拉里时，部落和德莫则变成了兵役制。克里斯提尼时代，雅典的 10 个部落（起初共有 100 个德莫）各提供一支步兵队和一支骑兵队以及五艘配备有船员和装备的舰船。

雅典和罗马的公民兵，按照财产的多寡还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雅典分为四等，罗马分为五等，骑兵、重装步兵和轻装步兵分别由不同等级的公民担任。罗马的等级公民兵制很快在几次改革中消失了，而雅典的等级兵役制却保持了很久。

公民兵（或称民兵）的特征，在西方的希腊、罗马等城邦国家表现得较为典型，而在东方君主制大国里则表现得不甚明显。但总的说来，各个民族都经历了一个从公民兵到常备军的发展过程。

常备军是适应频繁战争的需要而产生的。世界上最早建立常备军的是古代两河流域阿卡德国王萨尔贡一世（公元前 2371—前 2316 年）。他拥有一支靠国家供养由 5400 名士兵组成的常备军。在埃及的中王国时代（公元前 2133—前 1786 年），在国王周围已有长期伴随他的近卫队。埃及常备军就是从这种近卫队逐渐发展起来。作为常备军，必须脱离自己的经济，其中大部分是职业兵，退役后有可能领到一块份地。亚述帝国在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时代（公元前 746—前 727 年），开始实行募兵制，军队的装备和给养由国家供给，建立起一支正规的常备军。印度在列国时代（公元前 6 世纪到公元前 4 世纪），各国国王们也都建立起包括象兵、车兵、骑兵和步兵的常备军。希腊、罗马的常备军出现较晚。尤其是罗马，在经过马略军事改革（公元前 107—前 101 年）实行募兵制后，到公元前 1 世纪末的奥古斯都时代才建立起正式的常备军。

雇佣兵是为了获取一定数额的薪饷而应召的志愿兵。志愿服役的常备军也有薪饷，而获得薪饷的雇佣兵有的也长期服役，但常备军基本上是本国公民，是为本国利益而战；而雇佣兵大多是为外国雇佣，在他们之中，有的是单个地被外国招募，有的是自己组建一个军团而受雇于外国。他们唯一的目的是赚钱，或为了谋生，至于同谁作战，概不关心，与自己的同胞交战在古

代世界也是经常发生的。早在中王国时代，埃及就把从努比亚招募来的雇佣兵编入自己的军队。到新王国时代又有发展，包括从努比亚、利比亚、小亚和地中海地区招募来的雇佣兵。在古代希腊，雇佣兵最为盛行。特别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由于奴隶制的发展，社会分化的剧烈，许多小生产者纷纷破产，沦为无业游民。这些无业游民在无谋生出路的情况下，往往选择为他人当雇佣兵这一“卖血”的职业。

在兵种建制上，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兵种，主要是步兵和骑兵。在农耕民族那里，最早出现步兵，在游牧民族那里，最先形成骑兵。战车兵出现较晚，主要发生在东方君主制国家。希腊、罗马不知道使用战车，骑兵也很少，陆军主要是步兵，而且他们把步兵分为轻装和重装两种。

战车最先出现在古代两河流域。公元前 26 世纪的乌尔军旗上展现了苏美尔人的四轮战车，只是用两头驴拉的，因而无论从机动力还是从冲杀力来说，都远逊于二轮马拉战车。后一种战车大概是最早由赫梯人或希克索斯人发明的。希克索斯人至迟在公元前 18 世纪侵入埃及时已使用了二轮单辕的马拉战车。虽然我们不知赫梯人开始使用战车的具体时间，但至少是与希克索斯人同时或更早。埃及从入侵的希克索斯人那里接受了他们带来的战车和马，并迅速发展起来，使战车兵成为古代埃及最有力的作战兵种。由于战车兵的战斗力和在战车上作战相对比较安全，因此在古代亚非诸国，它是最受重视的一个兵种。古代中国衡量国力时，常常以战车数量为依据，例如“千乘之国”或“万乘之国”。周代作战就是以战车为主力的。一军为 500 乘，作战时 25 人为一组，配备战车一辆，共 1.25 万人。亚述人也很重视战车，只有国王和高官显贵才能乘战车作战。在亚述，只有当马鞍被发明后，骑兵的战斗力和地位才大大增强，到萨尔贡二世时代（公元前 721—前 705 年），战车兵的地位才下降了，战车的数量大减，骑兵的地位明显超过了战车兵。

象兵作为一个兵种只存在于少数产象的地区，例如印度和非洲，还有希腊等少数国家。在印度，象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兵种。一只大象背上的方箱（如同塔楼）里一般盛有 3 名弓箭手，其中 2 名从侧面射击，一名从后面射击。有时战士们是持矛作战。还有一名驭者坐在方箱前面（外面），驾驭大象的前进方向。希腊国家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就曾用 20 头大象组成的象牙部队打败过罗马军队。

工兵和辎重兵起初在古代的许多国家中仅仅起着作战兵种的附属作用，并没有作为一种独立的兵种来用于战争。在亚述国王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时代（公元前 746—前 727 年），工兵和辎重兵才作为一个兵种独立运用于战争。

以上所列属于陆军的步、骑、象、战车、工兵和辎重兵等 6 个兵种，在古代世界是最基本和最主要的兵种。此外，还有海军。海军对某些沿海国家来说，甚至比陆军更为重要。如地中海的迦太基和腓尼基的国防以海军为主。希腊的雅典也建立起强大的海军，作战时往往以海军作为主要兵力。

世界上最早的一支舰队大概是属于埃及的。在古王国时期第四王朝的斯尼弗鲁时期（开始于公元前 2613 年），埃及曾派出一支由 40 艘舰船编成的舰队去寻找雪松树。在第五王朝时期（约公元前 2498—前 2345 年），埃及已出现了南北“两大舰队”。在地中海克里特岛克诺索斯城建立米诺斯王国的米诺斯，在希腊，据传说，是第一个组织海军的人。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海上远征也发生在希腊，这就是迈锡尼文明末期（约公元前 12 世纪初）发

生的著名的特洛伊战争。据传说，这次希腊远征的舰船共有 1200 艘。在西部地中海的海上强国迦太基，其舰队的数量多达 350 艘，曾经控制着西部地中海。但是后起的罗马为对付迦太基的海上势力，新建了一支海军，米列海岬一战，大败迦太基海军，决定了迦太基海军覆没的命运。从此，罗马海军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直至它的灭亡。

在兵器衣甲装备上，人类最初使用的进攻性兵器，应该是从原始人狩猎的武器发展而来的。

弓箭的发明是原始社会末期的一场伟大工具革命，它很快就变成了最初战争的有力武器。直到近代枪炮等火药武器发明之前，任何武器也代替不了它的远距离打击作用。古代的弓特别大，亚述的弓有 4 英尺长；埃及的弓为 5.5 英尺；印度人的弓不仅很长，可与持弓者身高相当，而且坚韧难以拉开，射箭时须将弓的一端支撑在地上，用左脚向前蹬压，右手用力往后拉，才能将箭支飞速射出。

矛是古代战争中最普遍使用的兵器，无论是步兵，还是骑兵、战车兵一般都使用它，尤其是步兵最普遍。强大的希腊——马其顿方阵，把长矛的威力发挥到古代世界的顶点。步兵手持长矛组成的方阵，像带无数矛头的一面长墙直压向敌人，很难抵挡。而罗马军团特别善于使用短矛。当冲锋时，步兵先把短矛一齐投向敌人，如下一阵骤雨，即使不能各个击中敌人，也能把敌人的阵形打乱，然后拔出身上佩带的短剑进行肉搏战。

标枪是一种投射性武器，其射程的远近和命中率的大小取决于个人臂力的大小和技术水平的高低。此外，还有很多兵器，如战斧、大刀、短刀、锤矛、圆锤、狼牙棒、弹弓、飞去而来器等等，但其使用都不太普遍。

古代中国早期的兵器，种类就已相当繁多，已有弓箭、戈、殳、矛、刀、剑、斧、钺、戟、戚、斤、戣和瞿等。尤其是戈，为钩兵或啄兵，在欧亚各民族中很少见，为中国独具特色的重要兵器。汉民族经常用“干戈”一词表示战争，充分说明了中国人对“戈”的重视和“戈”的重要性。

盾牌在古代是一种非常起作用的防御武器，形制不一，多种多样。就制造的材料来说，有金属制的（铜、青铜、铁、金银等）、皮革制的、柳条编的、藤制的、木制的、象皮制的，等等，就其形状而言，有凸面的、圆的、椭圆形的、长方形的、半圆筒形的，等等，各式各样；就大小而述，小者只能护胸和面部，大者高过人的身长。亚述人庞大的柳条盾曾在战场上和攻城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衣甲属防护装备。早在公元前 26 世纪，在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的那里就出现了铜制的头盔。例如在乌尔的述巴德王后陵里，就发现有殉葬的卫士所戴的铜制头盔。大约同时代的乌尔军旗上所描绘的出征图上，绘有行军的战士也头戴尖顶头盔。印度在吠陀时代，希腊在荷马时代也都出现了铜制的头盔和衣甲。埃及只有到新王国时代才出现了主要是缝制的头盔，金属头盔很少见。衣甲也是用亚麻等软材料制成的。中国在商周时期已出现铜盔、素甲。素甲可能是皮制衣甲，目前发现了许多周代的素甲，如胸甲、披膊等，铜甲很少。在古代世界衣甲装备最精良的当属亚述军队，他们最早装备起铁制的头盔和衣甲。亚述人铁制或青铜制头盔，分尖顶式和鸟冠式两种。据说鸟冠式的头盔后来为希腊人所采用。

在进行作战所采取的战略战术上，古代西方人在早期特别酷爱运用方阵和三列队战法的军团作战。从希腊人的希腊方阵发展到马其顿人的马其顿方

阵，一直到公元前4世纪罗马最终放弃接受外来的希腊——马其顿方阵，方阵称霸几个世纪。但是最早的方阵出现在非洲的埃及，而不是西方。在公元前1302年发生的卡捷什战役中，埃及人正是利用其方阵打败了与之争霸的赫梯人。不过，埃及方阵注重步兵和战车兵协同作战。在卡捷什战役中，埃及方阵的部署为，第一线为战车兵，作为攻敌的先锋；第二线由10个横排的重装步兵队组成，形成一个密集的阵列向前推进。在步兵队的两翼有战车兵保护，而且这些战车兵还去压迫敌人的两翼；第三线仍是战车兵，作为后卫或用来追击敌人。轻弓箭手穿插在第一、二线中间射箭扰乱敌人阵线。而在西方人那里，方阵只由步兵组成。希腊方阵纵深为8列到12、25列，甚至50列。各横列之间留有距离，在行进、进攻或打击退敌时所留距离各异。方阵是一个整体，由举起长矛组成的方阵像一面带有无数矛头的长墙压向敌人，很难抵挡。希腊方阵后来发展到马其顿方阵，马其顿方阵驰名一时，成为当时所向披靡的劲旅。

希腊——马其顿方阵不适于复杂地形作战。在公元前4世纪时，罗马在高卢战争中险遭高卢人毁灭性的打击，于是罗马人决定放弃接受外来的希腊——马其顿方阵，进行根本性的军团改革，而代之以三列队战法的军团。

罗马军团的三列队战法的战斗形式通常如下：部署在军团之前和两翼的轻装步兵首先投入战斗，向敌人发射箭支和投掷标枪。当敌人逼近时便退至矛兵阵列的间隔处，让第一列的矛兵投入战斗。如果第一列矛兵挡不住敌人进攻，第二列主力兵便冲上来，同矛兵一起形成一条战线，共同作战。只有在前两列战士危急时，第三列后备兵才投入战斗。三列队战法的罗马军团在公元前2世纪的马略军事改革中又得到进一步完善。

由于罗马军团的三列队战法机动灵活，适于各种地形作战，曾在东方战争中大败马其顿方阵，显示出很大的优越性，说明方阵时代已经过去，罗马军团成为一代天骄，一直到罗马帝国后期在“蛮族”骑兵的攻击下失去威力。

印度在古代早期主要采取布阵作战。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东征时遇到的强硬的印度对手波罗斯王，就在希达斯皮斯河边布阵迎战亚历山大。当时波罗斯王所布阵法以大象为中心，排成多列。在各列大象的后面部署着大量步兵，步兵纵队在象群中间向前推进。战线的两翼有骑兵和战车兵掩护。但是波罗斯王的阵法被亚历山大打败。从此以后，布阵战法在印度一般不再采用，而逐渐被机动灵活的战术所取代。

亚述人穷兵黩武，经常无休止地对外用兵。奉行侵略扩张政策的亚述，在作战中特别注重进攻，常常采取突袭或强猛的闪电战术，让敌人无法招架。

相对而言，古代中国人作战特别注重策略。汉民族尤其知道民心向背乃战争胜败之本的道理。每次王朝更替之战，都要先争取民心，积蓄力量，认为得到人民拥护时，才一鼓作气，灭掉旧王朝建立新王朝。

汉民族作战，往往本着“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争策略，尽量把战争的破坏程度限制到最小程度，常常先采取政治和外交攻势，采取劝降和招服战术，让敌人自动奉献城池，归顺自己。如果政治攻略不成功，那只有付诸战争，往往先派密探探晓敌情，然后根据敌情制定机动灵活的战术，做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代很早就出现了总体战争。总体战争在古代既是全部国家机器转入战争轨道，又是一场全民战争。当较小的城邦国家面临强敌压境时，常常采取总体战争，即全民投入战斗。在希波战争中，雅典和斯巴

达等城邦就是全民抗战。希腊的很多城邦不但本邦内全民抗战，而且众多的城邦最终集中在斯巴达和雅典的领导下，结集起来成为坚定的抗敌同盟，把千万个人团结成一个人，克服了自治自给的城邦所拥有的城邦本位主义和个人主义，易使他们在强大的外敌侵犯面前显得像一盘散沙的缺点，终于战胜了貌似强大的波斯帝国，使自己创建的文明免遭外来之敌的摧残。

总体战争是全民投入战斗，这需要总体战争与军事后勤进行协调配合，全面照顾全体人民的生活和生产。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雅典，总体战争与军事后勤严重失调。伯里克利以及后来的雅典执政官克里昂、亚西比得均采取弃陆从洋的战略，让雅典农民放弃家园，到城里去，到海岛去，同斯巴达在海上作战。这是一个涉及全民的总体战略。既然这样，就应该从全民的备战出发，考虑总体的后勤保障。可事实并非如此，战争爆发后，雅典的农村，被拱手让给斯巴达，任其蹂躏。大量的农民，涌入城市，麇集街头，既缺乏粮食，又无安身之处，再加上瘟疫猖獗，给雅典人民，特别是农民带来空前的灾难。结果农民怨声载道，反对战争。谁知后来亚西比得又提出远征西西里，把强大的敌人斯巴达留在了后方，阿提卡的农村很快被占，奴隶逃亡，严重破坏了雅典的经济基础，最终只有向斯巴达投降。

罗马与迦太基进行的第三次布匿战争中，迦太基也是全民动员抗战。迦太基的妇女甚至剪下自己的头发用来捆扎兵器。但是古代的总体战争主要发生在较小的城邦国家，在较大的君主制国家中，人们认为战争是常备军的事，很少发生总体战争。

## 2. 东西方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战争文化观

在古代社会的早期，东西方古典世界由于处于不同的地理位置，发展起不同的文明。

古代中国东濒沧海，西北横亘漫漫戈壁，西南耸立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这种一面临海，三面陆路交通不便利，而内部回旋余地又相当开阔的环境，造成了一种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于是中国发展起自己独特的文明。

中国的地理环境使中国发展成为典型的农耕社会。中国很早就从采集野生植物果实进入到锄耕农业阶段。上古传说的三皇中的神农氏就是因“教民耕农，故号曰神农”。中国的黄河流域培植出了粟、长江流域培植出了水稻，都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农耕中心。

农耕社会存在的基本自然要素是土地、水和气候。汉民族社会以后的一切内容特征均建立在这一前提上。从中国古代的神话来看，盘古开天，神农教民农作，后羿射日，大禹治水，这些故事始终围绕一个共同的造福于农耕社会之民生的母题，故而这些神话透露出远古社会极其重要的一个现象，英雄大多是造福于农耕社会民生的人物。

可是，土地是天然的，气候四时循环，规律所致，非人力所能驾驭，水性虽然无常，但很大程度上可以依赖人力的控制，化害为利，造福农业。水乃农耕之命脉。治理水源，兴建大规模的水利灌溉工程是农耕民族生存的首要前提。诚如魏特夫所言，治理水源是古代中国社会的第一要务，对中国文明的发育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因而在古代造福于农耕社会之民生的众多英雄中，汉民族倾向于崇拜治理洪水的英雄。而这种特殊的英雄崇拜里蕴含着

一种“民本”意识的原始雏型。《史记·夏本纪》就描述了惊心动魄的大禹治水的过程，透射出人们对治水英雄赫赫功劳的敬仰。

希腊位于地中海滨，境内多山，群山把各地域分成许多小块，内陆交通阻塞。海洋性气候恶劣多变，境内谷地、平原又少，决定了希腊人无法以农耕为生。众多的优良港湾和岛屿，利于海上贸易，因此，希腊民族主要从事航海业，从事对外贸易。在希腊远古的神话传说中就有许多关于航海的记载，《荷马史诗》尤其是《奥德赛》生动地描绘了希腊人航海的情景。在航海过程中，在与海上狂风恶浪的搏斗中，希腊人培养出个人的拼搏和冒险精神。经商贸易则要求平等进行，但是强权制约下的贸易并不是交换，而是掠夺。掠夺性的贸易往往激化为战争。因此希腊人崇拜《荷马史诗》中的战神阿伽门农、阿契里斯、赫克托耳和充满冒险精神的航海英雄奥德修斯以及用暴力维持秩序的宙斯。而在航海贸易的过程中，也滋长了希腊人强烈的功利主义观念。

东西方不同的文明反映在人们对待战争的看法上，必然会产生不同的战争观念。源于古希腊民族主要从事航海贸易业，西方人产生了“功利主义”战争观。而根植于农耕社会的汉民族则明显倾向于以“民本”思想为核心的“伦理主义”战争观，其特点是把战争视为政治伦理和道德意识的特殊实践领域（至于人们在多大程度上付诸实践则属另一回事）。

在中国古代早期，商汤灭夏桀的“鸣条之战”是历史上最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它将原始的“民本”意识与战争溶为一体，从而形成了古代“伦理主义”战争观的最早雏型。商汤要灭夏，对天下举出两条理由：一是夏桀暴虐无道，荼毒生灵，丧失民心，罪恶深重，违反天意；二是伐夏是顺应民心，执行上天的意志，替天行道，并非作乱。结果“夫汤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给后人以极大震动。古代中国早期大量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对商汤能迅速灭夏的原因提出许多看法，而夏桀“暴其民甚”以致“身弑国亡”是他们一致的共识。这种共识的背后所反映的社会意义就是汉民族农耕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秩序因夏桀荒淫无度、暴虐民众而遭到破坏，商汤顺应“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的民心，举兵灭夏，推翻暴政，恢复了农耕社会经济生活的平衡。因此，正是鸣条之战把后来对中国历史产生极大影响的政治伦理体系的核心——民本思想推上了历史舞台。至此，在远古神话时代依稀难辨的原始朦胧的民本思想经过战争的洗礼，露出清晰之身姿，外显为一种具体思想。与此同时，“民本”思想与汉民族的战争实践交汇融合，形成东方文明独特的“伦理主义”战争观。

“牧野之战”是商纣重蹈夏桀复辙的直接后果，它的历史意义在于再次验证和强化了“鸣条之战”后人们总结出的经验和教训，为“民本”思想在历史中的稳定性奠定了基础。于是周朝的统治者在战胜并取代了商朝以后，总结前朝失败以及自己胜利的经验，发现商以及以前的夏之所以失败，关键在于失去了民心的支持，而商、夏的失去民心，关键又在于他们自己的失德。正因为如此，周公提出“明德慎罚，用康保民”，并且制定出周礼，将汉民族以民本为核心的政治伦理思想进一步系统化，形成了后来儒家的“王道”思想。周代以后，以“民本”思想为核心的“伦理主义”战争观对历代王朝的政略和战略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古希腊民族根植于航海贸易业，具有强烈地追求财富的思想，为经商贸易四处冒险。在经商贸易中发财致富起来的工商业奴隶主集团，对内强烈要

求自由和民主，建立民主政权，参与政治生活，对外则要求进行争霸、征服与扩张，掠夺钱财和奴隶，以敌方的繁荣培植自己的强盛和绝对的贸易优势，因此希腊人拥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观念，对待战争也以功利为目的，形成了“功利主义”战争观。希腊文明后来扩展发展到今天的欧洲文明，古希腊民族的“功利主义”战争观于是影响了以后整个西方世界的战争观念。

东西方不同的战争观念，反映在用兵的最高境界方面就会产生明显的差异。西方以百战百胜为战争之道的最高境界，而东方的汉民族文化中却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最高境界，即所谓“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虽然在古代西方的军事史上，在具体战争中有许多迫使敌人投降的战例，但相比之下，他们从来没有像汉民族那样把不战而胜自觉地提高到战略思想的层次并形成一种军事理论加以高度重视，从而凝聚为军事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这点可以说是西方文化与东方中国文化在战争领域最耐人寻味的差异。

汉民族根植于农耕社会。农耕生活艰苦劳辛，但却生活稳定且有保障。农业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人们必须春种秋收，锄禾日中，汗洒沃土，收获即使不能说使人殷实富余，但是只要风调雨顺，适时耕作，不误农时，就可有稳定的收获，保证人们能够衣食有余，这也培养了人们追求稳定的生活方式的意识。而要进行适时农耕，就必须有安定和平的环境，不能有“动”、“乱”来破坏稳定的农耕生活，否则就无法做到适时农耕，就会使农耕经济生活秩序失控。但农耕社会也不可能风平浪静，不可能没有内“动”、内“乱”干扰，也不可能没有外敌窥视，战争肯定会爆发。

战争对汉民族农耕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有着维护和破坏双重相互矛盾的作用，一方面农耕社会经济生活秩序的失控（在古代中国往往表现为王朝的衰落）要求战争作为一种最后也是最有效的手段来恢复社会经济生活的平衡。同时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对农耕社会的屡屡进犯亦需用战争来抵御；另一方面，无论内生与外来的战争都将造成人员伤亡，财物灭失，劳力缺乏，田地荒废，黎民涂炭，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将造成巨大的灾难。由于这种情况在整个古代历史过程中一再重演，几经循环，故而长期以来形成了汉民族对战争既需要又厌恶的矛盾心态。这种两极冲突的心态最明显不过地体现于古代以战争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在古代同时又是珍贵的历史文献）中。如《诗经》中的《伯兮》以“伯兮伯兮，邦之杰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为开端，对丈夫从戎远征充满自豪，字里行间荡漾着浓厚的尚武精神，然而到了尾声，变成了“愿言思伯，甘心思疾”、“愿言思伯，使我心瘁”的凄楚哀叹和深沉感伤。《诗经·采薇》中的武士一方面意识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于是毅然“戎车既驾，四牡业业。岂敢定居，一月三捷”，但同时却又悲伤地感慨道：“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诗中集中反映出战争给汉民族农耕社会带来维护和破坏的双重作用，以及根植于现实的既需要又排斥的矛盾心态和尚武精神与厌战情绪的两极冲突。因此，汉民族要求取得战争胜利的同时，又希望把战争对社会正常生活的破坏限制在最低限度，如果做到那样也只有“不战而屈人之兵”最能实现这一目标，它自然也就成为汉民族理想的战争最高境界。

古希腊民族热衷于海外贸易和海运业，他们从中获取生活需要的钱财和商品，并从中暴发出一批工商业奴隶主。这批工商业奴隶主意识到强权制度下贸易的掠夺性，于是他们也往往诉诸战争去掠夺别人的财富，而欲想达到

劫掠成功，那只有战争的胜利。而且如果自己不想被别人劫掠，那也只有战胜对方，才不致于自己国土沦亡，人人去做对方的奴隶。虽然西方人也想以最小的代价去取得战争的最大胜利，但是他们远远没有汉民族那样把战争对社会正常生活的破坏性限制在最低限度作为战争之道的最高境界，而只是追求百战百胜。

当一种文明诞生之后，势必在不同程度上渗透于该文明圈内的战争领域。东方汉民族以民为本，注重伦理道德，求“仁”、求“善”大于一切；而西方希腊民族喜冒险，好功利，热衷于建功立业，追求个人权利和自由，不强调对社会的义务奉献，不像东方汉民族那样强调人际关系和人伦原则，因此在东西方不同的文明中必然会产生出耐人寻味的不同的战争文化观。

## 二、原始军事萌芽与战争的起源

Z 自从人类出现以后，人类与生物界接触发生冲突时，人体自身就是人类第一种冲击和防御武器，牙咬、拳打、脚踢、手指抓挠以及拳挡、足跑等。人类在何时第一次诉诸战争，由于什么原因发生，目前人们对此还是众言纷纭，百思不得其解。但是战争应该发生在人们创造出武器之后，这似乎是人人认可的事实。最早的武器无疑不是专为战争使用而发明的，原始人靠狩猎和采集可食用的植物为生，而狩猎和采集就需要工具，这些工具很多发展成为后来战争中使用的武器。

人类是从古猿发展而来的。古猿这类“攀树的猿群”迫于外在的压力，如气候变化、森林减少、草地增多等，为适应复杂的环境，开始解放出前肢，专用后肢走路。从此前肢专注于采食，逐渐学会使用石头、树枝等天然工具，正式进化为人类的双手。双手的出现，意味着人类使用工具和制造工具成为可能，制造的武器也随之出现了。

石块和树枝无疑是人类除了人体自身最早可利用的武器。人类起初可能像今天的某些动物那样用石块砸开贝壳和骨头以取得里面的食物，继而他们在挥舞手中的石块恐吓野兽时，又发现石块可以投掷，来击打远处的动物，改善其自身的防御状态。因为他们可以与动物保持一定的距离，从而使动物无法施展自身的冲击武器，如角、牙、爪等。这样投掷器就产生了。而且人类很可能又发现树枝也可以投掷，一旦他们又发现捆绑锋利的石头作矛头的话，制作石矛的两个基本要素也就全具备了。

不加修饰的天然石块和树枝毕竟使用范围不广泛，攻击性不强，于是人们开始制造工具。发现被自然毁坏的燧石有时带有锋利的刃口，意识到这些带刃口的燧石可以用来进行切割或砍劈，遂逐渐开始打制燧石，发现了砍斫石器，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人类开始进入旧石器时代。这时的砍斫石器，主要是手斧型石器，后来它们还被安上了斧柄或把手。人类并且开始使用火，借助于火，人类才真正完全地成为人类，战胜了动物，散布于世界各地。

打制石器还是比较粗糙，不够锋利，于是人类开始磨制石器，并出现钻孔技术。把石刃磨光，让刃石更锋利，器形也可磨得更准确合用，兵士们可以通过钻孔直接把木柄插在磨光的石斧上，而不再利用捆绑的办法。人类进入了新石器时代。

人类在自然界中是弱小的，无法与大动物比力气、与某些动物比速度，他们不得不去探索寻找某种弥补自己不足之处的力量和武器。他们很快发现并开始利用机械力去抛掷投射武器。他们发明的第一件借助机械力的武器应该是矛投掷器，这在澳洲的土著居民中迄今仍可见到。它是一个由带槽沟的木板制作的，把矛放在槽沟内，矛柄顶在槽沟的末端的一块牢固的木板上。人握住投掷器的前端，用力将其抛出，使矛拥有了巨大的投出力。随即人类又拥有了投石器，其操作原理与矛投掷器相同，以很快的速度把石块或卵石等投射物射出。

接着人类又发明了弓。最初的弓仅仅是将一段具有弹力的木棍弄成弯曲状，用一根生牛皮弦绑在木棍两端将其绷紧。这是一种十分简陋的武器，最初用它射出的箭应该是一种小型的矛。

磨制石器使人类有可能发明剑。原始的剑是在一平直的木片的刃部嵌有一长片或一排小而锋利的燧石，这是一种不能令人满意的武器，这种武器只

有等到青铜的使用才能获得新生。

直到约公元前 3500 年，人类发明了炼铜术，这使人类从石器时代进入金属时代。铜还是比较软，较大的铜制武器是不够理想的，因此人类最初生产的铜制武器是匕首。这种匕首刀身打得很宽，成三角形。随着炼铜技术的进步，匕首的宽刀身才改成窄刀身，刀身两侧的中心线打成隆起状。而斧头和箭镞的制造，要先铸成毛坯，然后再经锻打完成。

在新石器时代，发生了最有影响于人类历史也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农业革命。人类在采集和狩猎过程中，发现某些植物的种子可以培植作种，某些吃草或肉的动物可以驯养，于是人工培植的农作物和饲养的家畜开始出现了。

到公元前 7000 年，西亚成为农业革命发生的中心地区。这一中心区从其独立开辟和影响深远而言，至少还有中国和美洲。在西亚，以耶利哥和耶莫的村落为代表，在中国以河南新郑的裴李岗遗址（发现粟）和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稻谷）为代表，在美洲的特华甘河谷在公元前 7000—前 5000 年，也已有农业的萌芽。

人类最早驯养的动物一般认为是狗，因为推测它往往在狩猎者的宿营地周围来回走动，拾拣骨头和碎肉。人们发现狗可以用于狩猎或用来守卫营地，于是驯养狗的成功鼓励人们去驯养其它动物，尤其是可作食用的动物。在新石器时代结束前，他们至少驯化了牛、狗、山羊、绵羊和猪五种动物。当然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地并不都是一样，有些地方还可能驯化出了驴、马等动物。

随着农业革命带来了四项主要成就，那就是制陶、纺织、航海和轮车。制陶术的发明又为金属的冶炼准备了条件。轮车更是揭开了人类以机械征服自然的序幕。

农业的发展和动物的驯化，是人类定居生活和村落、社会制度得以发展的最主要的推动要素。农业和畜牧业不仅直接影响了人口数量的增加和分布区域的扩展，而且在社会制度方面触发了导致原始社会结束，古代文明诞生的一系列变化：氏族制的繁荣，社会分工和交换的发生，由部落、农村结合为国家、城市等等。可以说，文明的起源必须以农业革命为基础。

农业生产为人类定居聚落发展为较具规模的村庄以至城镇提供了前提，为从事农业生产，农业部落要以村庄或城镇为中心过定居生活；而畜牧也为游牧民族从事游牧、过游动生活提供了前提，为畜牧，他们要四处游动，寻找肥沃茂盛的草地或草场。于是定居与游牧形成鲜明对比，但他们都要寻找肥沃的土地和充足的食物，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从此经常发生对抗、冲突，并起着相互促进作用。

人类有一个从独居到群居的发展过程，在石器时代他们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组成氏族公社，过着集体群居生活。不同的氏族之间最初为了争夺食物或定居点，为了追求生存甚至于进行血族复仇，往往会发生冲突，但这种冲突并没有成为人类生活的正常职能，还不能称之为战争。

在农业革命发生以后，农耕民族走向文明的第一步是村落的出现。最初的村落具有明显的军事防御目的，在人们居住的房屋群的周围要挖以壕沟，有的甚至要用挖沟的土筑成围墙。要进入村落，只有通过围墙的大门和跨过壕沟的桥。村落又逐渐发展为有城墙的城市。

游牧民族走向文明的最初一步是马的饲养和车轮的发明。游牧民族必须随着季节和气候的变化经常进行大规模地迁徙，以寻找并暂时居住在水草丰

茂、适于放牧的地区。他们必须借助马和车轮的力量，使这种远距离的迁徙成为可能。经常的迁徙又使游牧民族富于机动性，战斗力非常强大。

牧畜的繁殖越盛，则导致寻找新草地的机会越频繁，在任何时候，只要有一次旱灾就可能成为一次入侵的先兆。同样，城市人口越繁殖，则所需粮食就越多，于是必需用为耕种的土地也越多。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都在为肚皮而进行战争。在生存斗争中，“生存空间”始终成为人类的一个大问题。于是柏拉图《理想国》中的一段苏格拉底同格劳孔的对话道出了人们为什么要进行战争：

苏格拉底：于是我们必须扩大我们的国界，因为原有健康的国家已经不够大……并且要有许多不同种类的兽类以供人民的食用。

格劳孔：一点都不错。

苏格拉底：于是我们想要获得我们邻国的土地，以供畜牧和耕种之用，而假使邻国也和我们自己一样，超过了其需要的限度，而企图对财富作限制的积累，那么他们也就同样地想要我们的土地吗？

格劳孔：苏格拉底，那是不可避免的。

苏格拉底：那么我们就要发生战争了，格劳孔，是不是？

格劳孔：绝对是如此……

苏格拉底：所以姑不论战争的利害如何，我们现在却可以断言已经发现了战争的原因，而这个原因也就是国家中一切罪恶的根源，无论公私都是一样的。

格劳孔：毫无疑问的。

在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对抗中，农耕民族用城墙挡住了游牧民族的车骑，农耕民族主要发展了步兵，而游牧民族主要发展了骑兵。

战争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战争时代的立即到来。上个世纪克劳塞维茨曾讲了一句令后来的伟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名言：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而人类能够从事正常的政治生活，只有在出现食物有剩余，社会分工和交换比较发达，私有制和阶级分化、剥削开始露出端倪之后。这个时期也就是接近国家出现前的原始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制时代。

军事民主制包括三个机构，即军事首长、议事会和人民大会。此时的从事政治生活的人们并没有把政治作为专职，军事首长和元老们还要从事农业或畜牧劳动。但是当时已拥有完善的政治组织，人们从事政治生活也成为人们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了。

在军事民主制时代以前进行的战争，只是为了对邻族人的偶尔侵犯进行报复，或为了扩大已经感到不够的领土和抢夺不足的食物。可是在军事民主制时代以后进行的战争，则纯粹是为了掠夺财富，并且日益频繁，出现了真正政治意义上的战争。正如恩格斯所言：“是因为战争以及进行战争的组织现在已成为民族生活的正常职能。邻人的财富刺激了各民族的贪欲，在这些民族那里，获取财富已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sup>1</sup>这种政治战争标志着氏族制度开始走向坟墓，而代替它的国家即将发生。在国家产生后，军事战争很快成为国家生活的主旋律。国家的最高目标是维持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国家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基础是体现于武力上的综合国力，历史上无数国家兴衰存亡的经验迫使每个现存的国家自觉或不自觉采取一致的行为方式，他们

---

<sup>1</sup>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72年版，第160页。

都在为以后说不准什么时候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战争作准备。正是这种心态支配着历史上迄今为止所有国家，同时也是国家追求强大的心理动力，也是国际社会中强权法则的基础。

最早的文明国家是从城市发展来的奴隶制城邦。在城邦争斗中，经济最发达、最具有军事武力的城邦迅即发展为帝国，达到奴隶制文明的顶峰。众多的城邦只有在通过军事战争的武力吞并后，才能形成最强大的一个。而最强大的城邦发展到帝国，又是通过军事征服实现的。早期奴隶制帝国的灭亡和文明的衰落又正是在军事战争中划上了句号。因此可以说，早期的奴隶制文明史就是一部军事战争史。

### 三、古代埃及

#### 1. 前王朝与早王朝时期——埃及文明的开始

古代埃及位于非洲东北部尼罗河下游，其基本区域是沿尼罗河两岸的一个狭长地带，地理范围大约和今日的埃及国家相当。从希腊时代起，西方人就知道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古代埃及人更视尼罗河为母亲河，尼罗河对埃及文明的产生和发展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自建立古文明后，就分成上埃及（南部）、下埃及（北部）两部分，以孟斐斯古城（今开罗附近）为界。古埃及文明是建立在象形文字的基础上的，象形文字的发明与湮灭，标志着古埃及文明的开始与结束。

古埃及文明绵延三千余年，与两河流域的古代文明相比，埃及较少受外敌入侵和民族变动之苦，古埃及居民自始至终属于一个民族，按其语言系统所属，称之为哈姆人。后来西亚的塞姆人曾经一批批进入埃及，与哈姆人逐渐融合，但其时已近埃及文明末期。

尼罗河流域，由于尼罗河的定期泛滥，土壤肥沃，物产丰富。早在公元前4000年后半期，埃及人在阿姆拉文化时期已处在军事民主制时代，紧靠于文明门槛的边缘了，出现了较大的城镇。紧接着，很快在格尔塞文化时期，出现了最早的奴隶制小国，希腊人称之为“诺姆”，中译为“州”，在下埃及尤其以涅伽达和希拉康波里为代表。它们都有自己独特的标志和徽章，都崇拜自己城邦的保护神。

这些诺姆国家形成之后，便开始它们的争霸和统一战争。涅伽达和希拉康波里首当其冲，很快便布下了战火的烟云。开始涅伽达曾一度占领希拉康波里，但后来涅伽达失去了独立，成了希拉康波里的附庸。

后来，各小邦纷纷结成联盟，参与争战。联盟各邦都保有相对的独立性，在交战中各邦都打着自己的旗帜，旗上的图像如狮子、鹰、朱鹭等就是各邦的标志。“战场调色板”就曾描绘狮州联合鹰州和鹭州结盟对三角洲各邦作战，俘获了许多居民。

在争霸过程中，南方的希拉康波里很快崛起，不但击败了主要对手涅伽达，称霸南方，而且北进三角洲，想控制北部。在蝎王统治时期，希拉康波里已成为南部各邦联盟的首领。蝎王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原则，残酷镇压了国内反叛民众，然后率领自己的盟邦对外征伐，为他的继承者纳尔迈统治埃及奠定了基础。

纳尔迈，就是美尼斯。在蝎王之后，纳尔迈的军事行动更加频繁。考古学家曾经在希拉康波里发现了著名的“纳尔迈调色板”。调色板正面，纳尔迈头戴白冠，右手高举权标，左手抓起跪在地上的敌人的头发。在国王的脚下，还有两名敌人正在狼狈逃窜。调色板的反面，纳尔迈头戴红冠，和他的随从一起巡视战场。他们的前面，横躺着十具被斩首的敌人的尸体。反面最下部分，象征着国王的公牛攻破了设防的城市，正在践踏企图逃窜的敌人。调色板最引人注意的是，正面的纳尔迈戴的王冠是代表上埃及的白冠，反面戴的王冠，则是代表下埃及的红冠，红白两冠戴于一身，这在日后的埃及历史上一直都是表示全国统一的标志，而且有时两冠合一，被称为红白王冠。调色板被认为是纳尔迈统一上下埃及的实证。

纳尔迈统一全国后，埃及进入早王朝时期。其继任者，意为“斗士”

的阿哈，其名字本身就带有穷兵黩武的性质。阿哈第一次把埃及的边界由纳尔迈时代的赛勒赛拉扩大到厄利芬提纳，从而奠定了后来埃及南部边界的基础。

第一王朝（公元前 3100—前 2890 年）的统一只是暂时的，以后分裂和统一屡有反复。第二王朝（公元前 2890—前 2688 年）的第一王海特普赛海姆威，意为“两个权力在和平状态中”，可能表示又由分而合，恢复了国内和平和南北统一。直到最后一王哈谢海姆威时期，才声称对立的两大神——荷鲁斯和塞特终于和睦共处，采用了荷鲁斯和塞特的双重头衔，埃及南北才真正和完全统一。南北统一的埃及在集中王权领导下开始了建造金字塔的光辉纪元——古王国时期。

## 2. 古王国时期的原始性军事

### (1) 古王国的对外远征

古王国时期（公元前 2686—前 2181 年）包括第三到第六王朝，埃及从此进入统一的中央专制王权统治时期。在此时期，埃及法老靠着绝对的权力，按照埃及人重死后胜于生前的习俗，动用全国的人力和物力为自己修建陵墓——金字塔，故古王国时代又称金字塔时代。

法老，作为中央集权国家的君主，采用“君权神授”说，自称是太阳神拉神之子，集军、政、财、神诸权于一身。所有的埃及人都得绝对服从法老的“圣旨”，在法老面前，文武百官皆须顶礼敬拜，许多大臣以亲吻法老的靴鞋为荣，甚至被法老打一巴掌也是莫大的光彩，值得在墓志铭中大书特书。一切高官显吏（包括丞相）均由法老指定，地方长官州长完全听命于法老。实际上，古王国诸朝的丞相和其他掌握实权的大官，甚至重要州州长均由法老的王室成员担任，更使权力集中于法老一家之内，比中国的“家天下”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古王国时代以前，战争主要是内部各州之间争霸的战争。从古王国时代开始，埃及组织了许多次国外远征。第三王朝首任国王乔赛尔揭开了侵略努比亚的序幕。他派军占领了第一瀑布上游的大片土地，并把它献给厄利芬提纳的赫努姆神庙。但由于努比亚人经常反抗，骚扰埃及边界，乔赛尔不得不在阿苏安和非列之间修筑了一道城墙，以保护埃及南部地区。在北方，乔赛尔亲自挂帅出征，率军出击居住于西奈的各部落。

大规模的对外远征是从第四王朝的第一代国王斯尼弗鲁开始的，出征方向仍是埃及南部的努比亚。据《帕罗姆石碑》记载，斯尼弗鲁曾蹂躏了努比亚的国土，带回 7000 俘虏和 20 多万牲畜。他并在南部边界修建了一道叫“斯尼弗鲁之家”的城墙。他还远征北方，占领了西奈半岛的铜矿区。瓦地—玛格哈拉悬崖上有一幅浮雕就描绘了斯尼弗鲁用权标击打下跪的亚细亚人的情景。为了巩固东北边界，他在那儿也修筑了一道“斯尼弗鲁之家”的城墙。在东北三角洲的那些称为“大公墙”的防御工事可能也是他建造的。

斯尼弗鲁之后的诸王似乎把主要精力放在金字塔的修建上，到第五王朝诸王又恢复了前代的远征。他们认为自己不仅负有统治埃及人的使命，而且负有统治总称为“九弓”的利比亚人、亚洲人和努比亚人的使命。在这个王朝的国王萨胡拉的祭殿里，不仅画有载来许多亚洲俘虏的船舶，而且还画有利比亚俘虏，以及从他们那里掠夺来的牧畜。

乌尼，这位第六王朝国王泰提·柏比一世和麦伦拉的宠臣，曾在自己的传记中说：“国王从整个上、下埃及召集许多‘万人队’，以便惩罚那些越过沙漠的亚洲人。……国王派我统率这支军队……我带着这支军队……穿过‘真理之神荷鲁斯’地区的伊姆荷太普门……”

“这支军队安全归来，  
它消灭了成千上万的沙漠人。  
这支军队安全归来，  
它带回无数的俘虏。”

“国王极力地夸奖我。他五次派我率领这支军队去镇压那些越过沙漠地区的反叛者。”

可就在乌尼远征之后不久，整个埃及的政治和经济都经历了一个彻底崩溃的时期。

## (2) 古王国时期的军事情况

古王国时期的军队分陆军和海军。陆军中只有一个兵种，即步兵。步兵主要由埃及的农民组成；也有一定数量的居于埃及境内的外籍非奴隶的努比亚人，但他们不是雇佣兵，没有军饷。步兵可达数万人，但具体数字不清楚。

海军是古代埃及武装部队的一支重要力量。到第五王朝时，由于对外用兵频繁，埃及舰队分成两部分。“两大舰队”的出现既适应上、下埃及的划分，也适应埃及向地中海和红海扩张的需要。古王国的舰队数目不少，在斯尼弗鲁时期，埃及为寻找雪松树，就曾派出40艘舰船编成的舰队。

发达的海军建立基于发达的造船业。当时尼罗河和沿海航运已普遍使用帆船。这些船只一般以双杆并列竖为帆桅，一船一桅，但也有双桅甚至三桅的大船。船桅前后以护桅索加固，船身亦以中央大索连接船尾，并用绞紧法使所有索具达到高度坚固。此外，船尾还有长桨作舵。作为造船技术尖端产品的则是王室祭礼用的大船。斯尼弗鲁所造的大船长达一百肘（52.3米）。胡夫金字塔内有两木船各长32.5米，全用黎巴嫩杉木制成，首尾高昂，船中建有舱房，接榫亦极完密。在航行时以数十名桨手划动。建造技术之精可以和金字塔相媲美。古王国时期还设立管理造船厂的长官，被称为“船舶建造者”，以及负责指挥搭乘战船运输步兵的长官，叫“战船队首长”。这说明古埃及在海军建设上已有了海军后备军官，可见其海军的发达。

古王国的兵器较原始，主要兵器是弓箭和战斧。弓用木料制成，外缠以皮条。箭头早期为石制，后来被金属代替。最古老的战斧也是石制的，后来出现楔形或弧形扁平状的铜斧。这时兵器还有一头嵌以石块的粗头木棍，在木棒上用皮条捆以锤头制成的圆锤，燧石制和铜制短剑以及装有石制尖头的矛。防护装备盾牌一般是木制，外覆以毛皮面。

为加强边疆和国内要地的防御，法老们修筑了许多堡垒和其它防御工事。堡垒通常建成椭圆形、圆形或长方形。比较完善的黑拉康波里斯城堡，环绕以内外两道围墙。堡垒入口结构复杂，在经过两道狭窄的走廊和小空场后才能进入内部。这个小空场位于两道走廊之间，可以在此组织抗击强行进入入口的敌人。在堡垒入口附近还有通到墙上的阶梯。古埃及人还建了许多长墙，如第四王朝法老斯尼弗鲁所建的“斯尼弗鲁之家”长墙。

值得注意的是埃及此时出现了管理武器、武器与船舶制造、军队补给和防御工事等事务的专门机构——“军械院”。其首领为“军械院院长”，有

时与军队中的录事职务合并，是军事部门的要职。这是古代世界最早出现的中央一级军事后勤机构。

### 3. 中王国时期军事的发展

#### (1) 中王国的远讨与希克索斯人入侵

第六王朝结束后，埃及历史进入第一中间期，从第七王朝到第十王朝一百多年间（约公元前 2181—前 2040 年），埃及始终处于分裂局面。在此期间，贫民和奴隶起义风起云涌、势不可挡。《伊浦味陈辞》哀叹说：“大地像陶轮一样翻转起来，强盗已变成财富的主人”，“国境变成沙漠，各州被抢劫一空”，“国都，它在顷刻之间遭毁”，“那本来没有财产的人，现在已变成财富的所有主了；那本是受人驱遣的人，现在却来驱遣他人了；那本来自己没有谷物的人，却已成为谷仓的所有主，国王的粮仓变成一切人的财产”。

在人民起义的打击下，古王国的中央集权专制体系土崩瓦解，各州割据形成。后来各州又纷纷展开争霸，直至第 11 王朝，南北才统一，进入中王国时期。

中王国时期（公元前 2133—前 1786 年），包括第 11 和 12 两个王朝。中王国是一个中兴时代，特别到第 12 王朝，中央集权制进一步加强，是中王国的鼎盛时代。古王国的首都在北方的孟斐斯，而中王国的首都在南方的底比斯。

中王国强大以后，又恢复了对外扩张政策。在北方，中王国的国王虽多次远征西亚，却只限于阻止亚洲人的入侵，以及镇压西亚各族的反叛。中王国真正的扩张战争多集中在南方，对努比亚进行的。第 12 王朝的开创者阿美涅姆黑特，曾率军征讨努比亚，在塞姆拉地区设立要塞。他的继任者谢努塞尔特一世曾经征服努比亚的玛伽依人。据说玛伽依人勇敢善战，作战时佩戴长弓利箭，头发里插着五颜六色的羽毛，发出粗犷的喊叫，以排山倒海之势急冲向敌人。后来谢努塞尔特三世又四次远征努比亚，把埃及南部边界扩展到第二瀑布以南的塞姆拉地区，并新设许多要塞，使埃及在此的统治最终巩固下来。

第 12 王朝末期，法老政权又趋衰微，从第 13 王朝开始，混乱割据局面再度出现，一直延续到第 17 王朝，史称“第二中间期”（公元前 1786 年—前 1567 年）。在这一时代早期，亚洲的希克索斯人入侵并占领了埃及，还曾建立第 15、16 王朝。

希克索斯人是个游牧部落，从西亚给埃及带来了战马和战车。在此以前，埃及只有牛、驴而无马，驴只用于驮运，拉车的情况也很少。在军事上，也只有轻装步兵。希克索斯人把马拉战车引入埃及，可谓是埃及军事技术史上的一大革命。埃及很快出现了马拉两轮战车，埃及也出现了战车兵，这大大增强了埃及军队的战斗力。

#### (2) 中王国时期的军事发展

在兵制建设上，古埃及在中王国时期有一个从民兵到常备军的发展过程。最初，中王国的民兵队伍的招募，由“军队录事”负责。据第 12 王朝的一个纪念碑文记载，“皇太子”作为“军队录事”在提尼斯州募兵，其比例

是每 100 名男性居民中招募 1 人。被招募的士兵自带兵器，通常补充到州长管辖的地方部队中。每个州常达 400—600 人，在军事作战时，州长率领这些地方军，加入法老军队，听其指挥。另外，中王国时期从努比亚招募雇佣兵，而且数量不少，在军队编制中另入雇佣兵系列。

在中王国时期，国王建立了常随自己身边，保护自己的近卫队。长期服役的常备军就是从这种近卫队中逐渐发展起来的。

随着常备军的扩大，以前战时临时招募的民兵逐渐被定期在各州招募的由新兵组成的专职军队所代替。新兵受州长和专门军官的领导，平时接受训练，逐渐变成定型化了的军团。国王常常从近卫军中选拔军官，组成忠于国王的常备军军官集团，逐渐形成一个职业军官阶层。他们中不少人出身贫寒，在国王的恩宠下成为新贵。但是我们对常备军的服役报酬还不清楚。

中王国的陆军仍然只有步兵，不过在步兵中已明显地分为矛手和弓箭手两种，均采用同一型号的兵器。海军更加强大，作战适应性增强，埃及人善于利用风向，让战船在水上运转自如，机动灵活地同敌舰作战。

由于青铜冶炼的发明和金属加工技术的提高，埃及士兵的武器装备比古王国时期有很大发展。进攻性武器有战斧、矛、弓箭、圆锤、短剑、投石器、飞去而来器和木棍等。防护装备盾牌也有新的发展。

中王国的战斧形制多样。古老的扁平楔形斧斧身坚固，保留时间较长。而当时的扁平弧形斧，则是埃及所特有的。战斧有铜制的，而且出现了青铜斧。

中王国的长矛已不再是燧石矛头，而代之以青铜制矛头。金属矛头打成空心管形式，便于把矛杆楔入其中。有的长矛的下端也包上金属尖头，以便把它插在地上。矛的长短尺寸不一，最常见的长矛长达 2 米，适于近战。还有短矛和作为投掷武器用的标枪。埃及人还有特长矛作为攻城武器，由两人抬着，破坏敌人堡垒的雉堞或塔楼，可能也用来刺戳城堡上的敌人。

弓是用圆木棍制成的，中间粗，两端逐渐变细并套以金属箍。弓通常长达 140—180 厘米。有的弓还用特种树枝紧紧缠绕，这种加固的弓可使箭的射程更远。箭的射程一般在 150—180 米之间。弓弦用涂蜡的亚麻绳或皮革制成。埃及人还在弦上穿上一些角制的环或皮制的套，以防发射后回来的弦擦打握弓的左手和下臂。

箭杆多用芦苇制成，也有采用轻木的。箭镞是用硬木、骨、石和铜制成的。箭镞的质量与杀伤力直接有关，青铜箭头的采用确实比石制箭镞先进许多。埃及人制成杀伤力巨大的上尖下宽箭镞，还在箭镞上设计有倒钩，使敌人中箭后难以拔出。箭杆尾部嵌以羽翅，以便箭杆能笔直飞行很远。

“飞去而来器”原是原始人的猎具，像一个曲棒，抛出后如击不中目标可以借助曲棒的回旋力飞回来。新王国时期还出现一种简单的投掷武器——投石器，用皮革或编制的纸莎草作成，用以投掷石器，在攻城时其作用尤其重大。

中王国时期埃及人仍没有发明盔甲，盾牌是唯一的防护武器。盾牌一般上部呈圆形或椭圆形，中下部呈长方形，高为身高的一半左右。由木框或整块木板外罩毛皮制成，周边钉以钉子。埃及人还有一种沉重的可掩护全身的圆盾。出征时需要由从者帮助携带。

中王国的法老们一方面注重对外征伐侵略，另一方面又大兴土木，修筑防御工事，加强国内重地和边疆要冲的防卫。国内要地的防御工事主要在首

都底比斯和北方重镇孟斐斯一带。北方防御工事主要对付亚洲人的入侵，数量不多，而重要的防御工事集中在南方，主要在第一瀑布和第二瀑布南北一带。

在奥姆博斯以南，进入埃烈芳提那附近的第一瀑布地区，便是埃及的南部边境。从这里开始到南部第二瀑布地区的塞姆拉之间，沿尼罗河两岸埃及人建有一系列堡垒，形成保卫埃及的三道防线，又是南侵努比亚的兵站基地。第一道防线就是埃烈芳提那附近的第一瀑布地区；第二道防线在第一和第二瀑布之间，即从库班一直延伸到努比亚边境的帖尔；第三道防线在瓦地—哈利发和塞姆拉之间的第二瀑布地区，这道防线最重要也最强大。

中王国的法者们注重对南方的防御，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南方，却没想到亡国之灾来自北方。希克索斯人大举进犯并占领埃及达一百多年，埃及人也相应进行了长期的反希克索斯人的斗争。直到雅赫摩斯一世时，埃及人才最后赶走了希克索斯人，恢复了埃及人自己的统治，开创第 18 王朝，建都上埃及的底比斯，埃及史进入新王国时期（约公元前 1567—前 1085 年）。它包括第 18、19、20 三个王朝。

#### 4. 新王国时期——军事霸国时代

##### (1) 新王国的军事霸业

图特摩斯三世帝国的极盛。第 18 王朝正是在反抗希克索斯人的斗争中建立和发展壮大起来的。在反希克索斯人的过程中，已经锻炼起一支强大的军队，法老政权依靠它有力地消除了地方割据，造成中央集权的一统局面。抗击希克索斯人的胜利，又进一步加强了法老的中央集权势力。而统一的中央集权又反过来有利于法老大搞对外扩张，南征北伐，建立庞大的帝国。

雅赫摩斯一世曾经南征努比亚，北占巴勒斯坦，为埃及帝国初奠基石。但帝国的真正建立是在图特摩斯一世时期（公元前 1525—前 1512 年）。他不仅再次南征努比亚，而且北进于西亚腹地，前锋达幼发拉底河边，并在那儿树立一石碑，以铭记其功绩。他占据了叙利亚北部地区，和西亚的强国米坦尼接壤。

图特摩斯一世称霸西亚之后的四十年中，埃及军队撤出了亚洲，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国内建设中。但就在这段时间里，埃及在亚洲的境遇逐渐恶化。由胡利安人建立的米坦尼王国开始在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自由扩张。在叙利亚南部和巴勒斯坦地区，卡捷什王国乘埃及女王哈特谢普苏特谢世之际，占有加利利和北约旦河谷的大片领土。卡捷什国王在美吉多城征集民团，传召各地王公，准备联合起来对抗埃及。据那帕达石碑记载，在美吉多战役中约定共同反对埃及人的，以卡捷什为首的叙利亚、巴勒斯坦联军首领多至 330 名王公。这种情形对埃及在亚洲的利益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国势正在蒸蒸日上的埃及绝不会容忍别国侵占已属它的领土，一场战争迫在眉睫。

图特摩斯三世（公元前 1504—前 1450 年在位），第 18 王朝第 5 位法老，幼年时曾和女王哈特谢普苏特共同统治过一段时间。在此期间，图特摩斯三世训练了一支由自己直接控制的军队，以 25 人为一分队，共 25000 人以上。在他 22 岁时，图特摩斯三世开始独自执政。公元前 1482 年 5 月，他率兵出埃及，向卡捷什联盟发起了进攻，双方在美吉多城发生了一次决定性的战役。

美吉多是巴勒斯坦北部重镇。从南面有三条道路可通美吉多：一条经“大

马士革大道”向东，至基松河附近折向北，而后由山路到达目的地。这条路路途太长，图特摩斯三世弃之不用；第二条路经阿鲁那直达美吉多南部，亚洲人都认为这是图特摩斯三世的必经之地，因而在城南布设了重兵。如果埃及军队经此路攻打美吉多，必将遇到极大的阻力。就在这时，图特摩斯三世充分发挥了他作为一个战略家的杰出军事才能，在阿鲁那地区改变了行进方向，经过一条崎岖的山路绕到美吉多城北，从背后突然袭击亚洲人。

据《图特摩斯三世年代纪》记载：在美吉多城前，图特摩斯三世调整了军队的战斗序列，弓箭手在前，步兵断后，再后面是五百辆精选的，由快如疾风的骏马驾驶的战车。在进攻时，先由弓箭手射出一排排利箭，打乱敌兵的阵营。而后，图特摩斯三世命令车兵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前挺进。当战车接近敌人的车队时，车兵在统一号令下同时放开弓弦。敌兵的战斗序列终于瓦解。到处是翻覆了的车箱、马匹和士兵的尸体，到处可以听到将领们的叫喊和受伤者的呻吟。

《图特摩斯三世年代纪》还生动细致地描述了这次战役中图特摩斯三世英勇的形象：“陛下驾着金银战车，配备着自己的战斗武器，像常胜者荷鲁斯，像威力的主宰一般，像底比斯的蒙特一般，出发了，他的父亲阿蒙加强了他的双手”。由于图特摩斯三世的进攻，敌人陷入一片混乱。“当他们看到陛下战胜他们时，他们带着恐惧的脸孔没有秩序地逃往美吉多去，他们抛弃了自己的马和金银制的战车”。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埃及士兵乘胜追击，美吉多城便唾手可得。可是，尽管法老声嘶力竭地叫喊，埃及士兵还是只顾抢劫金银财物，掠取战利品和捆绑俘虏。结果，一些美吉多逃兵爬上城墙，抓住上面的守兵扔下来的绳索，侥幸逃脱了性命。

图特摩斯三世为此十分不悦，但无奈之际只好下令围城。在以后的七个月中，法老砍光了城郊果园中的全部橄榄树和无花果树，断绝城中的粮食和水源，最后迫使美吉多守兵投降。亚洲联盟的首领除卡捷什国王逃跑外，其余全部被俘。他们“用自己的腹部爬行而来”，请求图特摩斯三世宽恕，并向他保证：“铁赫努人永不反叛”，“我们在有生之年，再也不做反对图特摩斯三世的坏事”。埃及人夺得大量的战利品。在其后的三年中，法老又多次视察被占领土，征集贡物，重申对这些地区的统治。

摧毁了卡捷什联盟之后，图特摩斯三世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第二个敌人图尼普。经过几年的休整，公元前1476年初夏，图特摩斯三世率军沿地中海东岸北上，经过毕布罗斯，征服了北部城镇乌拉扎和阿尔达塔，把图尼普布置在腓尼基海岸的所有驻军全部变为囚犯。由于这次远征的时间正好选在收获季节，因此，埃及军队在得胜回朝之际，收割了当地的所有谷物，并由海路运回埃及。

公元前1475年春，埃及人乘船复回。在毕布罗斯登陆后，穿过东部山区，然后取道奥伦特河谷，直接袭击卡捷什城，毁坏了城郊的果园和庄稼。因久攻不克，埃及军队不得不撤退。

在其后的一年中，埃及没有向亚洲发动进攻。乘此良机，图尼普在乌拉扎构筑了新的防御体系，布置了重兵。图尼普王子也被任命为乌拉扎军事总指挥。

公元前1473年5月，图特摩斯三世率军突然出现在乌拉扎城下，在守兵惊惶之际已攻破城防，攫取了城中所有的财产。而后，埃及在乌拉扎驻扎了

军队，迫使黎巴嫩所有城邦交纳租税，变地中海东岸被占区各个港口为军需库，储存各种军需物资，以备将来征战之耗。从此之后，埃及人每年都从黎巴嫩输入众多的优质木材。

公元前 1472 年，图特摩斯三世向米坦尼发起了直接进攻。埃及军队首先乘船至毕布罗斯，登陆后，用马车装上事先建造好的军舰，翻山越岭抵达奥伦特河谷，而后折锋沿河谷北上。也许卡捷什和图尼普惊异于埃及军队的行军速度，因而未作任何抵抗。当埃及军队到达阿列波境内时，遇到了米坦尼王国的军队。经过三次激战，埃及人推进到幼发拉底河西岸的卡尔赫美什。米坦尼军队不得不撤至河的东岸。他们望着滔滔的河水，长长地松了口气，因为自己已经控制了附近的所有船只，埃及军队无论如何也无法渡过幼发拉底河。

谁知就在这时，图特摩斯三世拿出在毕布罗斯建造的所有战舰，顺着河水向东急驶。米坦尼人惊得目瞪口呆，等缓过神来之后，急忙仓惶逃脱。埃及军队渡河之后，占领了幼发拉底河上的重要军事据点尼雅。

十五年后，图特摩斯三世对这次辉煌的胜利还记忆犹新：“在纳哈林的土地上，没有人敢来拯救那些因其主人的恐惧而被抛弃的城镇，我烧毁了所有的城镇和乡村，把它们变为废墟。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住在那儿。”在他父亲所立的石碑旁，图特摩斯三世也树立了一块石碑，标明了埃及帝国的最北边界。

图特摩斯三世在位期间，不但大规模入侵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还不断出征努比亚，把埃及帝国的南界扩展到尼罗河第四瀑布。他的军事征服，使埃及成为一个空前绝后的超级军事霸国。不但西亚被征服国家每年必须向埃及交纳大量贡物，就连当时的近东强国巴比伦、亚述和赫梯等，因慑于图特摩斯三世的威力，也不得不向埃及奉送礼品，以示敬意。埃及帝国的版图正是在图特摩斯三世之时，达于最大规模。图特摩斯三世也因此被后人称为“古埃及的拿破仑”。

埃及军事威力的衰落。但是建立在武力基础上的图特摩斯帝国政权并不巩固，埃及撤兵不久，西亚各地便爆发了起义。公元前 1463 年，图尼普在黎巴嫩沿岸发动了反埃及统治的叛乱。尽管图特摩斯三世曾派军攻克了卡捷什和图尼普，并在图尼普设立了一个指挥部，但起义仍在继续。不久，奥伦特河上游位于卡捷什和大马士革之间的塔西也公开反叛，斗争一直持续到阿门霍特普二世统治时期。

在幼发拉底河战役中，图特摩斯三世的军事威力并没有阻止米坦尼国王的对外扩张。向东，沙尔沙塔征服亚述，掠夺了不少财物，把米坦尼的统治范围延伸至扎格罗斯山脉。向西，他征服阿列波，迫使阿拉拉赫、乌伽里特、甚至南部的尼亚、卡捷什等都驱逐埃及军队，投靠米坦尼。图特摩斯三世死后，亚洲各城邦及其联盟力图挣脱埃及的束缚，刚刚继位的埃及国王阿门霍特普二世面临着一场严峻的挑战。

据史料记载，阿门霍特普二世体格魁伟，肌肉发达，作战极为勇猛。他不但卓于养马驯马，还擅长射箭。对于亚洲各地的背叛，阿门霍特普二世予以坚决镇压。他循着图特摩斯三世走过的足迹，远征巴勒斯坦，击溃了不服从他的地方小公侯的军队，并蹂躏了他们的城市。随后进军奥伦特河谷并沿河向北挺进，攻占了地中海东岸重镇和经济中心乌伽里特，一直打到幼发拉底河沿岸。在其祖父和父亲所立的石碑旁，阿门霍特普二世也树立一根石柱，

记载了自己的军事业绩。

然而，阿门霍特普二世在亚洲的军事行动仅仅局限于镇压各地的叛乱，他没有，也不可能为埃及帝国再夺得一寸土地。长期的战争削弱了埃及的经济实力。如果说阿门霍特普二世还能够组织大规模战争的话，那也只是强弩之末了。当米坦尼王国迫于赫梯的威胁，为避免两线作战而向埃及求和时，阿门霍特普二世尽管吹嘘这是出于他的军事威力，但还是顺水推舟地接受了求和建议，与米坦尼建立了“兄弟般的友谊”。大约在公元前1415年，阿门霍特普二世的儿子图特摩斯四世娶了米坦尼公主阿尔塔塔玛为妻。从此，埃及的对外政策由武力征服变为联姻和黄金外交。对于亚洲各大强国，埃及法老除了以婚姻形式来巩固王朝间的联盟之外，不得不借助于黄金来购买友谊。

在阿门霍特普四世，即阿赫拉吞统治时期，埃及军事威力的衰落表现得更加显著。埃及这时已无强大的军事力量，因此便不可能保卫自己在叙利亚的领地。乘埃及衰弱之机，崛起于小亚细亚的赫梯王国在著名国王苏庇鲁流马斯领导下在叙利亚大肆扩张。叙利亚一些小国，如努卡西西、穆基西、尼亚等纷纷投入赫梯的怀抱，就连与埃及保持血缘联系的乌伽里特也背叛了埃及。此时，从奥伦特河谷的荷姆斯湖向西，一直到腓尼基海岸的阿穆路地区名义上归埃及所属，但阿穆路国王阿基路乘埃及在亚洲的统治瓦解之机也开始向外扩展领土，他一方面派军援助埃塔卡马反对仍然忠于埃及的阿姆基和乌培，另一方面亲自攻打图尼普。在阿基路军队的围攻下，图尼普统治者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向阿赫拉吞请求给予军事上的援助。可是，被国内王权与阿门僧侣集团之间的矛盾所困扰的阿赫拉吞已无精力去顾及亚洲事务。

当赫梯进军努卡西西时，阿基路盛情接待了赫梯使者。为此，阿赫拉吞传讯阿基路并把他囚禁在埃及。几年后，阿基路被释放，不久，他便投靠了苏庇鲁流马斯，阿穆路地区也就随之归赫梯所有。埃及帝国的北部边界向南退至埃洛特罗斯河谷。

与赫梯争霸。阿赫拉吞时代，赫梯为了集中力量消灭米坦尼，和埃及结为盟友，从而瓦解了阿门霍特普二世时缔结的埃米同盟。为了尊重盟约，苏庇鲁流马斯在其扩张过程中，只攻打米坦尼的属国，对于乌伽里特、腓尼基各邦，以及阿穆路等埃及的属国则避免了干戈。米坦尼灭亡之后，赫梯与埃及两大霸国第一次直接接壤，双方以奥伦特河为界划定了各自的疆域。

但其后不久，叙利亚一些小国组成了反埃及同盟，并企图拉拢与埃及保持王室间婚姻关系的乌伽里特。在这种情况下，乌伽里特国王写信给苏庇鲁流马斯，请求赫梯而不是埃及，帮助他解除困境。苏庇鲁流马斯以此为由，派兵进驻乌伽里特，把它变为赫梯的诸侯国。而后，苏庇鲁流马斯继续南下吞并了卡特那、乌培等本来都属于埃及的小城邦。对此，阿赫拉吞没有采取任何军事行动来抗议赫梯的侵略行为。后来，阿基路的被叛使埃及帝国的版图再度缩小。赫梯人吞并了阿穆路地区后，把南界推进到埃洛特罗斯河谷。

阿赫拉吞的继承者图坦哈蒙统治时期，埃及曾出兵企图恢复在亚洲业已失去的部分领地，但收效甚微。

图坦哈蒙死后，因无子嗣继承，埃及政权控制在大臣阿雅手中。他的寡后安开孙巴阿吞私自写信给苏庇鲁流马斯，请求他派一位王子到埃及来同她结婚，并允诺让这位赫梯王子充当埃及法老。苏庇鲁流马斯几经斟酌之后，终于同意了寡后的请求，但派出的王子在赴埃及途中被杀。苏庇鲁流马斯为

此大怒，立刻派兵攻打埃及。埃及最终战败，大批士兵被俘，但苏庇鲁流马也也因军中传染病大肆流行被迫停止了战争。

公元前 14 世纪末，埃及第 19 王朝建立。年老的建立者拉美西斯一世在其当政时期实行了许多军事措施，进一步改编和加强了埃及的军队。他把军队分成三个军团，每一军团均以埃及主要神灵的名字命名。各军团配备了战车，加强了作战时的机动性和作战速度。此外，他从各军团中挑选骨干组成近卫军，侍奉国王左右；从相邻各部落中招募雇佣军，守卫边境要塞。从东北边界的嘉鲁要塞起，拉美西斯一世又修筑了一条经过沙漠而通往亚洲的军道，以便于作战时迅速地调兵遣将。所有这些军事措施的实行，为 19 王朝的法老能够在亚洲与赫梯争霸奠定了基础。

当西提一世继承了埃及王位之后，赫梯的统治者是穆西里二世。也许是双方教唆之故，埃及与赫梯帝国境内都发生了叛乱。从有关资料来看，西提一世在亚洲的平叛活动特别顺利。他先击溃了聚集在通往加沙道路上的游牧部落，解救了被围困的贝特·辛城，镇压了巴勒斯坦中部高地上的阿庇鲁人的反叛，而后进一步向北夺得耶诺阿姆、哈玛特和伯善城，臣服黎巴嫩各地的首领，迫使他们砍伐当地的优质木材，为阿门神建造圣船。继位第 2 年，西提一世沿地中海东岸北上，在阿穆路地区作战，而后翻山越岭，攻克了卡捷什城。接着在北进途中，与赫梯人发生了直接冲突。在卡捷什北部与赫梯人作战中，西提一世取得了胜利，不仅带回了赫梯战俘，而且占领了卡特纳和图尼普等地。卡尔那克神庙中的铭文说到，西提一世“打败了赫塔人（即赫梯人——作者）……使怯懦的叛乱者停止了活动。每个国家都得到了和平，因为他们对陛下已存恐惧之心，他的声威已震撼了他们的心灵。”“当他从赫塔国家回国时，蹂躏了（叛乱的）国家，并杀死了亚洲人，（带走了）他们的白银、黄金、天兰石、孔雀石，以及（各种）美好的东西……。”

公元前 14 世纪最后 10 年内，西提一世和穆西里二世相继去世，古代世界两位叱咤风云的人物，即拉美西斯二世和穆瓦塔鲁分别继承了埃及和赫梯的王位。两国的争霸战争于此时达到了顶点。

拉美西斯二世幼年就随父出征利比亚和巴勒斯坦，22 岁时便独自在努比亚地区作战。继位前，拉美西斯二世曾担任过突击部队和车兵首领，因作战勇猛在军中享有极高威望。有关他的铭文中充满了阿谀奉承的词句：“你是拉，你的身体就是拉的圣体。没有一个统治者比得上你，你举世无双……自拉时起，除了你之外，伊西丝女神从未爱过任何一个国王。……每个城市都应该知道你是所有人的神！”

穆瓦塔鲁是穆西里二世的次子，因长兄早逝，所以才继承了赫梯的王位。他的成长过程虽然不详，但无疑是在尚武的环境中长大的。继位后，穆瓦塔鲁任命他的弟弟哈吐西里为伊丝达女神的祭司，同时兼任安纳托利亚中部地区军事长官，他本人则把都城从哈吐什迁到离叙利亚较近的达塔萨，致力于利凡特地区的战争事务。

拉美西斯二世在当政的前两年内，主要致力于国内工程建设。到第 3 年，阿穆路在其国王本特西纳率领下发动叛乱，脱离赫梯，投靠了埃及。拉美西斯二世闻知此事后，于当年 5 月立刻率军超过边界，深入西亚，收复了阿穆路。穆瓦塔鲁把埃及出兵西亚看成是一次挑衅，因此，他于同年冬天征集了一支相当庞大的军队，准备和埃及决一死战。两国边境一时剑拔弩张，一场战争迫在眉睫。不久双方发生了著名的卡捷什之战。

卡捷什之战发生在拉美西斯二世当政的第5年，即公元前1300年，这是埃及与赫梯之间最著名的一次战役，也是古代世界的一次著名战例。

在战争之前，双方都作了长期的准备。拉美西斯二世组建了四个军团，均以神命名，即阿门军团、拉军团、普塔赫军团和塞特军团。每个军团约5000人。除此之外，还有从努比亚人、沙尔丹人中间招募的雇佣兵。整个军队人数在3万人左右，以战车兵，弓箭手和投枪手为核心。

在埃及人积极备战的同时，穆瓦塔鲁从臣属各国征集了约16000—20000人的队伍，从小亚细亚诸部落中也招募了一些雇佣兵。赫梯军队中至少有一半是战车兵。每辆战车上配备一名驭手，两名兵士。当穆瓦塔鲁得知埃及人的军事行动后，迅速召集王室会议，研究作战计划，而后差遣急使奔赴叙利亚各城，命令集结的军队迅速开往卡捷什城，以阻挡埃及军队北上。

卡捷什，位于奥伦特河上游地区，交通十分方便，几乎所有的商路都在这里交叉。穆瓦塔鲁选择卡捷什作为会师的地点不是没有理由的。除了交通条件外，卡捷什的地形也相当优越。整个城池位于一座高岗上面，一旦赫梯军队驻扎在这里，不仅可以居高临下，控制河谷，而且可以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很便利地观察敌军动态。

穆瓦塔鲁在卡捷什埋伏了重兵之后，派出两名细作，身着游牧服装，冒充贝都因人，并且故意让埃及军队俘获。当拉美西斯二世审讯他们时，这两名细作声称赫梯国王为避免与埃及人相遇，已放弃卡捷什，移到北方的阿列波去了。求胜心切的拉美西斯二世信以为真，于是只带着阿门军团的一部分渡过奥伦特河，贸然孤军深入，而将大部分军队抛在了后面。当他接近了卡捷什，并且在城市西北地区扎营时，穆瓦塔鲁已悄悄地把军队调到了城东，巧妙地掩饰了自己的行动计划和作战准备。

就在这时，埃及哨兵俘获两名赫梯侦察兵。拉美西斯二世从他们口中得知赫梯军队主力就在附近时，吓得魂飞魄散。于是，他一面急遣维西尔催促后面的军队迅速前来会合，一面调集自己的战车兵准备应战。但一切都已经晚了。无数的赫梯战车早已悄悄渡过了奥伦特河，在卡捷什南面突然出现。他们切断了正在列队行进的拉军团的行列，截杀了大批埃及士兵。而后急速奔赴拉美西斯二世的营地，将埃及法老与阿门军团围在中间。在赫梯车兵排山倒海的攻势下，埃及士兵惊慌失措，四处奔逃。

在侍卫和御林军的护卫下，拉美西斯二世召集自己所有的战车兵，开始向西侧突围。鉴于赫梯军西翼防守牢固，不易突破，而东翼布置在沿河一带，阵线不稳，因此，拉美西斯向西突围失败后，又转而向东，对东侧的赫梯战车兵发起了冲锋。就在这时，周围的赫梯士兵冲进了埃及的营帐，但他们没有一鼓作气，集中力量攻击拉美西斯，而是到处抢劫金银财物，使即将到手的胜利化为乌有。

在战争中，穆瓦塔鲁的八千名步兵始终驻扎在奥伦特河对岸，没有投入战斗。穆瓦塔鲁为什么没有动用这些步兵？我们不得而知。

当日已偏西，黄昏来临之际，普塔赫军团赶到，给拉美西斯二世带来了生机。埃及军队重整旗鼓，对普塔赫军团作了部署，第一线为战车兵，作为冲杀敌人的先锋；第二线由10个横排的重装步兵队组成，手持盾牌和长矛等武器，形成一个密集的阵列向前推进，在步兵队的两翼有战车兵保护，同时这些战车兵还去压迫敌人的两翼；第三线仍是战车兵，作为后卫或用来追击敌人，轻弓箭手穿插在第一、二线中间射箭扰乱敌人阵线。埃及人正是用其

方阵作战，打败了赫梯的战车兵，最终迫使赫梯军退出了战场。

但是此后不久，遭到惨重损失的拉美西斯二世也不得不向南撤退，承认卡捷什和阿穆路的丧失，把直到大马士革之间的广大地区留给了赫梯人。阿穆路国王本特西纳也成了赫梯的俘虏。

卡捷什之战并没有最终解决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归属问题。战后的拉美西斯二世曾多次企图重新夺回巴勒斯坦。在其当政第八年，他率军大举进攻西亚，攻克了一个又一个反叛的城市。第 10 年，拉美西斯二世重又推进到腓尼基地区，巩固了腓尼基南部沿海。

到公元前 1284 年，赫梯国王哈土西里三世迫于东部正在崛起的亚述王国的威胁，向埃及提出缔结和约的要求，并派出使者带着刻有自己印章的和约草案拜见了拉美西斯二世。因长期征战，埃及国内财富损耗极多，再加上本国兵员减少，雇佣兵越来越多，战争很难继续，因此，拉美西斯二世同意了赫梯的建议，也拟定了一份和约草案送往赫梯。最初的两份草案都铸在银板上，以赫梯文写成，后来又译为阿卡德文，但这两份草案早已失传。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和约条文都是写在泥版上的契形文字译文。这是历史上流传至今的最早一份和平条约。

条约规定，埃及和赫梯重新划定疆界。包括卡捷什、阿穆路、乌伽里特及其南部沿海邻邦西雅努等在内的叙利亚大部都归赫梯所有；只是在地中海沿岸，埃及占领区向北推进了一点；两国从此之后不再为敌；在遭到第三国侵犯或发生人民起义时，相互提供军事援助，引渡各自的逃犯等等。为了巩固埃及与赫梯的同盟，拉美西斯二世娶了哈吐西里三世的女儿为妻。

自和约签订之后，两国再也没有交战。不过，赫梯在东部的亚述王国，以及西部所谓的“海上民族”的冲击下，国力迅速衰落。公元前 1200 年之后不久，印欧人的一支伊里利安人闯入小亚细亚，颠覆了赫梯王朝。埃及在拉美西斯三世时期，虽然顶住了“海上民族”的冲击，但其国势也已日薄西山了。

帝国的末日。拉美西斯二世的长期战争，并未能恢复 18 王朝图特摩斯三世时期埃及的庞大版图。在战争的同时，拉美西斯二世曾兴建了众多的建筑物。然而，其统治后期的建筑，无论在规模还是在技艺上都明显下降，这是国内经济严重衰退的具体体现。拉美西斯二世之后，埃及帝国每况愈下，不久便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局面。

据《哈里斯大纸草》记载，在第 19 王朝末期，埃及国内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来自于叙利亚的伊尔苏领导了一次奴隶大起义。拉美西斯二世的继承者梅尔涅普塔死后，王朝内部又开始争权夺利。

法老塞特那赫特镇压了伊尔苏起义，建立了第 20 王朝，但就在他当政的三年间，国内战争不断。拉美西斯三世统治时期，埃及国势稍稳，使他能够集中力量对付利比亚部落和“海上民族”的不断骚扰。

为了抵抗卷土重来的利比亚人和“海上民族”，拉美西斯三世把国内居民划分为若干集团，以便随时抽调兵员；又从利比亚人和地中海的沙尔丹人中间招募了雇佣兵。利比亚人和“海上民族”的两次进攻虽然都被击退，但埃及却丧失了先前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大部分领土，所能控制的也只有西奈半岛和巴勒斯坦的南部地区。

拉美西斯三世不久死于宫廷政变。他的后继者拉美西斯四世至拉美西斯十一世的统治总共只有 80 年。在此期间，埃及丧失了巴勒斯坦和努比亚的统

治权。在王权衰落的同时，僧侣的地位，特别是阿门僧侣集团却越来越强。王权的削弱和僧侣集团的增强，终于引起埃及统一帝国的分裂，称霸一时的新王国也随之瓦解了。

后期埃及。拉美西斯十一世时，努比亚总督潘纳西率军进犯埃及。双方经底比斯一战，努比亚人虽然战败，但集宗教和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僧侣王霍里赫尔乘机夺取了底比斯的政权。他自称国王，并另创了一套纪年系统。与此同时，法老斯门戴斯以塔尼斯为中心，在下埃及建立了第 21 王朝。南北两大势力以埃尔—西巴为界分裂了埃及。

公元前 945 年，来自于布拔斯提斯的利比亚人喜霞克一世建立了第 22 王朝。他乘底比斯王朝衰落之机占领了它，暂时统一了埃及。100 多年后，在塔克罗特二世统治时期，埃及重新衰落。不久国内发生内战，帕都巴斯特一世乘机建立了第 23 王朝，舍易斯的统治者特夫那克特建立了第 24 王朝。努比亚国王卡希塔在南方建立了第 25 王朝。到公元前 8 世纪末期，埃及出现了无数的小国王，王权被彻底瓜分了。

这几百年分裂混乱，被外族僭居王位的情况，说明埃及民族及其文明已处于衰竭而难以自拔的境地。不久，亚述帝国统治者阿萨尔哈东从前 674 年大举进攻埃及，其继任者阿述尔巴尼拔也大举南征，占领了三角洲一带地区，并与努比亚人反复争夺于孟斐斯、底比斯之间，这是埃及本土遭受外来帝国统治的开始。

不久，埃及摆脱了亚述的统治，特夫那克特的后裔，舍易斯的普萨姆提克于公元前 655 年宣布独立，并建立 26 王朝（公元前 664—前 525 年）。驱逐亚述军旅以后，普萨姆提克还征服了南方，使埃及在 26 王朝的百余年间恢复了全国统一，史称舍易斯复兴。

公元前 525 年，新兴的波斯帝国又侵入了埃及，埃及被纳入波斯帝国的版图，27 王朝实际为波斯王朝。28、29、30 王朝则是从公元前 404 年开始的埃及人建立的独立王朝，到公元前 343 年波斯再度征服埃及，称 31 王朝，最后于公元前 332 年埃及又被希腊人征服。历史传统上一般以公元前 525 年波斯征服埃及作为埃及独立丧失和埃及文明结束的年代。

埃及在别的民族统治之下，失去了独立发展的条件，埃及文明也渐趋衰亡。当埃及人的草书体吸收了希腊字母而演变为科普特文字，象形文字逐渐湮没而成为死亡文字时，古埃及文明的传统也就最后断绝了。

## (2) 新王国时期发达的军事

步兵、战车兵及兵制建设。希克索斯人从西亚给埃及带来了马拉战车，因此到新王国时期，埃及打破了单一步兵兵种的局限，不仅拥有步兵，而且发展起了战车兵。

战车兵一般由贵族担任，在开始时战车兵数目不多，作为一个支队，分属于步兵的各个军团。到 19 王朝时它才与步兵并列形成一个独立的兵种，能够独立作战，并有自己的组织和指挥机构。战车兵的首领叫“马官”，由被称为“马厩主”的一些官员协助，而他们负责补给和训练等事宜。另外还有一些直接指挥战斗的战车兵指挥官，正因为有了具有强大冲击力的战车兵，埃及军队才有力量与小亚强国赫梯对抗。当时埃及战车兵使用的武器是弓箭，而赫梯战车兵用的是长矛，弓箭在作战中可以充分发挥先发制人的优势，因此，虽然赫梯战车兵的历史比埃及的长久，但赫梯也很怕新兴的埃及

战车兵。

战车部队分若干支队，每支队有 25 辆战车。每辆战车上一般有驭者和战斗士 2 人。作战时，驭手站在右边自由扬鞭驾车。战斗士站在左边发射箭支。后来的希腊人就是采用了这种作法。

新王国的步兵按其装备不同，开始分为重装步兵和轻装步兵两种。重装步兵身着衣甲，手持盾牌，大多使用长矛，也有使用锤矛、战斧或长柄斧等进攻性武器，而且还随身佩有剑、腰刀、曲棍或手斧等备用武器；轻装步兵无衣甲、盾牌，弓箭手就属于轻装步兵。在步兵中除了埃及人以外，还有一些努比亚人、利比亚人以及亚洲人的雇佣兵。

步兵在攻城战中能发挥最主要的作用。新王国时期，埃及不仅拥有云梯，而且出现了龟甲阵和破城锤两种攻城器械。龟甲阵是几排攻城兵手举盾牌在头上方塔成一个棚子，状如龟甲，借以掩护攻城；破城锤是一根尖头大木梁，头部包以金属，用以冲撞城墙。埃及步兵还采用掘地道的办法攻城。

作为军事霸国时代的新王国时期，埃及拥有一支相当大规模的常备军，而且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职业兵。新兵录事官在全国各地募兵，但常备军主要是从士兵家庭和安置在军事殖民地周围的后备队中来补充。新招募的士兵则组成训练队卫戍孟斐斯和底比斯。

国王给退伍老兵发放土地、奴隶和牲畜，但他们也要交纳赋税。这些财产，可由退伍老兵的家庭继承、占有，但其直系男性继承者必须继续在陆海军中服役，即父子相承。

埃及步兵一般被分为几个军团，这些军团被称为“梅沙”（意即部队），皆以埃及的主要神来命名。每个军团的前方都飘荡着自己神的旗帜。每个军团大约有几千人，下又分连队，连下设排，排下设班，逐级形成领导结构。

埃及海军一直比较强大，大型舰船能容纳 200 名受过航海训练的士兵，一般舰船都有高大的帆和一系列桨橹。在第 20 王朝一个描绘埃及人同“海上民族”进行海战场景的浮雕上，埃及舰船的船首已表明可用来冲撞敌船。后来希腊、罗马海军都采用了用船首冲击敌舰的战斗方法。

兵器装备及其制作。埃及的战车是用木料制成的，车体较小，不设座位，底部是用皮条或绳索交织而成的网状，以便利用其弹性使奔驰的战车保持平稳。车轮在车体的末端，左右各一个。车轮的轮缘较窄，轮辐有 4 根、6 根或 8 根不等。一个单辕杆牢牢固定在车体上。每辆战车套两匹马，上乘两人，一名驭者，一名战斗士。

新王国时期的进攻性武器种类多样，有弓箭、矛、标枪、投石器、短剑、匕首、腰刀、战斧、手斧、锤矛和曲棍等。其中不少比以前有了明显的进步。

埃及人的弓一般用圆的木条制成，长度为 5—5.5 英尺。这时，埃及出现了复合弓，是在木弓上嵌以羚羊角的薄片，外覆一条牛筋，用棕榈树皮将这些配件紧紧缠在木弓上。复合弓拉力大，射程远，杀伤力也很大。箭杆一般长 22—34 英寸，有木制的，也有芦苇制的。金属作箭头，杆尾用三支羽毛作翼，以保持箭发出后的平直飞行。

矛，一般是木制杆，长 5—6 英尺。铁制或青铜制矛头，带有双刃，中有一孔，以便矛杆插入其中，并用钉子钉牢。手斧较小，单刃；战斧较大，青铜或铁制刃部呈弓形。投石器是用一条皮带或绳索制作的，中间宽，用以兜石。投石器的一端有环，可以手握住，另一端在抛石块时从手指中间脱掉，让石块从投石器中飞出。

埃及人的防护装备，在新王国时期不仅拥有盾牌，而且还出现了盔甲。上圆下方的盾牌可及身长的一半，木框外罩以带毛的牛皮，用钉子钉牢。头盔通常是用皮革缝制的，很厚，一般达于耳下的颈部，长者可垂至肩部，头盔的形状一般与头形一致，像假发一样扣在人的头上。埃及人还有青铜盔，但比较小。鱼鳞甲衣由 11 行横排的金属片组成用青铜钉加以固定，袖很短，有时不到肘的一半。胸甲很长，一般不短于 2.5 英尺，下部用腰带紧束腰间。袖长几乎达于肘部，大部分无领。许多士兵还穿着用亚麻缝制的软材料甲衣背心。从埃及的壁画和浮雕来看，埃及士兵无论在平时还是在战时，都很少穿甲衣，这与亚述军队有明显的差异。

埃及有大量的军工生产作坊和保存兵器的武库。在门黑培尔—拉斯涅巴的壁画中，有一幅描绘几个匠人制造战车的场景，一个匠人站着用力安装车体，旁边坐着的匠人像在把木料弄弯，另三个匠人正在制造车轮；还有一幅描绘了几个匠人正在制造弓箭，有的制弓，有的作箭，都在紧张地劳动。新王国时期埃及法老们经常对外征伐，需要大量兵器装备，可见军工作坊匠人的负担也是相当沉重的。

埃及人的战斗方法。当埃及法老决定对外远征时，每个州要提供一定数量的兵员，通常集中到固定的集合点底比斯、孟斐斯或皮鲁塞姆，等待国王来统率他们出征，有时可能由国王委派的将军率领。远征的领袖到达后，先举行对神的祭祀，如同中国古代远征前的祭师，祈求神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给予帮助。然后，用喇叭发出集合信号准备出征。士兵集合起来后在行列中要向出征领袖鞠躬致敬，有点像出征前的阅兵。当进军开始了，战鼓齐鸣，战车作先锋，国王乘自己的战车，在拿着掌扇的官员们的伴随下，进入自己的指挥位置，前后跟随着各种步兵团。

在战场上，当号手吹响进军喇叭后，首先是弓箭手列阵向敌人发射如阵雨般的箭支，然后战车兵驾车向前冲锋，重装步兵一手持矛或棍棒，一手持盾同时以密集队形向前推进，战车从侧翼包围，并压迫敌人的中央和两翼。弓箭手仍在发射箭支扰乱敌人，使敌阵陷入混乱，配合别的兵种作战。

埃及人一般不杀放下武器的战俘。战争一结束，士兵立即把砍下来的被杀者的手堆在一起放在国王的面前，有军事秘书计数断手，查明并向国王汇报灭敌的数量。然后，士兵根据战功得到相应奖赏，抓获俘虏也有专为俘获者所设有的奖赏。在战场上或敌人营垒中所获得的武器、马匹、战车和别的掳获物，也被收集起来，由官员查明数量上报国王。战利品有时被堆在一起，用竖立的盾牌所筑成的临时墙和柳条门围绕起来，在门内外设警卫守卫。

当部队围攻设有堡垒工事的城市时，步兵在弓箭手的掩护下，搭云梯攀登壁垒，或者在遮棚的掩护下，用破城锤撞击城墙。有时埃及士兵就搭遮棚作掩护，挖地道攻城。而且埃及人利用挖地道攻城，比其他民族都普遍。

出征有时要在外建设野战营垒，作为临时性宿营地。营垒呈正方形或平行四边形，在一面设有主要的进出口。营垒中央是将军和主要军官的帐篷，外绕以双重的壁垒或壕沟。其它帐篷搭在围墙的外面。在接近外围的地方，有留作喂养马匹和载重牲畜的空地，另一个地方则排列着战车和辎重。哨兵在帐外睡觉或守望。

埃及人从第 18 王朝开始，废除了以前经常设置堡垒的制度。除了边境重地设防外，城市不再设防。埃及人的两个首都——底比斯和孟斐斯都不是有城墙的城市。为了给军队提供驻地，神庙周围修建了高耸的角锥形的石头搭

楼，它凸出围墙以外，能够俯瞰围攻者并射击他们，大门上的胸墙可掩护保卫进口的士兵。神庙往外是泥砖砌成围墙环绕的城堡，神庙位居城堡中央，每一座神庙就是一个独立的堡垒，又是战时避难所，由它保护自己和城市，由此可见当时的神庙已和军队紧密结合起来，达到了相当的融合，这是新王国时期政治状况在军事上与以前不同的新的反映。

## 四、古代西亚

### 1. 苏美尔文明——两河文明的源头

#### (1) 苏美尔城邦的形成

两河是指亚洲西南部注入波斯湾的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古希腊人称为“美索不达米亚”，意即“河间之地”。这是世界最早的文明发源地之一。而两河文明的较集中的代表是巴比伦，故又称巴比伦文明。按其发生之早，成就之高和对后世影响之大而言，两河文明皆可与埃及文明相当。

两河下游南部，文明开化较早，在公元前 5000 年后期就已进入铜石并用时代。这里的居民在南部的叫苏美尔人，北部的叫阿卡德人。大约从公元前 4300 年开始，苏美尔地区出现奥泊德文化（公元前 4300—前 3500 年），其较大居民点有埃利都、乌尔、乌鲁克、拉格什、尼普尔、基什等，日后都发展为苏美尔重要的城邦。紧接其后，苏美尔发生乌鲁克文化（公元前 3500—前 3100 年），苏美尔文明的曙光此时更显灼亮，国家开始萌生，城邦开始形成。此时城镇的发展较奥泊德文化时期更为明显，围绕着乌鲁克已形成中心市镇、小镇、农村的格局，日后这些村镇愈加增多，又从中心市镇中产生主要城市，此即苏美尔各城邦的都邑。乌鲁克文化产生了奠定苏美尔文明传统的三项成就，也就是神庙建筑、圆柱形印章和文字的发明。继乌鲁克文化之后是捷姆迭特·那色文化（约公元前 3100—前 2900 年），这时各奴隶制小国的中心城镇作为城邦首邑已进一步发展起来，出现了最早的楔形文字。当时最大的城邦仍是乌鲁克、基什、乌尔和尼普尔。当时的人们开始使用驴拉的轮车，但不知用马。在芦苇束编的船只之外，也开始用木料造船。接下来遂进入苏美尔早期王朝时代（公元前 2900—前 2371 年）。

早王朝时代，苏美尔城邦林立，而且各城邦分立的局面贯穿始终，但是此时的各城邦已建立起稳固的国王统治。此外，这时神庙在苏美尔的生活中也很重要。王宫和神庙成为苏美尔国家的两大支柱。

这时，在苏美尔出现了战车作战。考古发掘的乌尔第 1 王朝（约公元前 2700—前 2600 年）的乌尔军旗镶板上雕刻了乌尔城邦利用战车作战的故事。乌尔战车有 4 个轮子，轮的外缘很宽，内缘很窄，直接同轴结合，没有轮辐。车厢略呈长方形，前部隆起，有作掩护用的小盾和斜挂着的标枪筒。战车由 4 头驴子拉着，驾驭者和佩带斧子的战士在作战时站立在车厢上，以便于灵活驾车和机动出击。这大概是古代世界最早的车战。乌尔还有轻装步兵和重装步兵。轻装步兵披有可能是皮制的长斗篷用以保护身体；重装步兵配备以短枪，头戴略呈尖状的头盔，列成散兵队形进攻敌人。

大约公元前 2500 年的拉格什国王安那吐姆遗留的鹫碑也刻有拉格什士兵作战的图画。安那吐姆站在战车上，手举标枪，率领排成可能是正面 6 人、纵深 4 人的苏美尔密集方阵的士兵正向敌人进攻。方阵的战士都是由头戴尖盔、手持重盾和矛的重装步兵组成。这很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方阵。

公元前 2378—前 2371 年，苏美尔国家拉格什在乌鲁卡基那的主持下实行政治和军事改革。他打击暴政，限制特权，减轻农民的负担，壮大公民队伍，兴修水利，使军队的主要成份也由贵族垄断的重装战车兵改为平民组成的轻装兵。但是不久，邻国温马国王卢伽尔萨吉西攻入并焚烧了拉格什。

温马的卢伽尔萨吉西在战胜拉格什后，又征服了几个苏美尔城邦，伊然有统一苏美尔之势。但在基什夺得王位的塞姆族人萨尔贡建立起更强大的阿卡德王权，最后一统苏美尔全境，两河历史进入塞姆族人的阿卡德王国的时期。

## (2) 阿卡德王国及其常备军的建立

公元前 2369 年，萨尔贡一世当上阿卡德王国的国王，在历史上第一次统一了两河流域。

萨尔贡一世（约公元前 2371—前 2316 年），是塞姆人，和苏美尔非同族，而且出身卑微。本来是个弃婴，“母卑，父不知所在”，后被一个园丁收养。长大后服务于宫廷，以国王近臣身份逐渐熟悉了军政要务和具备了必要的修养。曲折的成长过程，使他比世袭接班的普通苏美尔国王在审时度势、善于用兵方面高出一筹。

萨尔贡建立了两河流域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支常备军。而在此以前，苏美尔城邦的军队从公民中征集，士兵均来自于田野中的农夫，战时临时召集出征，战争结束则解甲归田，又再从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田生活。只有少数丁勇差役任警卫监守之职。这种没有经过一定军事训练的乌合之众，非常容易因一两次战役的胜败而影响军心士气，致使影响战争全局，因此是不稳定和不牢固的。现在萨尔贡则专门挑选 5400 名青壮年组成直接归他领导的精锐部队，“每天都在他面前用膳”，也就是说，专职当兵，常备不散，平时进行严格的军事技术训练，并可作为萨尔贡的近卫军护卫他的个人安全，战时担任主力出征作战。萨尔贡的军队以准确的弓箭训练著称，其弓箭队在当时使敌人闻风丧胆。而且，萨尔贡注意培养士兵近战的勇敢精神，每遇敌人近身，便以徒手肉搏而制胜。事实证明，这支常备军对苏美尔各城邦确有摧枯拉朽般的威力，几乎无往不胜。据说，萨尔贡进行过 34 次东征西讨，都获得胜利，方完成两河流域中下游的统一。常备军的优越性在这些远征中充分表现出来，因为它不仅较之苏美尔公民兵训练有素，而且在时间、空间上都可随战略的需要形成强大的野战兵力，避免了公民兵不能长期远离本邦作战的局限。由于是职业的常备军，它还可随对外战争的需要而随时随地不断扩充，以致在质量、数量方面都居较大优势，苏美尔各邦也就更难以抗拒了。当然，常备军的建立只是为萨尔贡统一两河流域提供了重要支柱，两河的统一在当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由于苏美尔农业上水利灌溉工程的需要，土地国有，农村公社没有完全解体，周围游牧部落的侵扰，这一切都要求两河流域如埃及一样，在较早时期便走向统一。在文明开始不久，小国分立便很快形成大一统的王国，最终发展到帝国。

萨尔贡与温马王国的卢伽尔萨吉西都想控制整个两河流域。起初，双方都想用不战而胜的方式实现这个目的，曾举行过两次谈判，但都破裂，双方便诉诸于武力。萨尔贡利用其强大的常备军，尤其是以射击准确著称的弓箭队打败了卢伽尔萨吉西，并俘获了他，用套狗的绳索套住拖到尼普尔主神恩里尔的庙门口，锁绑在那里，作为牺牲献祭给恩里尔。文献说这叫“让他穿过恩里尔的火烧的大门”。

接着，萨尔贡率兵南下，攻取乌尔，征讨拉格什，蹂躏乌鲁克，降服温马。昔日的苏美尔各邦，尽遭摧毁，靠近河口的城镇，统统归顺于他。在南

部，他甚至曾“洗剑于波斯湾”。之后，他越海东征埃兰，夺取苏撒、阿凡和巴拉西等城市。随之，他又兵指北方的苏巴尔图王国（即亚述），从而几乎征服并统一了整个美索不达米亚。此时，萨尔贡开始自称为“沙鲁金”（意为真正的国王），“天下四方之王”，还声称他是“最高女神伊丝达所宠爱的人”，是主神“恩里尔不许敌人统治的国家的国王”，神化其王权，加强其统治。

但是萨尔贡只是暂时征服了所及的边远地区，虽然兵锋所至，国亡城破，但在其收兵之后，各地仍继续独立发展，而阿卡德王国本身也并未发展到能在这些地区建立帝国统治的程度，因此只是暂时的武力征服。萨尔贡晚年，“全国各地都起来反对他，并把他围困在阿卡德城”。起义虽被镇压，但统一犹未臻巩固。到阿卡德王国第四王纳拉木辛（公元前 2291—前 2255 年）时，他虽又强化中央集权，南征北讨，但已不能挽救内乱外患的此起彼伏。他死后不久，阿卡德王国迅速走向衰落。来自两河流域东北面山区的游牧民族古提人灭亡了阿卡德王国。随后古提人被苏美尔各邦联合力量击败，退回山区，苏美尔取得了完全独立。

苏美尔又出现城邦分立。但是不久，经过拉格什、乌鲁克、乌尔三雄一番角逐之后，乌尔取得胜利，遂以乌尔第三王朝（公元前 2113—前 2006 年）的名义统一两河流域南部，进入苏美尔文明的最后一个发展阶段。

乌尔第三王朝恢复并且强化了中央集权体制，国王集军、政、法于一身，国王的神化亦较前尤甚，地方贵族势力受到严重削弱。但在文化上，乌尔第三王朝在全面恢复苏美尔文明传统的同时，又有较大发展，总汇了许多苏美尔文明最高成就之大成。不过，乌尔第三王朝比阿卡德王国寿命更短，它在东面的埃兰人和西面的阿摩利人不断侵袭夹击下灭亡。埃兰人不久即回归故土，塞姆族的阿摩利人在两河流域定居下来，并吸收了苏美尔——阿卡德文化，建立伊新、拉尔萨和巴比伦第一王朝。在伊新之北，另一塞姆族的国家埃什努那亦告兴起。同时属塞姆族的马里也从北方南下参加各邦角逐。从此，古老的苏美尔城邦已告衰竭，未能再振雄风，此后两河流域便成了塞姆人的天下。

## 2. 古巴比伦王国与“寓兵于农”制

### (1) 汉谟拉比实行“寓兵于农”制

公元前 1894 年建立的巴比伦第一王朝，在它头 5 个国王统治期间，在与伊新、拉尔萨等邦的角逐中尚不居重要地位，后来拉尔萨为埃兰所破，马里和埃什努那又臣服于北方的亚述，伊新也趋衰落，巴比伦才乘机而起，在其第 6 位国王汉谟拉比之时（公元前 1792—前 1750 年）才统一全境，文治武功皆取得空前的成就，巴比伦也才成为显赫一时的统一两河流域的大国。

汉谟拉比为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非常注重其常备军的建设。为了保证战时随时可召来士兵，采取了“寓兵于农”的政策。

当时的士兵被称为列都、柏以鲁。列都，苏美尔语为乌库苏，直译为“跑路人”，转译为“随从”、“差役”、“驭者”，有的学者译为重装步兵。文献中有时也称为“王之跑路人”，阿卡德语称为里德萨利姆。列都在战时服军役，平时为国王传递命令，执行警察任务，维护社会秩序；柏以鲁，直译为“渔夫”，苏美尔语称苏库。有的学者转译为“水手”、“捕吏”、“猎

人”、“水上警察”和“轻装步兵”等。柏以鲁和列都一样，战时服军役，平时管理河渠和灌溉网，拥有河流的捕鱼权，经营河流的运输业。

在“寓兵于农”制度下，士兵可以从国家领得服役份地（包括田园、房屋和牲畜），条件是随时应召随国王出征。这在《汉谟拉比法典》中得到充分体现。法典中有 16 条涉及士兵的份地及其物质利益问题，其中第 26—41 条对士兵的权利、义务关系有详细规定。

《汉谟拉比法典》反映出寓兵于农的列都和柏以鲁从国王那里所领得的田地、园圃、牲畜和房屋，不允许出卖、转让、抵债，也不能由妻子和女儿继承，只可以允许继父服役的儿子继授。每个士兵的份地，少者一布耳（约合 6.35 公顷），一般为二布耳。这样，士兵被固着在土地上，一旦国家有战事，招之即来，不来则处以死刑，也不允许顶替。这样保证了汉谟拉比拥有一支强大的随时可以征召的常备军，只是这种常备军平时作耕、战时出征，有一定的公民兵制色彩，但又摆脱了公民兵制下士兵可能不应征或除非公民不能应征的局面。寓兵于农制的实行，既可以保持国家的军队，处于实质的常备状态，又可以节省军费，不但可以节约国家开支，还能增加生产，发展农业。汉谟拉比正是依靠这支寓兵于农的常备军，南征北战，建立了一统的强大的古巴比伦王国。

## (2) 古巴比伦王国的霸业与灭亡

汉谟拉比登基时，巴比伦领土不过百里，要想战胜四周的邻国，首先必须巩固内政，发展经济。因此在他当政头几年，他向北方的亚述强国称臣，致力于内政建设，制定法律，修筑城墙，重建神庙，兴建运河，努力积聚实力，消弭内争。

当汉谟拉比当政第 6 年时，巴比伦有了较大发展，他才把对外扩张摆到日程上。他是一位长于谋略的国王，善于审时度势，军事压力与外交手腕并用，充分利用矛盾，把众多敌人各个击败。他的基本战略是远交近攻，尽可能团结较多盟友，集中全力打击一个主要敌人。

为了战胜南方紧邻伊新，汉谟拉比便和北方的马里、南方的拉尔萨结盟，继续承认亚述的统治，以便取得其支持，以强大的军队一举灭亡伊新。

伊新既克，更在其南的拉尔萨便成为巴比伦南进的主要障碍。为使南进没有后顾之忧，汉谟拉比在灭伊新之后，把巩固北方当作要务，于是他特别致力于与北方的马里结好。

汉谟拉比与马里国王吉姆里利姆约定在国际事务中采取联合一致的行动，在军事上互相支援。汉谟拉比支持马里摆脱亚述的控制，又帮助它击退草原部落与东邻埃什努那的侵扰，因而两国相当交好。

汉谟拉比取得了马里的信任。战胜伊新已过几年，军队战斗力有所休整并有壮大，于是在公元前 1764 年出兵击败埃什努那。再过一年，又对拉尔萨发动了决定性的进攻。

汉谟拉比很可能采取控制河水——壅水或突然放水的斗争手段，使幼发拉底河下游的敌国拉尔萨遭受重大打击。经过对拉尔萨最后要塞的数日围攻，巴比伦终于战败拉尔萨。两河流域南部便完全归入巴比伦版图。

南方既定，剩下的征服对象就是北方的盟国马里。马里国王吉姆里利姆意识到这一局势后，便召回了和巴比伦一起在拉尔萨作战的部队。但是，他毕竟醒悟已晚，汉谟拉比已挥得胜之师乘胜北上征讨。公元前 1759 年，马里

只有臣服于汉谟拉比。

随后，巴比伦又占领幼发拉底河上游的厄布拉，并向北面的亚述用兵，占其南部国土，亚述王朝以称臣方式生存下来，保持半独立状态。接着巴比伦又决河攻灭埃什努那。至此汉谟拉比终于统一两河流域全境，统一的规模较阿卡德王国有过之而无不及。

巴比伦王国的太平盛世在汉谟拉比死后不久即难维持。其继任者很快面临动乱分裂的威胁，南部地区发动暴动，东部山区的加喜特人也欲问鼎中原，开始侵袭巴比伦。国内矛盾更为尖锐，奴隶纷纷逃亡。公元前 1595 年赫梯人攻陷巴比伦，古巴比伦王国和巴比伦第一王朝便告结束。但赫梯人并未久留，他们退兵后由伊新人建立巴比伦第二王朝（公元前 1590—前 1518 年），接着外来的加喜特人建立巴比伦第三王朝（公元前 1518—前 1204 年），后来巴比伦人又建巴比伦第四王朝（公元前 1165—前 689 年）。但是千年之间始终未能再度恢复汉谟拉比强国的繁荣。直到公元前 8 世纪亚述帝国兴起，两河流域才发展到奴隶制政治，经济和军事高度发展的帝国阶段。

### 3. 亚述军事帝国及其发达的军事

#### (1) 早期亚述的发展

亚述帝国是世界史上第一个可以称得起“军事帝国”的国家。帝国的历代诸王几乎都是在不断扩张征伐中度过的，而且其军事发展的完备堪称是古代世界最发达的。

亚述位于两河流域北部，在公元前 3000 年左右，有属操塞姆语的亚述人以底格里斯河两岸的亚述城为中心建立的城邦。当萨尔贡、汉谟拉比强盛时曾表示臣服，但始终保持半独立地位。只有在两河流域南部的强大王权衰微之后，亚述才恢复独立，自谋发展。

古代亚述的历史从苏美尔时期，到亚述帝国连续 2000 余年，一般分为古亚述、中亚述和帝国 3 个阶段。古亚述（公元前 2000—前 1600 年）从塞姆人北上定居立国开始，到阿卡德时期，王权才渐强大。到国王沙马什阿达德一世时（公元前 1815—前 1783 年）开始向外扩张，埃什努那、马里皆表示臣服，汉谟拉比在位初年亦曾向亚述表示归顺。但不久亚述被汉谟拉比击败，长期偏于两河北部一隅。中亚述时期（公元前 1500—前 900 年），在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一世时（公元前 1114—前 1076 年）曾颇为强盛，后来又遭亚美尼亚人侵扰，国势转衰。直到公元前 9 世纪初，从亚述纳西尔帕二世（公元前 883—前 859 年）开始，亚述才以两河强国雄姿向帝国跨越。

纳西尔帕二世率军曾经藉助吹满气的皮囊筏子渡过幼发拉底河进入卡尔赫米什城。其国王桑卡拉缴纳了大量贡赋，包括 250 塔兰特（1 塔兰特=26.19 公斤）的铁，这表明亚述已进入铁器时代。铁的广泛使用，在军事上尤为重要，亚述军队就是以铁制武器装备，又有战车和骑兵，成为两河劲旅，所向披靡。

有浮雕表明，纳西尔帕二世时期亚述出现了攻城器械破城锤。破城锤的设计多种多样，锤身是根大木梁，头部包以金属皮。破城锤罩以用柳条、木材或兽皮制成的构架，藉以保护操作者，破城锤分固定和带轮可移动的两种。为了防止敌人火烧破城锤，要备水预防，或在锤前面挂一块不易燃烧的幔帐。一幅浮雕上还刻有敌人用链环套住锤头，然后将其吊起的办法，亚述人以钩

子把链环钩住相抗。破城锤一般是吊在器械的链子上，由士兵摇动，从地面上直撞城墙。有时还在城墙外侧堆起很高的土墩，然后把破城锤推到土墩上向前撞击城堡上部。古希腊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就曾利用过堆土墩，用破城锤攻城。

到国王沙尔马纳塞尔三世（公元前 858—前 824 年）时代，他曾多次远征乌拉尔图，也曾西征叙利亚，占领了其首都大马士革。大马士革处于从美索不达米亚到腓尼基的各沿海城市和从小亚细亚到阿拉伯腹地的商路交叉点上，因而占领大马士革，对亚述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沙尔马纳塞尔三世还从大马上革掠夺了大量的铁，多达 5000 塔兰特。大马士革的铁是从小亚输入的，但铁制品是由本地的匠人制造的。亚述人也从最初的掠夺和输入铁，到自己开采并冶炼铁矿，其冶金匠人所制造的铁制品质量很高，保证了亚述军队的先进性。大约从公元前 9—前 8 世纪开始，亚述军队就已逐渐用铁制的兵器和盔甲武装起来，这是亚述军队装备上的重大变革。

## (2) 亚述的兵器装备

攻击性兵器。亚述人的攻击性兵器或叫杀伤性兵器，一般包括矛（或叫枪）、锤矛、剑、斧或手斧、匕首、弓箭及攻城器械破城锤和投石器。

亚述人使用的矛主要在作战时像枪刺一样用于刺戳，不像希腊人或罗马人那样用来投掷刺中敌人。矛主要分短矛和长矛两种，短矛长 5—6 英尺，主要用来武装步兵；长矛为长 9—10 英尺，主要用来武装骑兵。这两种矛的矛柄都是用坚硬的木料制成，矛头是用铁或青铜制造的，在今天的大英博物馆就存有在尼姆鲁德发现的铁制矛头。

亚述人的剑短而直，与埃及和波斯的短剑相像。剑柄较短，没有护手。剑身从柄至尖部逐渐变细。各兵种一般都佩有短剑。亚述士兵习惯用它砍杀战败敌人的首级；进行肉搏战时，用这种兵器进行刺戳。

锤矛是亚述人的一种独具特色的兵器。它比较短细，用坚韧的木料或金属做成。其形式是在一根细长的棒上带有一个圆形锤，这个棒顶端的圆形锤大概是铁制的。锤矛杆的下端有皮套或绳索，使用锤矛时把它套在手上不致甩掉。步兵弓箭手在战斗中经常携带，特别是靠近国王的侍从。然而，这种兵器很少在战争场面中见到，直到最晚期的浮雕中才发现双手挥舞锤矛的士兵。和平时期，锤矛通常为国王的侍从佩带，有些国王也喜爱用锤矛。在波斯国王薛西斯远征希腊队伍中的亚述兵，就曾携带有这种“安着铁头的木棍”。

战斧，亚述人最初在战斗中也很少使用，只是到很晚的浮雕中，才发现被描绘作为战士使用的战斧。在早期，战斧可能是用来砍伐树木的，当工兵出现后，成为工兵的武器。后来，特别是在阿述尔巴尼拔时代，才作为一种战斗武器用于作战。战斧的斧柄短而斧头稍大，单手使用，分双刃和单刃两种。

亚述国王几乎都酷爱匕首，每时每刻都佩带在腰间，但臣民似乎很少携带。匕首一般有一个直柄，带有轻度的凹面。雕镂有图案，但是匕首的鞘不像古代中国匕首的鞘，一般没有装饰或稍作装饰。

亚述人的弓分为两种：曲形弓和角形弓。同埃及人和中世纪弓箭手所使

用的弓相比，亚述人的弓较短，弓弦的最大长度约有4英尺，而埃及人的弓可长达5英尺。这些弓一般用木料制成，角形弓的整个弓身都一般粗细。曲形弓则从中间到两端逐渐尖削。两端都有一个较小的节或纽，接近节或纽处有个缺凹或小沟，以使用来挂置弓弦。弓手要曲身把右膝放在弓的中间内侧往下压，同时两手握弓的两端往上拉。当弓的两端弯到足够程度时，由站在旁边的协助者把弦滑过小节进入沟凹处，弦就挂上了。

亚述的角形弓比曲形弓小，较少使用，一般用作备用武器。亚述人常把弓挎在肩上，或者放在背后的弓鞘中。弓鞘是箭筒的一部分，弓很大，箭筒只能容纳弓的下半部分，而上半部分则露在外面。

步兵和骑兵弓箭手一般把箭筒斜背在背上，以便随时从右肩上从箭筒中抽出箭支，用来发射。乘战车的弓箭手则把他们的箭筒挂在战车的侧面。

亚述人的箭支在结构上可谓完美无缺，箭杆既细且直，大概是用芦苇或某种轻而坚韧的木料制成。箭头是用青铜、镍、铁等金属制成，甚至还在亚述的废墟中发现了一些石箭头。为了增加射击强度，一般在箭头的中央带有一条隆起的线。下端中间镂空，箭杆嵌入其中。箭杆上的V字形槽口和羽毛是后来被仔细地加上去的。箭尾带有两道羽翅不像埃及的箭尾由三道组成，末端的槽沟很宽，因为弓弦比较粗壮，这样可以把箭杆牢固地搭在弓弦上。

亚述人拉弓的方式比较特别，拉弓的方向是朝肩部方向，不像一般的向胸方或耳方拉弓。直到后期，亚述人的射箭操作才更加精确。弓箭手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拿着箭支羽翅的下边，食指弯曲，把V字形槽口搭在弦上，只用拇指和食指向后拉箭，不用其余三指。弓被握在左手的拇指和其余手指之间，拇指翘起，然后向后拉箭杆，直到箭头接触到左手的食指，右手才放开箭，箭杆便被急速射出，射向敌人。

亚述军队在与敌作战时，如敌人躲在城堡里据城顽抗，亚述人就凭借攻城器械攻城。攻城器械，如前面介绍的破城锤，还有云梯和投石器。

云梯一般是木制的长梯，两侧有两根竖木，中间分格插入横短木。步兵中的矛手，便左手持盾，右手举矛，登上云梯向城堡顶端爬去。此时步兵的弓箭手要配合作战，或紧随矛手之后张弓射箭，或单腿跪在地上射箭掩护。

投石器的最简单形式是由两条绳索或带子组成，上系一小块皮条，以兜石块。投石手在投掷前先在空中抡转几圈，增加投掷强力，然后奋力抛出。很快，亚述人发明了靠机械力量推动的投石器。亚述人藉助于把阉牛筋制成的绳索利用高大的木制机械用力绞紧，而后骤然放开，投出的巨大石块便会倾注到敌城上打击敌人，破坏城堡。

此外，亚述人还通过挖坑道攻陷敌人城池。一旦城墙挖通，士兵便破墙而入，内应外合，很快攻陷城池。

防护装备。亚述人的防护装备主要包括头盔、铠甲和盾牌。

头盔分为尖顶式和鸟冠式两种。尖顶式头盔呈圆锥式底部周围有一、二个环，一般在前额直上方的前面有一个半圆的面。有时，头盔挂有上覆一层金属片的下垂的护颈，藉以保护颈、颈、耳和后脑。这种头盔主要是铁制的，只是其下部的环和前额外面的半圆面是铜制的。

亚述人在鸟冠式头盔的发明上充分显示了其自由创造性。后来这种头盔形式可能被希腊人所吸取。鸟冠式头盔的特别之处是头盔顶部嵌以金属制或

用一簇茸毛装饰的鸟冠。在头盔下缘还连结着下垂的护颈和耳盖，其形状千姿百态，各有不同。

亚述人的铠甲，大小有三种型号和两种不同结构。早期的铠甲较长，有的可达足部，有的达到膝盖。这一时期的铠甲只是把铁鳞片和铜片一排排地缝在亚麻布或毡制的衣服上。后期的铠甲，长度不过腰部。亚述人的铠甲通常有短袖，达于肩和肘的中间部位，大部分胳膊露在外面没有任何保护，这样是为了能够灵活操作兵器进行敏捷作战。

亚述人在盾牌设计上想充分发挥出它的防御功能，因此盾牌在形式和结构上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柳条盾。这种盾牌与波斯人的相像，正如希罗多德介绍波斯人使用的盾牌是“细枝编成的”。柳条盾长可相当于或超过普通士兵的身高，宽可为2至3人提供掩护。柳条盾的形状，有的呈长方形，有的是顶部突出一块，与盾体成直角的方形；有的还从一定高度开始向内弯曲并逐渐变窄，最后在顶端形成尖顶状，这是最常见的一种柳条盾。作战时，持盾者和弓箭手二人一组。持盾者将盾牌平稳立在地上以掩护弓箭手；而弓箭手则在盾牌的掩护下充分发挥其射箭的技能，又不致于被敌人来箭射中。这种大柳条盾最适于攻城战斗，它们能够有效地遮挡住守城者扔下的石头、射出的箭支及其它投射物。

圆盾的使用在亚述比任何其他民族都更为普遍。它们主要配备于战车兵。早期帝王的私人侍从、步兵矛手以及掩护弓箭手的长矛手也使用这种盾。盾牌似乎全部用金属制成。形体较小。圆盾的边缘向里弯曲，中间稍向外凸出。早期圆盔一般用青铜或铁打制，后来演变为圆形柳条盾。圆形柳条盾代替圆形金属盾，解决了金属盾重量大，不能形体过大，以及士兵使用移动困难的问题。

凸面盾一般为长方形，在亚述后期也经常使用。早期的凸面盾形体很小，而且制作粗陋。到后期凸面盾形体变大，底部呈方形，顶部呈弧形，有的用柳条编成，有的用金属制成。盾高达4—5英尺，使士兵从头部到膝部都能得到保护。行军时，士兵常常把它们背在背上，和埃及人的凸面盾有些相像。更常见是呈椭圆形的凸面盾，和希腊的凸面盾相似，但更大，直径常常超过5英尺，中央更为突出。

战车。亚述人的战车以木料制成，车门设在车体后面，从后面上下车，这与埃及、中国和希腊的战车一样。车门实际是一个大盾牌。盾牌被挂在车箱出入口上，可开可闭，又可起护卫作用，可谓一举两用。车厢两侧用嵌板镶起，并常常饰以精美的装潢。车轮有两个，安置在车体末端，这样，绝大部分重量就会落在车辕上，重心前移，从而使乌拉战车行驶速度加快，这种情况和埃及的战车相像，却与古代中国、希腊、罗马的战车不同，后者的车轮大约位于车体的中间，那样便于车体重心平衡，而且车体也大而宽敞。亚述战车车轮的轮缘很宽，轮辐因不同的战车而数目不同，或为6根或为8根。车轴小而适度。轮缘是由3个大小不同的木制车圈套在一起的，中间薄，内圈居中，外圈最厚。有时在这些车圈的外部用金属箍加以紧固。轮缘形制多样，因车而设，偶尔也有带有4个车圈的轮缘。

车轮与车轴相联结，按通常的方式车轮围绕车轴旋转。车体直接放在车轴和辕杆上，中间没有弹簧之类缓冲之物。辕杆的末端连结在车轴中间，从

此处沿水平方向从车体底部通过，从那里通常向上弯曲到大约车体一半的高度，又沿水平方向延伸一段以后，再向上弯曲直到前端。辕杆通常由一根或数根细金属杆同战车前部的上方连结在一起，这样可以把辕杆与整个车体连结起来，而且更加牢固。

亚述战车是单辕的，与中国的战车相同。但古代中国的战车驾驭四匹马，两服两骖；而亚述的战车通常由两匹马牵引，有时用绳子或皮带额外拴上一匹作为意外时备用的马。亚述人从未驾驭过四匹马拉的战车。

战车的轭驾在两匹驭马的肩上，用皮带固定在颈圈上，颈圈套在马的颈部。在辕杆上驾驭马的轭，有人简单称之为横木，或是金属制环形条状物，或是一根粗木棍。最常见的一种轭带有2个弯，很像一个没挂弦的弓。还有由一根两端弯曲很大的木棍制成的带有4个弯的轭。这种轭很可能用来驾驭两匹马的，即在每2个小弯中间的凹陷处套一匹马，4个小弯有2个凹陷处，正好套两匹马。

亚述人的战车分早期和晚期两种类型。早期战车主要用于公元前900年的纳西尔帕时代，晚期战车则属于萨尔贡二世、希那赫里布和阿述尔巴尼拔时代，也即在萨尔贡二世之后。

早期的战车比较低而且车身短。轮为6幅，直径小。车体没有花纹，仅在边缘加以装饰。车体前部是圆形的，同古代中国、埃及和希腊、罗马的战车相似。两个箭筒成对角线悬挂在车厢的一侧。放枪的架子设计在车厢的后上角。盾即车门，挂在车厢后面。军旗有时放在战车前面。用绳索捆在辕杆末端。

晚期的战车很高，而且比早期战车长大。车轮为8幅，几乎高达马的背部，直径约5英尺。车体高出车轮一英尺或更多一点，便于乘者居高俯瞰整个战场。车厢呈正方形，前部也已不再呈圆形。箭筒不再缚在车体的外部，而是移到车体的一个或两个角上的凸出部。战车的后面出入口不再悬挂盾牌，而是挂有一块结着花纹的织物，用一根横木拦着。晚期战车的变化，尤其是由低而高的趋势，说明这一时期骑兵开始增多并占优势地位，矮小的战车无法与骑在高头大马上的骑兵作战，战车只有向高大发展到能充分发挥战车兵的作用。

正是由于亚述人拥有先进的武器装备，这才保证了亚述人在建立帝国和扩张帝国的战争中战无不胜。

### (3) 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的军事改革与各兵种协同作战

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的军事改革。公元前800年前后，亚述本土和各被征服国家纷纷爆发人民起义，甚至在亚述新都卡拉赫（古都为亚述）的宫门外亦起动乱，亚述王权曾经一度陷于瘫痪。帝国勃兴初期的挫折要求帝国统治政策犹需作某些调整，才能使帝国迈向空前的规模。

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公元前745—前727年）正是适应历史的要求而上台。他自称是国王阿达德尼拉列三世的儿子，先王阿述尔尼拉列五世的同父异母之弟。但实际上他并非王族血统，是在动乱中凭武力而上台。他是一个拥有丰富的实际经验并善于运用谋略的人，他要使亚述转弱为强，把亚述建成两河流域最强大的帝国。为此，他能够审时度势，对统治政策和军政体制作了重大改革。

在行政方面，他实行划省而治，走向正规管理。他将原来由总督掌管的

大区改为较小的行省，任命省长负责治理。省长负责收税募兵，提供军需，组织劳役，制止军旅对居民的掠夺勒索。又委任专员监督政务，直接听命于中央，加强国王对各地的严格控制。到公元前 738 年，帝国全境有省达 80 个。他还下令建立驿站联网通邮，使帝国统治逐渐走上生机。

针对以前历代亚述诸王在征服后对被征服地区大肆掳掠和屠杀而常常引起被征服地区人民的反抗，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改变了统治政策。对俘虏和被征服地区居民从屠杀无度转为重视保存人力并加以利用。俘虏和被征服居民中被掳掠者皆可携妻带子及部分物品集体迁往指定地点分散安插，按户领取土地耕种。这些被掠者被分散于各地难以集中起来一起反抗。因此地方渐趋稳定，国力加强，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得以集中精力南征北伐。

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以前，亚述各王也曾进行过军事改革。亚述军队早在公元前 2000 年左右就把步兵分为重装步兵和轻装步兵两部分，到公元前 1250 年前后，当时的军队被分为战车兵和步兵。骑兵约在公元前 950 年左右发展起来，由于当时还没发明马鞍和马镫，因此骑兵冲击力不强。当时亚述军队是由民兵组成，每户亚述成年男子，既是一个牧人或农民，又是一位国家战士。他们战时应征自备武装，出征作战，战后则解甲归田。亚述有大量的居民从事畜牧业，并善于狩猎，以勇猛为荣，因此他们不用经过军事训练，也在战场上勇猛过人，以作战勇敢著称。随着亚述日益强大，频繁的对外用兵，亚述需要有一支经过严格训练能够常年作战的正规常备军。于是，在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的军事改革中，实行募兵制，建立常备军，便成为其中一项最为重要的内容。

常备军的建立，使已经丧失土地和部分丧失土地的贫民能够加入军队，大大增加了军队的人数。而且除了在亚述人当中征募兵员外，也在认为可靠的被征服地区的居民中征集兵员，一部分补充步兵，大部分充当辎重兵和工兵。实行募兵制，亚述还可在战时或平时随时随地招募兵员，保证了强大军队的数量。战时出征，平时训练，使军队素质和战斗力都有了很大提高。国家给常备军统一装备和供给给养，尤其亚述给常备军配备以精良的铁制兵器，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常备军的建立，使亚述成为世界上最早的职业士兵的诞生地。

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也规定除了建立直属中央直接指挥从事远征野战的中枢兵团外，还建立地方兵团戍守各地或供出征时调用。地方兵团又是一支强大的后备军。

在兵种建设上，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除了加强原有的重装和轻装步兵、骑兵以及战车兵的编制以外，还新建立工兵和辎重兵。尤其是工兵的独立，使军队在开路、搭桥、筑垒和建城、修造攻坚器械方面的专业技术得到较大提高。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把工兵组建成一个独立的兵种，在世界军事史上居于重要地位。

各个兵种的兵器和衣甲均采用同一种型号。战车兵和骑兵由贵族充任。工兵、步兵则由农牧民组成，这样亚述建立了全备的兵种和军制，走上了各兵种协同作战的道路。

各兵种协同作战。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建立常备军后，常备军成为亚述国家的主要支柱，被称为“王业的枢纽”。除了常备军外，亚述还设立了近卫队，专职保护国王。

从此，亚述的常备军分为主力部队和辅助部队。主力部队由步兵（分为

重装和轻装两类)、骑兵和战车兵组成;辅助部队则主要由工兵和辎重兵组成。战车兵是最富有特权的兵种,由显贵高官子弟组成。亚述的战车兵非常勇猛,常常使敌人闻风丧胆,在作战中屡显威力。

骑兵是亚述在世界上最先开始大规模使用的兵种,特别在追击敌人时起重要作用。后来,随着军事的发展,骑兵的作用日益重要,已明显超过了战车兵。

在亚述军队中人数最多的当属步兵。步兵分为重装和轻装两种。在步兵的编制中弓箭手居多。亚述的弓箭手以箭法准确著称于世,在攻击战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亚述军队中还第一次出现了辅助部队。工兵主要从事修筑道路,建筑普通的桥梁、浮桥、营垒以及建造攻城器械。辎重兵则担任繁重的运输军队给养任务,他们用驮畜、大车运粮草、兵器,在水路则用木船或皮筏支撑的木筏进行运输。

亚述军队一般由国王亲自率领出征,下设百人长、五十人长、十人长指挥的支队。闪电战和突袭是亚述人常用的战术。亚述军队进军神速,一般尽量不给敌人以战斗准备时间,在敌人未醒悟时,利用强攻或计攻结束战斗,真应了“兵贵神速”那句古话。

在长期的作战征伐中,亚述军队形成了自己的军制特点:以完全用铁制兵器武装起来的常备军为基础,战车兵、骑兵、步兵、工兵和辎重兵等各兵种全面发展,协同作战,注重战斗兵团内部各兵种兵员的合理配置,充分发挥各兵种的功能和作用。

战车兵。战车兵在古代世界是最受尊重的兵种。在亚述,国王出征总是乘着战车并在战车上作战。伴随国王的高官显宦也乘战车作战,而下级官吏或平民只能充任骑兵和步兵。

最早使用战车的国家可能是苏美尔的乌尔城邦,公元前27世纪的乌尔军旗上就雕有苏美尔人乘战车作战的场面。但冲击力较强的马拉战车大概是从赫梯人和希克索斯人开始的。赫梯人很早就削木作辐,制造马拉战车南征北伐,一时横行小亚细亚。

亚述的战车车体很短,但左右较宽,车厢内可容二、三人,至多四人。其中一人为驭者,其余为战士。车厢上可以放置箭筒,便于弓箭手放箭。战士还配有短剑和长矛。驭者在战士旁边,两手驾车,配合战士作战。在三人乘的战车中,战士、驭者之外,又出现一名卫士,他左手持盾保卫张弓射箭的战士,右手持矛或剑,以便击退随时可能迫近的敌人。国王和显贵的战车有时为四人,驭者和两名手持盾牌护卫其主人的卫士。

战车兵为了能够灵活作战,而且在战车上又相对比较安全,因此衣甲比较轻便,有时只穿一件紧身衣,扎紧腰带即可,有时也着盔甲。铠甲下达膝部,膝部以下则可有车厢掩护。金属制头盔,垂至肩部,保护着后脑、耳朵、颈部甚至颈部。还有的战士不戴头盔,只戴头巾。

亚述的战车兵相当有威力,在《圣经·以赛亚书》中就说:“他们的箭快利,弓也上了弦,马蹄硬如坚石,车轮好像旋风。”但我们至今还没有弄清楚亚述战车的数量。

骑兵。在亚述的早期,直至萨尔贡二世时代以前,骑兵的作用和地位都位于战车兵之后。在亚述,骑兵早就存在,但很少在战场上使用。在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时,只有少数骑兵作为传递国王敕令的信使,急驰在驿道

上。直到萨尔贡二世和辛那赫里布时代，战车兵和骑兵的消长才有明显变化，战车仅限于国王乘用，而骑兵经常大量出现在战场上。

萨尔贡二世以前，亚述人还没发明马鞍和马镫，骑兵乘马没有鞍子，乘马时不是让双腿自然地垂于马的两侧，而是弯曲着双膝紧夹住靠近马颈的背部，以便在马背上坐稳，不致由于马匹的奔跑被颠簸下来。

这一时期骑兵的主要武器是弓箭，他们也很可能佩带剑和盾牌，但在浮雕中没有发现使用这些武器的实例。骑兵一般成双成对出外行动，一名是弓箭手，另一个是不带任何进攻武器的伙伴。战斗中，弓箭手在奔跑的马上或马停下来时向敌人发箭，其伙伴则为之牵引马，配合弓箭手作战。随从衣着简单，头戴头巾，身穿过膝短袖束腰外衣。而弓箭手则要头戴头盔，身穿绣花紧身衣，扎着腰带。

由于骑兵的马上没有马鞍，骑兵的冲击力不强，所以在早期，骑兵的地位和作用远逊于战车兵。直到萨尔贡二世时代以后，亚述人发明了马鞍，骑兵的作用才日益巨大，充分显示出战车兵所不具有的冲击力和机动灵活性。

步兵。尽管战车兵和骑兵冲击力很强，但是亚述的军队仍像大多数国家一样，步兵是军队的主力。

步兵按其武器装甲装备的变化和发展，在萨尔贡二世时代步兵有了重大改变。在萨尔贡二世以前，剑手、矛手和弓箭手这三类步兵的服装装束都几乎相同。步兵穿一件不到膝部的短紧身衣，腰际扎一条宽腰带，头戴金属制尖顶头盔，臂、腿、颈、脚，全部裸露，有时步兵会穿一双简陋的便鞋。剑手使用一种短而直的剑或匕首，还有柳条盾或凸面形金属盾。长矛手左手持同样的盾牌，右手握短矛或标枪。矛手有时除了持矛之外，还携带短剑。弓箭手使用圆弧形的弓，长约4英尺。他们还在身体左侧悬挂着剑。有时也常常携带锤矛。弓箭手被视为步兵中的精华。作战时，弓箭手成对行动，一人射箭，一个持盾掩护自己和同伴免遭对方投掷物的伤害，同时一手持剑抗击可能冲上来的敌人。

工兵和辎重兵。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在其军事改革中，把工兵首次从其它兵种中独立出来，主要为作战承担服务工作，建筑营垒、铺设道路、架设桥梁、建造攻城器械等等。工兵装甲装备同矛手相似，但是手操双头斧或手斧，而不是长矛。工兵架设临时性过河桥梁的速度非常快，首先把若干充满气的皮囊连结在一起排摆在水面上，然后在上面铺设木板或树枝，制成浮桥，步兵不仅可以安全渡过，骑兵和战车兵也能通行。

亚述人出征，必有辎重车伴随。亚述军队辎重的陆路运输，主要依靠辎重车，还补充以驮畜。水路运输辎重，除了利用木船外，可能大量利用皮制气囊所支撑的木筏。由于亚述帝国连年进行战争，用兵频繁，看来辎重兵的负担绝不轻松。

#### (4) 庞大亚述帝国的形成

公元前745年，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首先选择弱敌进攻，向南进军，很快战胜西帕尔的阿拉米亚人。接着又挥师东进，征服了尼普尔一带。

翌年，他又发动对东方和东南方的远征，接着挥师南下，直到埃兰的北部边境。

公元前743年他又调集了亚述军队的全部主力，与叙利亚展开了战斗。在康马甘地区，以阿巴德为盟主的北叙利亚各国军队以及乌拉尔图国王萨尔

杜里二世率领的大军为一方，以亚述军队为一方，展开了决战。北叙利亚和乌拉尔图的军队很快战败。当萨尔杜里二世的兵营将受到包围时，他竟然丢下全部兵营和他的御用战车，仓促骑一匹快马惶而逃之。但是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没有乘胜命令军队北击乌拉尔图王国，而是在公元前 742 年，兵锋转向西南，包围了阿巴德城。坚固的阿巴德城直到公元前 740 年才被攻克。

直到公元前 735 年，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才挥师突入乌拉尔图。萨尔杜里二世在一次战败后，决定退守首都吐施帕。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包围并进攻这座城市很久，都没有攻陷。但是乌拉尔图王国受到这次打击以后，只剩下一座孤城，国势衰微，再也无力与亚述抗衡。

这时，大马士革国王列村和以色列国王比加结成联盟，趁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忙于东方和北方战事，在西方成为反对亚述的主力。

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决定摧毁大马士革。他实行迂回南下包抄大马士革的战略，先派兵沿地中海南下占领阿斯卡隆和加沙，封锁埃及边境，迫使追随列村和比加的以东、摩押、亚扪等地区臣服。公元前 733 年，以色列国王比加被本国贵族所杀，以色列归顺了亚述。这样，大马士革王国的同盟者已全部被剪除，亚述从北、西、南三面包围了它。

公元前 733 年，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身穿皇袍，头戴王冠，宦官在其身后高举伞盖，乘坐于有驭者为其驾驭的战车上，后随保护他的侍从和卫队，亲率大军进攻大马士革。

当时，列村处于劣势，亚述的步兵、骑兵都比他多一倍以上。亚述调到前线的战车有 5000 辆，列村只有 2000 辆。亚述工兵吹胀皮囊，上铺木板制成浮桥，让步兵、骑兵，战车兵迅速渡过弗尔发尔河，直趋大马士革城下。

列村在近郊平原上应战。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亲自指挥这次战斗。亚述的每一战斗兵团的兵力配置和队列如下：5 辆战车在最前面，紧跟的是 15 名骑兵，随后是 25 名重装步兵，最后是 50 名轻装步兵。

战斗开始后，双方的战车和骑兵互相冲击，大马士革渐感不敌，开始退却。大马士革的弓箭手立即射击亚述的追兵。亚述方面则命令骑兵和战车兵让路，步兵冲了上去。步兵头戴尖顶头盔，分别执金属制凸形圆盾和柳条盾，射来的箭支失去了效力。大马士革军战败。列村只好退守大马士革城。

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下令围城，命令砍掉城郊树林，筑起栅栏，像“把鸟关在笼子里”一样严密圈住敌军。列村依仗粮足兵器多，固守城池。亚述围城达一年之久。

公元前 732 年，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命令工兵制造破城锤，利用破城锤撞击城墙，一处塔楼和城墙崩塌，亚述士兵攻入城内。

双方在大马士革城内展开了街巷战，时间持续一周，大马士革军队才被歼灭。列村也被俘处死。大马士革王国灭亡了，整个南叙利亚被征服。

继征服大马士革后，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率军南征巴比伦王国。公元前 729 年，巴比伦以同亚述结盟和合并的形式并入亚述帝国。

至此，亚述帝国的版图空前扩大，东达伊朗高原西部，西到地中海边，南到波斯湾，北到两河流域上游，庞大的亚述帝国开始走向极盛。

#### (5) 亚述帝国的盛世和末日

亚述军事的新发展。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死后，其子继位不到 5 年，即被另一军事将领取而代之，进入萨尔贡二世时代(公元前 721—前 705 年)。

从此亚述帝国进入帝国最后一个也是最强大的王朝——萨尔贡王朝。主要包括萨尔贡二世、辛那赫里布、阿萨尔哈东及阿述尔巴尼拔四王。

从萨尔贡二世时起，亚述的骑兵和步兵有了重大发展。以后，亚述人发明了马鞍，骑兵冲击力大大增强，战车兵的重要地位逐渐被骑兵代替，战车最后只有国王乘用。

这时的马鞍实际只是一块简单的布或皮革，被剪成方形。在马的腹部兜上一条腹带，把马鞍固着在马背上。马鞍的发明。可以使骑兵在马背上更加活动自由，从而不再需要伙伴的帮助就可以独立作战了，但这时还没有马镫。

骑兵分两部分，弓箭手骑兵和矛手骑兵。骑兵的服装衣着也有了很大变化。骑兵全身穿着紧身衣，腰部以下放宽成短裙，后身比前襟要长点。腰部扎一宽腰带。只有从肩部稍下部位开始的两臂露在外面，以便于灵活操作兵器作战。骑兵下身穿紧身马裤，外着以用纽带束紧的靴子或护胫，一般下达膝部。到辛那赫里布时代还出现了穿有盔甲、皮或毡的裤子以及高护胫或长统靴的骑兵的浮雕画面。

矛手骑兵手持长矛，矛头尖小。持矛时，手握矛柄，尖端下斜。与敌对阵时，顺手上提，矛尖则上斜对着敌人。弓箭手骑兵配备有圆弧形或角形的弓，长不过4英尺，箭杆不到3英尺。这两类骑兵都在身体左侧斜佩着短剑。但有时矛手骑兵也备有弓箭，一旦长矛折断或丧失时用弓箭与敌作战。

此时的骑兵由于有了马鞍，在作战时，矛手左手持缰，右手持矛作战；弓箭手则把马缰放在马颈上，在马上双手自由张弓射箭。这样就使骑兵有了极大的冲杀力，而且不像战车兵那样不能适于复杂地形作战，因此骑兵在亚述的兵种中逐渐成为位居第一位的兵种。

萨尔贡二世曾经对步兵进行了重大改革。他把步兵分成矛手和弓箭手两大类，进行专职训练。在他之前的剑手，这时只充任国王卫兵。弓箭手又被分为轻弓箭手、次重弓箭手和重弓箭手三类。轻弓箭手束轻装，不戴头盔，只缠束发带，整个上半身除了挂箭筒的横带外，全部裸露在外。下着至膝上部的紧身短裤。他们通常没有伙伴协助，也不拿盾牌，主要进行立射和跪射。次重弓箭手的装备介于轻重弓箭手之间，配备有锁子甲、头盔和便鞋。锁子甲可下达膝部。主要采取跪射姿势，有伙伴持盾跪着掩护。重弓箭手装备精良，身着长袍，达于脚面。外面再套以锁子甲，达于腰部。头戴尖顶盔，脚着便鞋。射箭姿势主要为立射。其伙伴把一人高的大盾牌立于地上，站在其身后持盾牌保护。重弓箭手尤其在攻城战中发挥重大作用。

矛手，头戴鸟冠式头盔，身穿至膝长衣，但外部不罩锁子甲。右手持矛，左手持圆形盾，与敌展开肉搏战和攻城战。

萨尔贡二世的扩张。萨尔贡二世（公元前721—前705年在位），并非王族出身，也非前国王的“合法”继承人。他在政变中夺权上台，首先稳定亚述的内部局势，缓和了国内矛盾。此后，萨尔贡二世便开始镇压被征服地区人民的起义，继续向外发动侵略战争，他的征服战争主要是对南面的巴比伦，西面的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北面的乌拉尔图展开的。

当时巴比伦的人民不堪忍受亚述的吞并，梅罗达克·巴拉丹率领的迦勒底人骁勇善战，以海滨苇塘沼泽地为根据地，和东边的埃兰人联合，成为帝国心腹之患。而埃兰拥有伊朗和中亚广大地区，兵强马壮，也是难对付的角色。就在萨尔贡二世即位第一年，巴比伦就在梅罗达克·巴拉丹领导下宣布独立。

萨尔贡二世立即出兵征讨，但在巴比伦一时并未得逞，巴比伦问题还需在以后时机成熟时解决。

同年，即公元前 721 年，西部又发生叛乱，萨尔贡二世只好暂时撇开巴比伦，挥师西向，迅速灭亡了以色列国，攻下了其都城撒马利亚。次年，他又平定大马士革和南方的拉庇胡城叛乱。

萨尔贡二世镇压了西方叛乱后，集中精力对付北方的强有力的对手乌拉尔图。他也采用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围攻大马士革的包抄战略，先征服乌拉尔图的同盟者亚述东部的山地人民，再于公元前 714 年，大举进攻乌拉尔图攻入其圣城穆萨西尔，掳走了神像，乌拉尔图遭到了重大失败。

到公元前 710 年，叙利亚、巴勒斯坦和东方扎格罗斯山区大部分在亚述统治之下，米底处于依附地位，乌拉尔图也受重创，元气大伤，埃兰内部出现骚乱，无暇外顾亚述进攻巴比伦的时机已经成熟，但萨尔贡二世遭到梅罗达克·巴拉丹率领的巴比伦人和移居巴比伦各部落的顽强抵抗，直到公元前 709 年，巴比伦才被攻陷。

辛那赫里布的武功。到辛那赫里布时代（公元前 704—前 681 年），亚述的步兵在装备和组织方面又有重大发展。他把弓箭手分为四类，即重装弓箭手、次重装弓箭手、轻装弓箭手和最轻装弓箭手。他们都与萨尔贡二世时期的弓箭手不同。重装弓箭手身穿紧身衣，外罩长至腰部的铠甲，头戴尖顶头盔，下着紧身裤，他由 1 名或 2 名着同样服装的伙伴伴随，持巨大的柳条盾掩护他射箭。次重装弓箭手的服装只是略有变化，紧身衣在一侧开口，下身穿着短裙，双腿裸露。战斗时一般两人一组，没有盾牌掩护，同时放箭射击。

轻装弓箭手不带头盔，头部围以宽宽的束发带。身着紧身衣，衣服上有两条宽带把衣服束紧分别挎在左肩和右肩上。腰扎宽带，下着短裙。最轻装弓箭手头戴束发带，身着条纹紧身衣，衣服前襟短后襟长，从颈部直达膝部，腰扎腰带。他们难得佩带剑，只是身挂箭筒，是“真正”的弓箭手。

辛那赫里布时代的矛手分为重装矛手和轻装矛手两种。重装矛手头戴尖顶头盔，铠甲长至腰部，并覆盖住双臂上部，上身着紧身衣，有一侧开口；下身穿着紧身裤，外罩短裙，还有护胫。他们携带金属制凸面大盾，几乎可以把整个身体掩盖起来。长矛比身体略短一点，还在身体右侧佩有短剑。重装矛手人数较少，通常充当国王的卫兵。

轻装矛手的装备同萨尔贡二世时的长矛手几乎相同。头戴鸟冠式头盔，身穿朴素紧身衣，腰扎宽带，使用圆形柳条盾。但辛那赫里布时代的轻装矛手通常穿着裤子和护胫，手持半圆形的凸面柳条盾，而不是圆盾，因而又与萨尔贡二世时期的长矛手有所不同。

辛那赫里布还在工兵和投石手部队方面的建设上有所进展。工兵部队真正完全地独立出现在战争场面的浮雕中。工兵工作时一般两人一组，配合行动。所着服装同重装矛手相同，只是手持的不是长矛，而是双头斧或手斧。投石手部队主要利用投石器进行投石攻城工作，他们在攻城时颇具威力。

辛那赫里布在公元前 704 年登上王位后，窥测时机企图重返巴比伦的梅罗达克·巴拉丹在盟国埃兰的支持下，回到巴比伦，宣布巴比伦恢复独立。辛那赫里布绝不容忍迦勒底人和埃兰控制巴比伦，于是亲率大军，直扑巴比伦。

埃兰分兵一部驻守巴比伦东部屏障库塔城，把主力部队及迦勒底、阿拉

美亚和阿拉伯等国联军布置在东南古城基什，这样便对进攻巴比伦的亚述军形成了南北夹击的钳形阵势。

辛那赫里布识破了这一意图，派精悍部队一支奔往基什，阻敌主力北上，自己率军弃巴比伦而不顾，猛攻库塔，全歼守军。然后他火速南下基什，增援正在平原上苦战数倍于己的、即将瓦解的阻击部队。一场搏杀，联军败北，亚述军攻入巴比伦城。巴比伦三度归属亚述。

接着在公元前 701 年，辛那赫里布又挥师西向，去镇压巴勒斯坦和腓尼基的叛乱。公元前 700 年，辛那赫里布率军来到西方时，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各国国王们闻风而降，只有犹太国王希西家凭借其强大实力和埃及作后援，决意要与亚述周旋到底。

辛那赫里布再次采用迂回战术，先占犹太的侧翼阿什克龙城，击溃远来的埃及援兵，再攻占埃克隆，然后兵分数路围攻耶路撒冷。这时亚述军内发生瘟疫，于是和犹太停战，保全了耶路撒冷。

当辛那赫里布在西方作战时，迦勒底人又发动叛乱。为了彻底消灭迦勒底的力量，辛那赫里布于公元前 694 年决心远征在埃兰的梅罗达克·巴拉丹的余部。

亚述战士在海军的配合下，攻占了一些迦勒底殖民点和埃兰城镇。可是埃兰国王哈鲁苏却率军攻入了巴比伦。

不久，埃兰发生内乱，辛那赫里布乘机出兵侵入埃兰。但顽强的埃兰人却联合阿拉美亚人、迦勒底人和亚述东方的 3 个行省，组成反亚述联军，在公元前 691 年向亚述杀来。辛那赫里布率军在哈鲁城迎战。

铭文以自述形式对辛那赫里布在哈鲁大战中的行动描述说：敌人“像一群群遮天蔽地的蝗虫”，“他们脚踏起的尘土，像暴风雨之前的蔽开浓云”。“我身穿战袍，戴着王盔——这是我军胜利的标志；我愤怒地乘着我的战车，把敌人纷纷撞倒。我一手握阿述尔神给我的弓，一手持尖锐的长矛，高声大呼，如春雷滚滚。我像雷神一样咆哮着，怒吼着，抵挡住敌人的攻势，成功地包围了敌人。埃兰军的‘图尔坦’（军队司令官的称号——作者）和其他的贵族身佩金剑，手戴闪闪发光的金镯，我急速杀死他们，像割绳子般砍断他们的喉咙和手臂。”铭文声称亚述杀伤敌军 150000 人。但亚述也伤亡惨重。亚述人未能夺取巴比伦，只好退军尼尼微稍作休整。

公元前 689 年，埃兰发生内乱，辛那赫里布又乘机攻打巴比伦，亚述第 4 次占领巴比伦。

公元前 681 年，辛那赫里布被杀死，其子阿萨尔哈东继承王位，对内实行怀柔统治政策，对外又战胜米底和埃及等国，使帝国版图又有扩大。

帝国的极盛与末日。公元前 669 年，阿萨尔哈东在远征埃及的途中病死，其子阿述尔巴尼拔（公元前 668—前 631 年）即位。

到阿述尔巴尼拔时期，步兵又有新的变化。弓箭手和长矛手都各自分类，即轻装的和重装的。轻装弓箭手如同辛那赫里布时期的轻装弓箭手，头束发带，朴素的紧身衣，宽腰带和短裙。所不同的只是他们没有遮身的垂饰和便鞋。重装弓箭手也类似于辛那赫里布时期的重装弓箭手。长矛手唯一的新装备是盾。旧式的凸面椭圆盾较少使用，多半使用一种底部平直而顶部呈圆形的盾。轻装矛手使用同种样式的盾，只是不是金属盾，而是柳条盾。

步兵到这时除了长矛手和弓箭手以外，还出现了投掷手、锤矛手和战斧手。锤矛手和战斧手的服装同重装矛手的服装完全相同，说明他们已是步兵

中的主要兵类。

阿述尔巴尼拔继承父志，率军远征埃及，直捣底比斯城，大肆掠抢并毁灭了这座城市。但到公元前 655 年，埃及又摆脱亚述控制而获得独立。

这时亚述尽全力打击最后一个也是最顽强的敌人埃兰。几经征伐，阿述尔巴尼拔终于在公元前 639 年攻陷埃兰首都苏撒，平定了埃兰全境。

至此，亚述帝国达到最大的版图。拥有西亚全境并暂时占领埃及，东临伊朗高原，西抵地中海滨，北达高加索，南接尼罗河，这是世界古代史上空前的大帝国。

但是亚述帝国是建立在军事征服的基础上，因而是稳定的、暂时的。亚述帝国达于极盛之时，同时又是其强弩之末之时。各被征服地区的反亚述斗争正积蓄力量准备再起，埃及首先恢复独立，小亚细亚兴起吕底亚王国，尤其是伊朗高原出现了米底人新国家，连续 4 次反抗亚述的巴比伦迦勒底人也逐渐恢复其实力。因此，阿述尔巴尼拔死后不久，米底人和迦勒底人联合进攻亚述，帝国急剧衰落。迦勒底人乘机建立巴比伦第六王朝，恢复独立，并联合米底人于公元前 614 年攻克亚述古都亚述，公元前 612 年夺取亚述新都尼尼微，亚述帝国就此灭亡了，亚述被并入了新巴比伦王国的版图。

亚述人的军事特点。亚述帝国历代诸王都积极奉行穷兵黩武的对外侵略扩张的政策，年复一年，无休止地对其周邻诸国用兵。对亚述统治者来说，打仗就是一切。因此在长期的战争中，亚述人形成了自己的军事特点。

奉行侵略扩张政策的亚述，作战大都采取强大的、闪电式的进攻战术，快速和突击成了亚述人军事战术的主要内容。亚述军队进军神速，根本不给敌人以战斗准备时间，总是竭力进攻，在敌人尚未醒悟的时候，就以果断、迅猛和突击结束战斗。

在军事组织上，到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时代，亚述人已放弃了过去的混乱无章的群体作战，而代之以战车兵、骑兵、步兵等主力部队和工兵、辎重兵等辅助部队协同作战。协同作战在举行庞大的军事行动中非常重要。亚述军事发展到辛那赫里布时代，亚述已开始采用多兵种的密集方阵。在方阵中充分发挥各兵种的作用，装备最好的部队布置在前方，以增加进攻的锐势，把弱兵和没有完善护卫装备的部队部署在后方。方阵不仅在亚述，而且以后在波斯、希腊、罗马的战争中都发挥了巨大的功能。

亚述人非常重视军队的衣甲武器装备和工兵、攻城器械的作用。亚述人用兵神速，经常采用闪电战，这就要求将帅的果断、士兵的勇敢和衣甲兵器的优良。亚述的常备军被配备以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铁制兵器，衣甲也多种多样，适合任何情形对敌作战。亚述军队之所以所向无敌，与其拥有完善的兵器衣甲装备有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亚述人在建设兵种和衣甲装备时，多从进攻方面考虑。亚述人建立辎重兵和工兵较早，这是为了适应长年对外战争对工兵开路、辎重兵运输的需要。攻城器械的发达，也是为了能适应攻打敌人城堡的需要。在亚述人的壁画上，亚述攻城作战的场面上只有属于敌人的雄伟高大的城堡，而不表现自己的，因为亚述人很少重视城防建设，亚述人想有的只有进攻，没有准备守城挨打。

亚述人还特别重视野战营垒和驿道的建设。野战营垒是临时性的兵营和堡垒，对亚述军队野战的胜利起重要的保障作用。亚述野战营垒是后来罗马野战营垒的原型。亚述人只修筑临时性野战营垒，而很少去修建坚固的城堡，这是基于亚述人要对外扩张只有实行进攻的军事思想。但是野战营垒设计得

很巧妙，建筑牢固。营垒的外缘是椭圆形的围墙，围墙的下半部像是用砖砌成，上半部是栅栏。在围墙的一定间隔内修有监视敌人和意外紧急时防御用的塔楼和雉堞。在围墙内撑有成排的帐篷。国王的帐篷要稍大一些，并带有装饰。帐篷的设计很特殊。中间露天，两端有半圆形的屋顶覆盖着。修筑野战营垒由工兵承担，一旦军队撤离，一切设备当即拆除。

亚述人建设驿道，是适应迅速调兵遣将、传达命令的需要。波斯帝国的驿道制度就是在亚述驿道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扩大的。

在亚述，驿道纵横交错，十分发达。特别应该注意的是，在亚述有用石块和砖铺砌的宽阔道路，若干路段甚至还铺上了沥青，这在世界上还是首创。

在驿道的路旁，每隔 20 公里建有一个驿站和一眼井。在驿站里，国王的急使换乘马匹，不停地把国王的公文从尼尼微送往亚述帝国的各个地区。亚述人还在驿站设置官吏，负责检查道路的安全，保障使节和信件的往来。驿道的修筑和驿站的设置，不仅为军队的调迁、辎重的运输和行政联系提供了方便，而且也为帝国内从事商业贸易活动提供了便利。

#### 4. 新巴比伦王国的百年风云

亚述国王阿述尔巴尼拔死后，亚述帝国江河日下。迦勒底人那波帕拉沙尔乘机于公元前 626 年称王，建立巴比伦第六王朝。由于此后巴比伦北灭亚述，西侵犹太，文治武功与古巴比伦相当，历史上便称之为新巴比伦王国（约公元前 626—前 539 年）。

那波帕拉沙尔建国后的首要任务是直捣尼尼微，彻底消灭亚述帝国。他联合米底人，以锐不可挡之势，很快于公元前 612 年进军尼尼微，将其夷为平地，亚述帝国从此变成过去的历史了。

公元前 604 年，尼布甲尼撒二世（公元前 604—前 562 年）继位，新巴比伦王国在他统治时期达于极盛。

尼布甲尼撒二世青年时期就随父出征，富有作战经验。他上台时国内比较稳定，对外拥有实力。亚述灭亡后，基本上是米底、新巴比伦和埃及三国形成鼎立之势。新巴比伦通过联姻和米底结盟，尼布甲尼撒二世遂致力于与埃及作战，主要是争夺腓尼基、巴勒斯坦一带。

在幼发拉底河西岸的卡尔赫米什，尼布甲尼撒二世率军在下游先行渡河，而后沿西岸向敌人发动进攻。战斗相当激烈，“勇士与勇士彼此相碰，一齐跌倒。”埃及军队遭到重创，“好像圈里的肥牛犊，他们转身后退，一齐逃跑”。尼布甲尼撒二世穷追不舍，在哈马什全歼了这支埃及军队。

公元前 604—前 602 年，尼布甲尼撒二世开始对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诸小国发动一系列战争。大马士革、西顿、推罗以及犹太国王皆被迫称臣纳贡。但到公元前 601 年，犹太国王乘新巴比伦被埃及军队打败之际脱离新巴比伦，转而投靠埃及。

尼布甲尼撒二世决心惩罚犹太国。在公元前 598 年底，他率军围攻耶路撒冷。到公元前 597 年 3 月，犹太国只好投降，耶路撒冷遭到抢劫。

公元前 588 年，埃及又发动了对巴勒斯坦地区的进攻，犹太国和其它一些臣服于新巴比伦的小国纷纷响应埃及人，尼布甲尼撒二世只好又派军围攻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城池牢固，新巴比伦军队围攻 18 个月，才在公元前 586 年将其

攻陷。尼布甲尼撒二世下令拆毁城墙，全城剩下的居民几乎全被掳至巴比伦地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巴比伦之囚”。

夺取耶路撒冷之后，埃及遂不敢问津叙利亚、巴勒斯坦一带，新巴比伦在此的统治牢固建立。新巴比伦至此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

但是，新巴比伦的盛世持续甚短，尼布甲尼撒二世死后不到 30 年，到公元前 538 年便为新兴的波斯所灭，两河流域独立发展的历史至此宣告结束。

## 五、古代印度

### 1. 印度河文明时期军事的萌发

古代印度主要包括今天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领土，在古代文明中是仅次于中国的大国。可是在古代，南亚次大陆从未得到统一过，在它领域内的大小国家也没有一个自称印度，因此印度之名只是泛指其地，不过流行却很早，古希腊人即以印度河以东之地统称印度，中国《史记》称之为身毒，到唐朝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改译为印度，遂沿用至今。

从公元前 2400 年开始，古代印度的本地原有居民达罗毗荼人逐渐创造建立起自己的印度河文明，在考古学上由于从 1922 年开始通过考古发掘发现了其主要文化遗迹哈拉巴和摩亨约·达罗，因此又被称为哈拉巴文化。

印度河文明(公元前 2400—前 1750 年)的繁荣期大约开始于公元前 2200 年，这时已出现了国家。但到公元前 1750 年左右，文明有衰亡之象，中心地区在此后一二百年迅速瓦解，但较远城市则存在到公元前二千年代后期。

哈拉巴和摩亨约·达罗是印度河文明的典型代表，也是在考古发掘中最早发现和最大的文化遗址。两城市的面积、人口和营造布局都很相似，皆分卫城(或称上城)和下城两部分。其中卫城位于城市西部，设防森严，以高墙深壕环卫，街道旁建有圆形塔楼，是战时的防御城堡和居民的避难所。哈拉巴卫城高达 50 英尺，基底厚约 40 英尺，全部用烧砖砌成。厚实高大的城墙，暗示出国家的强大和战争的频繁。哈拉巴和摩亨约·达罗城内中心都筑有规模宏大的谷仓，下层砖砌墙基，上有数层木构并设窗户通风，是印度河文明特有的建筑。容量巨大的谷仓可能是备战时或灾荒时利用的。两卫城还在四周筑有防御塔楼，城内筑有大浴池和经院等别的高大建筑物。从卫城建筑的复杂精良、谷仓容量之大和防御设备之完备来看，哈拉巴和摩亨约·达罗显然控制着周围广大地区，很可能各是一国之都。

两城市的下城是居民区，位于城市东部，亦有城墙围绕，主要城门位于西南角。这里街道整齐，建设好坏参差，有明显的阶级分化的迹象。富人区房屋高大，厅堂众多，楼房数层，而且有完善的下水道系统，完全用砖砌成。这在同时代的任何文化遗址中都没有发现过；贫民区则茅舍很小，往往陋室一间，但无下水道设备，良好的排水系统与贫民根本无缘。在城市规划上，下城居民区也甚有条理，大街纵横相交，下有砖砌排水沟。小路与大街相接，井然有序，反映出印度河文明的发达。

印度河文明已创造出自己的文字，主要留存在各种石、陶、象牙制的印章上，有些器物上也留有简短的铭文。但是对这些文字的释读尚未成功，只是一般认为其语言属于达罗毗荼语族。印度河文明还发展起较发达的青铜冶金业，在哈拉巴和摩亨约·达罗城址发掘出的遗物中，发现了许多青铜和青铜制斧、镰、锯、凿、刀剑和鱼钩等。其中包括不少青铜制武器：箭镞、矛头、匕首、刀剑和斧等。

到公元前 1750 年，哈拉巴和摩亨约·达罗突然陷落，破坏原因不清。有的学者认为可能是城市之间彼此争战或人民起义的结果，也有学者认为是外族入侵造成的，还有的学者认为可能是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从此以后到吠陀时代雅利安人入侵前几百年间的历史，基本上处于混沌的模糊不清状态，很多情况我们不得而知。

## 2. 吠陀时代军事的兴起

### (1) 雅利安人的入侵与内争

大约从公元前 14 世纪开始，雅利安人从印度的西北方侵入南亚次大陆，从此开始了印度史上的吠陀时代，一直到公元前 6 世纪印度出现列国纷争。之所以此时期被称为吠陀时代，是因为记述这一时代的历史文献主要为《吠陀》以及解释《吠陀》的诸《梵书》。而《吠陀》是雅利安人的圣经，字义为知识、学问，共包括《梨俱吠陀》、《沙摩吠陀》、《耶柔吠陀》和《阿闳婆吠陀》四部，是祭司们在祭神时所用的颂歌、经文和咒语的汇编。虽然主要是宗教内容，但是其中也包含一些价值丰富的有关雅利安人早期历史的内容。吠陀时代，基本上是原始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制时代，只是到了后期，才有少数部落开始过渡到国家。

雅利安人是在印度河文明衰微时侵入印度的，因此入侵是相当成功的。他们把土著居民称为达萨或达休，意即敌人，后来达萨即与贱奴同义。据《梨俱吠陀》所述，雅利安人的战神和雷电之神因陀罗是指挥他们战胜达萨的英雄，因此他们入侵的历史事实往往在对因陀罗的颂诗中表现出来。其中一段颂诗高唱道：

他使万物变化无常，  
他使达萨人一一屈服、灭亡，  
他像赌博中大获全胜的人，拿光敌人财产，  
他就是伟大的战神因陀罗！

“伟大的战神因陀罗”战无不胜，他粉碎了 90 座城堡，解放了七河之境，终于使达萨族灭亡。而七河之境，一般就认为是指印度河上游和恒河上游一带，那里至今犹有“五河流域”（即旁遮普）等称呼。

雅利安人在征服达罗毗荼人之后，逐渐由半游牧转为农耕定居下来。他们在与敌进行作战时，所有男子均一同出战；返还村落之后，仍复各从其农牧之业。各部落间战时要选举一人为其统率者，强而有力者往往自称王侯，对其所属村落或收赋税以作军费或征力役以修道路。频繁战争使“王”日益具有军事首长的性质。《爱达罗氏梵书》中载有王权授位的仪式，王脚踏虎皮，手拿弓箭，像一个征服者那样，举步四方，这说明当时的部落首领主要是一个军事领袖，部落或部落联盟在危急或紧急关头，总要求加强军事首领或“王”的权力。吠陀时代的部落首领罗惹，按其本质特征而言，就是“军事首长”。与此同时，这时代的议事会和人民大会也是军事民主制的两个机关，具有军事性质。后者只由成年男子即战士来参加，前者由部落中的少数上层分子即老人们组成。

经常的战争是军事民主制时代的特征之一。正如恩格斯所说，“其所以称为军事民主制，是因为战争以及进行战争的组织现在已成为民族生活的正常职能。邻人的财富刺激了各民族的贪欲，在这些民族里，获得财富已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当时每个部落都有备战的作为设防据点的城堡。部落的武装有两种，王和贵族组成的战车兵，一般人民大众组成的步兵。吠陀时代的战争，开始主要是在雅利安人与土著居民之间进行的，后来在雅利

安人部落之间也发生了不断的旨在掠夺或争取政治上优势的战争。例如在《梨俱吠陀》中所描写的十王之战就是当时影响很大的一次大战。这次战争中十个部落的联盟共同反对当时最强大的婆罗多国王修达斯。结果这次战争以联盟被击溃而告终。以部落联盟方式参战，充分反映出当时的战争规模已相当庞大。

继十王之战后，在约公元前9世纪，即后斯吠陀时代，又发生了一次更大规模的战争。这就是在《摩诃婆罗多》史诗中所描述的婆罗多族内部的一次大战。这次大战虽系婆罗多族的后裔居楼族与般度族之间的战争，但几乎北印度所有的部落都参加了。参加到般度族一方的有婆蹉、支提、迦尸、南般闍罗、西摩揭陀以及迦普沙罗部落；参加到居楼族一方的有东摩揭陀、毗提诃、鸯伽、羯陵伽、居萨罗、阿般提以及整个旁遮普部落。这次大战的结果以般度族的胜利而告终。般度族的帕里克希特成了居楼国的国王，都于阿桑迪瓦特。但这一时期的各部落仍是分散的，没有建立起一个更大的统一体。虽然有些国王由于一时的强大而号称大王，但这只意味着强大，或为某一暂时联盟的首领，而并不意味着它是一个更大统一体的统治者。

这次大战以后，军事民主制的全盛时代已经过去。由于阶级关系的进一步分化，部落首领和贵族势力的进一步加强，军事民主制的各机关逐渐地脱离了自己在人民中的根基而为国家机关所代替。在这次大战后，许多古老的部落消失了，许多新的部落兴起。例如，过去有名的强大的婆罗多部落和普鲁部落均合并于居楼部落。居楼部落及其联盟般闍罗部落成为大战后重要的部落。居楼部落在迦那麦伽统治时版图很大。他号称“大王”，曾侵入犍陀罗的坦叉始罗城。居楼部落可能是最早形成为国家的一个部落。这样，约在公元前9—前8世纪可能有极少数部落开始过渡到国家。约在公元前7世纪，南亚次大陆北部已有了一些较重要的国家。到公元前6世纪，大部分部落已先后进入国家阶段，较重要的有十六大国。从此，印度进入列国林立、乱国纷争的列国时代。

## (2) 雅利安人军事的兴起

在吠陀时代，印度还没有常备军。当相邻的部落或国家发生战争时，主要依靠从地方征集兵勇，他们携带自己的武器和装备由他们自己的首领领导。他们主要组成步兵和战车兵（有二马、三马和四马战车）。其中战车兵由富余的“王”或军事首长和贵族组成，而一般人民大众组成步兵。作为古代印度传统的四兵种——步兵、骑兵、战车兵和象兵，只是到这一时代的末期才出现。在早期的《梨俱吠陀》（编纂年代约在公元前12—前9世纪）的记载中，象还被人们视为野兽，尚未应用于战争，也没有提到被应用于战争的单骑的马。

吠陀时代的主要武器是弓箭，在《梨俱吠陀》中就经常提到它们。作为进攻和防御的弓的重要性是唯一被明确提到的。弓箭在古代印度似乎特别受青睐，它们的名称是军事科学的代名词，军事艺术在古代印度就被称为“弓箭学”（射方吠陀）。在咏弓的赞歌里，歌手高唱道：“借助于弓，我们可以制服牲畜；借助于弓，我们可以在争霸权的斗争中获胜，我们可以在激烈冲突中得胜；弓摧毁了我们敌人的希望；借助于弓，我们可以战胜我们四周的一切宗教。”

除了弓箭以外，雅利安人还有矛、标枪、刀、剑、斧和投石器等武器。

作为护身的装备有铜制的铠甲和头盔。《阿闍婆吠陀》( , 8) 中还谈到了使用武器, 利用陷阱、圈套和罗网扰乱敌人使其遭到失败。

雅利安人在吠陀时代的战争中开始使用军旗和军乐。军旗这个词在《梨俱吠陀》中提到过两次( · 85.2 ; X · 103.11)。战争中经常使用的乐器有在《梨俱吠陀》( I · 10.3) 中提到的罐鼓和在《潘遮温夏梵书》( V.5.19) 中提到的陶鼓。

雅利安人很注重防御营垒的建设, 但在早期过着半游牧生活时并没有建筑堡垒。自从雅利安人定居下来组建村落以后, 开始注重村落的布局, 在村落四周围以栅栏, 王道及大道的两端各有大门, 四隅又各设有小门, 在各门上均设有守望台, 日夜有人监守, 以防异族入侵来袭及监视四周牧场或农场中的盗贼。聪慧的雅利安人在入侵印度后, 由于土著居民或达萨拥有很多堡垒(《梨俱吠陀》的赞歌中曾提到雅利安人的民族神和战神因陀罗曾粉碎土著居民的 90 座堡垒), 他们逐渐从敌人那儿学会了建造这种有利的防御设施“普尔”, 即堡垒。堡垒用石头砌成, 也有用未烧制的晒砖砌成。堡垒里面很宽阔, 可容纳很多人, 作为战时的避难所。有了堡垒, 自然会产生破坏堡垒的武器。在《梨俱吠陀》中所提到的“活动堡垒”, 很可能是破坏堡垒的机械。

凯吉曾在其著作中对早期吠陀时代战争进行的过程有一段生动的描述, 其中对雅利安人战斗时堡垒的构筑、鼓号军旗的作用、战车的战斗方式、步兵的排列、衣甲和各类武器的使用等情况都有所反映。文曰:

“当敌人接近雅利安人的边境时, 他们堆起土垒, 筑起木栅, 建起难以通过的青铜堡垒, 并向诸神献祭以企获得他们的帮助。然后军队伴随着高昂的战歌、鼓号的响声, 挥舞着军旗迎战敌人。武士站在战车的左边, 他的身旁是驭者, 而步兵以密集的阵列战斗, 村落连着村落, 部落连着部落。武士以黄铜衣甲和头盔防身: 用弓向敌人发射羽毛箭, 有毒的箭头是用兽角或金属制成的; 或用矛、斧、标枪和投石器追迫敌人。当敌人被征服时, 欢呼声、鼓乐声响彻云霄, 如同暴风骤雨; 人们点燃圣火, 向诸神奉献谢恩的歌声和祭品, 而后分享战利品。”

雅利安人在征服奴役印度土著居民的过程中, 到吠陀时代后期, 逐渐形成了日后成为其民族特色的种姓制度。种姓在吠陀时代被称为瓦尔那, 意即色、质之意, 最初瓦尔那只是指不同的人种和民族集团, 后来就演变为意指社会等级。早在《梨俱吠陀》中, 即有四个瓦尔那或四个种姓之说。这四个瓦尔那是婆罗门、罗阇尼亚(以后称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婆罗门是婆罗门教的祭司, 主要掌握宗教大权, 但也参与军政事务。作为国王祭司的普洛斯泰, 就属于这个等级。他精通军事艺术、宗教仪式和司法。在战斗发生前, 普洛斯泰站在战车的前面, 唱着从《梨俱吠陀》中摘取的合适的赞歌。他亲自把弓、箭和甲冑穿在国王身上, 甚而在马上朗诵赞歌。战时他可能为国王预卜吉凶、出谋划策, 扮演着军师角色。刹帝利是掌握军政大权的贵族武士等级, 是军队中的统帅和骨干力量。吠舍是雅利安人的一般人民大众, 战时则应征从军。首陀罗最初由被征服的非雅利安各族组成, 后来则也包括由于种种原因而被降到这个最卑贱等级的雅利安人。战时他们也可能被组成为军队中的一部分。

---

转引自 B·K·马俊达《古代印度军事制度》(B·K·Majumdar : The Military System in Ancient India), 加尔各答, 1955 年版, 第 23—24 页。

### 3. 列国时代军事的发展

#### (1) 列国林立的兴起

古代印度从公元前 8 世纪左右出现最早的奴隶制国家，经百余年争战兼并，有些地区开始形成较大的国家。到公元前 6 世纪初，南亚次大陆有十六国之说，史称列国时代，它一直延续到公元前 4 世纪末孔雀王朝兴起之时。

列国时代处于由小国发展到大国的阶段，但由于古代印度地域辽阔，情况复杂，由一个大国统一全境在较晚才实现。到列国时代后期，摩揭陀国在恒河流域中部称霸，逐渐兼并四邻，才开始走上统一北部印度的道路。公元前 4 世纪，摩揭陀的难陀王朝终于完成了统一大业，为后来孔雀帝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到公元前 324 年，旃陀罗笈多最终建立了孔雀帝国，印度走上帝国之路。

十六大国之说，主要见于佛教经典，它们大多数位于恒河流域。当然实际国家数目还要多一些。其中势力最强大的：在恒河下游有鸯伽国，都瞻波；恒河中游的有摩揭陀国，都王舍，后迁都华氏城；跋祇国，都吠舍厘；伽尸国，都波罗奈；居萨罗国，都舍卫城；恒河上游则有般阇罗国和居楼国；在印度河流域中游靠近阿富汗边境的有犍陀罗国，都坦叉始罗城。当时的摩揭陀和居萨罗在列国中居于首要地位，其中摩揭陀最为强大。

列国时代，虽然氏族部落的血缘传统还没有完全打破，但作为国家专政工具的军队已不再是以氏族或家族为单位组成的部落武装，而是逐渐采用雇佣兵制，军队由各阶级出身的人组成。国家供给士兵以薪饷，指挥官由国王任命。这种常备军在公元前 6 世纪以前是不存在的。这时的兵种主要是象兵、车兵、骑兵和步兵共四大类。

这个时期国家的统治形式，可以明显地看出有两种，即君主国和共和国。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国王当政，但也有个别国家实行贵族共和制，如佛经中提到跋祇国“数相集会、讲议正事”，又说跋祇首都吠舍厘聚会的贵族首领有 7707 人之多。仍称国王的首领当属于刹帝利瓦尔那的贵族会议选举而不世袭，是这种贵族共和制的另一特色。十六大国之外的较小国家大多也是城邦共和国。共和国的军队主要是公民兵，而不是各大君主国所实行的常备军。共和统治对于印度古代国家的发展情况来说属于例外，到列国时代末期就不再存在了。

列国时代，正是佛教兴起的时代。伟大史诗《摩诃婆罗多》的核心内容大约也形成于这一时代（公元前 5 或前 4 世纪）；另一部史诗《罗摩衍那》的编纂年代略晚（约公元前 4 或前 3 世纪到公元前 2 世纪末）。这两部史诗都是研究列国时代军事发展的重要历史文献。

#### (2) 亚历山大东征印度及其希达斯皮斯河会战

亚历山大偷渡希达斯皮斯河。公元前 518 年，波斯帝国侵入南亚次大陆，占领印度河流域作为它的一个行省。波斯要求印度行省每年缴纳赔款 360 塔兰特，及派送壮丁到波斯充作雇佣军士兵。印度河流域之所以被波斯如此轻易侵入，主要是由于当时印度民族尚未统一，各阶级、各国家不能团结一致对外，因此无法与组织完整的波斯军队对抗。

没想到二百年后，印度民族又受到了一次来自西方的侵袭，马其顿国王

亚历山大在推翻波斯霸权后，决定东征印度。他感到最足以诱惑其更向东进者，仍为东方印度河、恒河流域地方之富饶，以及二百年来印度对波斯连续不断的赔款与供给兵力二事。更何况当时南亚次大陆西北部正处于许多小国分立的局面，亚历山大想借机逐个击破，征占印度。

公元前 327 年春，亚历山大侵入印度河流域的上游地区。他预先取得了犍陀罗国王给他帮助的诺言。犍陀罗国与统治希达斯皮斯河以东的一个大国波罗斯国相敌对，而后者发誓要誓死抵抗亚历山大军队。

当亚历山大架起浮桥要渡过宽阔的印度河时，犍陀罗国王的使者给他送来了银子 200 塔兰特、公牛 3000 头、绵羊 10000 只、大象 30 头，此外还派给亚历山大 700 人的骑兵队伍。在印度河上游地区还有许多国家和部落向亚历山大表示臣服。

亚历山大留一将领作犍陀罗国首都坦叉始罗的太守后，立即向东再进，催促军队要在坚决反对亚历山大的波罗斯王到达前渡过希达斯皮斯河。但是亚历山大没有能跑在印度人的前面。当他来到希达斯皮斯河西岸的时候，波罗斯王已经带着群象保护的大军在河对岸严阵以待，共有步兵 30000，骑兵 4000，战车 300 辆，战象 200 头。

在有这样一支军队当前的时候强渡宽阔的希达斯皮斯河，是十分危险的军事行动。但亚历山大决定冒险偷渡河流。他在河流下游假装企图渡河而不安营扎寨，以吸引波罗斯的注意，却暗地里运送大队人马在河的上游准备渡河。

渡河的船只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把已在印度河渡口准备好的那些船只拆卸运到希达斯皮斯河边。据阿里安在其《亚历山大远征记》中记载，较小的船拆成两段，那些 30 桨的大船截成三段，然后装在大车上运至希达斯皮斯河岸。到达后再重新安装起来下水。另一部分船只是皮筏，即把盖帐篷用的兽皮集中起来，作成装满谷壳的皮筏。一切准备就绪后，亚历山大选择了一个最有利的渡河点趁黑夜偷渡，终于渡河成功。

亚历山大的军队登陆后，打败了防守河岸的小股守军，然后稍作休整，准备同波罗斯的主力军队在希达斯皮斯河边展开大会战。

波罗斯的战斗部署。波罗斯王从逃回来的骑兵那里得知亚历山大已经率军渡过希达斯皮斯河，决定率领全部兵力同亚历山大在希达斯皮斯河边展开决战。史密斯博士遵照古希腊作家狄奥多洛斯和库尔提阿斯的记述，对波罗斯抗击亚历山大的战斗部署描写如下：

“印度国王率领雄壮的队伍向前开进，为保卫他的国家而抵抗来自西方的大胆的侵略者。200 只巨象被一只一只地布置在不下 1000 名步兵之间，大概排成了 8 列，组成中央战线。波罗斯王坚信这些特意布署的巨兽会吓倒外国士兵，并使受惊的战马难以驾驭。在象的后面部署着由 3 万名步兵组成的密集队伍，两翼凸出，步兵纵队在象群中间向前推进。这样，印度军队的阵势与一座城池十分相像，站立的象群有如城池的塔楼，象群中间排列的步兵就像塔楼之间一道道墙一样（狄奥多洛斯，X，87）。战线的两翼有骑兵和战车掩护。骑兵有 4000 名，战车为 300 辆。每辆战车有 4 匹马牵引，车上载 6 人。其中 2 名为弓箭手，位于战车两侧；2 名为盾牌手和 2 名驭者。驭者在战斗激烈的时候，习惯于放开缰绳而用标枪打击敌人（Q·库尔提阿斯，，

14)。”

每辆战车的兵员数目，另据斯特拉波记载为3人，有2名战士坐在驭者两边。象兵，或在绑在象背上的方箱（如同塔楼）里面，或骑在象的赤背上。战象驮有3名战士，其中2名从侧面发射，另一名从后面发射。还有第四人为驭者，手持刺棒以指引战象沿某一方向前进。骑兵手持长矛或标枪，骑马作战。每个步兵都装备有蒙以生牛皮的又宽又长的手盾以及矛和弓箭。弓很大，长短如同持弓者的身高，弓箭手要把弓支撑在地上，用左脚向前蹬压，右手向后用力拉弦来射出箭支。他们所使用的箭支几乎有三肘长，无论盾牌，还是护胸金甲，都不能抵挡住印度弓箭手射出的箭支。

希达斯皮斯河会战。亚历山大虽然偷渡过了希达斯皮斯河，但渡河作战的士兵不多，大概步兵有60000人，骑兵4000人，他还有一部分军队留在河的西岸，尚未渡过河流。亚历山大面对印度军队已布置好的阵势，迅速调动一队骑兵发起猛攻，逼迫波罗斯的骑兵紧急改变队形，并且趁着波罗斯骑兵在改变队形而陷入混乱之机，率领另一队骑兵向他们猛扑。波罗斯军队的右翼被打乱了。这时，波罗斯王推进他那构成阵势第一行列的战象，他的败退下来的骑兵于是急急忙忙向他们自己的战象靠拢，好像是要寻找一堵良好的避风墙似的。这时印度象官则驱赶着战象去阻击亚历山大的骑兵。亚历山大于是下令骑兵闪开，让步兵迎战战象。马其顿方阵与印度战象开始了残酷的战斗。亚历山大骑兵把战象四面包围起来，从四面八方向坐在那些古代“坦克”上的象兵射出如骤雨一样的箭支和掷出无数的标枪。于是，虽然勇猛的印度战象左冲右撞，把密集的马其顿方阵冲撞得乱七八糟，但是如雨的箭支和标枪也打伤了许多战象。

这时亚历山大骑兵与印度骑兵再次对战，结果印度骑兵又感不支，只好又败退到大象那里。可是被亚历山大箭支和标枪打伤的战象感觉疼痛，这些大象胡冲乱撞，践踏破坏。不管是敌是友，都受害不小。而挤在大象四周狭窄地带的印度骑兵都是两面受冲击，因此损失也就更大。很多象官和大象被打死打伤。有些大象由于厌烦，又已无人驾驭，于是在这场混战中也不再躲避，仿佛被临头大祸刺激得发了狂，不停地左冲右突，横冲直撞，践踏破坏，不遗余力。但马其顿部队，由于有回旋余地，可以视情况自行决定：大象冲来，他们就退，大象一逃，他们就追，一直不断地用标枪投射它们。而印度部队却与此相反：他们夹杂在大象之间往后退，正在受到大象更大的伤害。见此情景，亚历山大命令骑兵包围敌人，号令步兵重整方阵，把他们的盾牌连接起来作为活动堡垒压向敌人。

波罗斯的军队开始四散逃命。亚历山大留在河西的军队此时才渡过河来，被派遣追赶波罗斯的败兵。据阿里安记载，印度人在战斗中伤亡惨重，步兵死亡近20000人，骑兵约3000名，战车全部被毁，所有幸存的大象全部被俘。波罗斯王有两个儿子也阵亡在战场上。他本人骑在战象上勇猛作战，直到他受伤而变得衰弱无力的时候，他的象表现出了惊人的聪明和对主人的关心。当主人能作战的时候，它保护他使不受进攻的敌人的伤害，把敌人打回去，但是当它觉得主人因多处受伤而准备下来时，它就小心谨慎地卧在地上，让主人下来，并用鼻子拔出波罗斯王身上所中的标枪。

当波罗斯王负伤九处被俘而被解到亚历山大面前时，他傲然要求像对待

一个国王那样接待他。可是他最终被劝投降，接受了亚历山大的恩赐。亚历山大决心让波罗斯王成为自己的同盟者，对待他非常宽大，不但留给波罗斯王自己的王国，而且让给他一大块被征服的土地。

希达斯皮斯河会战的最显著特点是象战。战象高大勇猛，如果使用得当，战术得法，会在战场上发挥出巨大的威力。而波罗斯象战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消极防御和部署失当造成的。波罗斯所布阵法，面对机动灵活、积极进攻的西方军队，不但没有发挥出威力，反而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大象的威力在马其顿弓箭手、投枪手的打击下丧失了，并使夹杂在象群中间的印度步兵（这也是部署上的失策）和撤退到象群后面的骑兵惨遭践踏，处于自相残杀的境地。从波罗斯的失败，印度人吸取了教训，从此以后，布阵战法一般不再采用，逐渐被机动灵活的战术所取代。

亚历山大对波罗斯的胜利，使邻近的国家和部落自动来归服。亚历山大命令军队休整 30 天后，又让军队东进，进攻迦达延人及其同盟者据守的桑加拉城。他们对亚历山大军队进行了强烈的抵抗。在攻城时，希腊人战死了 100 多人，受伤了 1200 多人。为了报复这个损失，亚历山大在攻破城池后，屠杀了大量守军，并把城市铲成平地。

可就在亚历山大继续东征，到达印度河最后一条支流——希达西斯河时，军队里突然发生了哗变。战士们对于不断的战斗感到厌倦，而且如他们所知，再往东去，有比波罗斯王国更加强大的摩揭陀难陀王朝。当时难陀王朝的国王达纳·难陀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据希腊古典作家柯蒂阿斯记载，有骑兵 2 万，步兵 20 万，战车 2 千辆，战象 3 千头。而普鲁塔克的记载数字更高，据他说，达纳·难陀有骑兵 8 万、步兵 20 万，战车 8 千辆，战象 6 千头。于是战士们拒绝跟随亚历山大东去，甚至有凯诺斯那样的亚历山大的老战友在内的军官们也请求他放弃继续进军并转回祖国。亚历山大劝说军队，答应胜利后给他们大量掳获物，结果白费力气，他不得不下令撤军回国。大军沿印度河而下，于公元前 325 年回到新都巴比伦，亚历山大东征结束。

亚历山大的军队对印度人的大无畏精神和军事技术有着极深的印象。他们遇见的对手并非像波斯那样的老弱残兵，他们不得和有如波罗斯王这样的将领以及桑加拉城的保卫者那样的战士相周旋。在谈到当时印度人的军事技术时，阿庇安认为“在战争的艺术上，他们比当时定居在亚洲的其他民族要高明得多”。马其顿军队不肯继续前进，并不仅仅是害怕难陀王朝的强大军队，而主要是基于他们对印度人作战的经验教训。

印度西北部地区虽然这时仍然处于小国林立的分裂状态，被亚历山大得以逐个击破征服，但这时的印度民族与二百年前被波斯入侵蹂躏情形相比较，他们的民族精神显然有了极大的进步，他们英勇抗战，反对外侮，倾向于内部统一，民族团结心日渐增强，这可能与当时已开始盛行的佛教鼓吹四民平等，阶级关系因此有所缓和有关。

亚历山大对印度的征战在印度的军事思想和军事制度上都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虽然在亚历山大东征结束以后，印度人逐渐放弃了以前的布阵战法，而代替以机动灵活的战术，但是印度的国王们宁愿照老一套办事，依靠他们的大象和由大量步兵所支援的战车。他们没有想掌握亚历山大的骑兵冲击战术。亚历山大东征印度最重要的后果恐怕是间接帮助印度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并为旃陀罗笈多孔雀帝国的到来铺平了道路。印度西北部曾经长期滞留在摩揭陀的版图之外，如果不是亚历山大摧毁了这些部落和国家军事上的元

气，旃陀罗笈多要征服这个地区是相当困难的。因此亚历山大撤军回国之后，就是孔雀帝国建立的到来。

### (3) 摩揭陀称霸列国与孔雀帝国建立

摩揭陀的名称，最早见于《阿闍婆吠陀》（ ，22·14），在这里表示一种愿望，即愿热病侵袭犍陀罗、木劫温特和鸯伽等。它们分别处在西北和东部地区，远离吠陀文化的古老中心。在婆罗多大战时期，摩揭陀由巴利赫德罗陀王朝统治。后来，巴利赫德罗陀王朝的最后一个国王栗朋杰耶被杀，曷利昂伽家族的频毗沙罗登上了摩揭陀的王位，曷利昂伽王朝兴起。

据佛经所述，当佛教兴起之时，摩揭陀国王名叫频毗沙罗（即瓶沙王），他对外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与犍陀罗、居萨罗等国通好，却全力吞并东邻鸯伽，对内则加强专制统治，以严刑苛法维护王权。据说他治下村镇 8 万，国土大为扩张。据《大史》记载，频毗沙罗的统治大约从公元前 544 到前 493 年，历时 52 年。频毗沙罗有时被称为 Srenika 或 Seniya，这两个形容词按注释家的解释，意为“拥有大量军队”。频毗沙罗正是以大量军队为后盾，对外又多采取以联姻联系的睦邻友好政策，大大提高了摩揭陀在列国中的威望。

频毗沙罗都于王舍旧城，为五山所环抱，形成自然屏障。玄奘在《大唐西游记》中称之为矩奢揭罗补罗，或日上茅宫城，因这里“多出胜上吉祥香茅”。王舍旧城有内外两重卫城围绕。外卫城修筑在环绕旧城诸山的山脊上，状似中国的万里长城，长约 25—30 英里。卫城是用巨大的石块垒成。位于南面班根伽隘口的外卫城，高达 11—12 英尺之间。大部分山脊上的卫城已遭破坏，很少高于 7—8 英尺，沿外卫城，每隔一定距离还附有实心建筑的棱堡。作为外卫城的补充防御设施，还有竖立在各山丘之上的瞭望台和瞭望塔。内卫城则位于群山脚下谷地的四周，周围近 4.5 英里，现只保留有几段土石相杂的长脊，大多已坍塌残破。王舍旧城大约建于公元前 6 世纪，而旧城以北不远的地方还建有王舍新城。新城的修建，据玄奘的记载是为了防御来自吠舍厘（跋祇）的北方边患。“以王（指频毗沙罗）先舍于此，故称王舍城也。”此处的王舍城，玄奘亦音译为曷罗闍姑利晒城，实指新城。但玄奘又说：“或云：至末生怨王（阿闍世）乃筑此城。”在《法显传》中却肯定他说：“新城者，是阿闍世王所造。”新城实际上是旧城的一个前哨卫城。此城周围近 3 英里，围绕城市的石墙几乎完全消失，仅有一部分卫城的城墙还保存着，似在显示着它在古时频繁战争中所起的作用。

频毗沙罗晚年被其子阿闍世所杀，阿闍世于公元前 493 年嗣位。他把摩揭陀的首都由王舍旧城迁到王舍新城，积极推行对外扩张政策。最初阿闍世与居萨罗国展开争斗，开始阿闍世获胜，但不久中伏，不得不率军投降。最后两国缔结和约，以联姻方式保持和平共处。

在阿闍世的对外扩张过程中，最大的劲敌是北方的跋祇国。它是东印度政治联盟（包括末罗、迦尸和居萨罗）的盟主，首领是离车族的国王切特克。阿闍世为战胜离车族积极备战，在恒河南岸建一新的城堡，作为战时的前方基地，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华氏城。在佛教文献中也曾提到建造此城的目的，“此是禹舍大臣（阿闍世的大臣）所造，以防跋祇国。”另外，阿闍世命令大臣禹舍在离车族中间散布不和的种子，破坏跋祇国内部的团结。经过一系列准备后，阿闍世开始对跋祇国发动战争。这次战争从公元前 484 年一直延

续到公元前 468 年，长达 16 年之久。最后阿闍世取得完全胜利。离车族被征服后，迦尸也屈服于摩揭陀的统治，东印度政治联盟瓦解，阿闍世成为东印度的霸主。

公元前 414 年，希苏那伽在人民反暴政的斗争中登上摩揭陀王位，建立希苏那伽王朝。不久，经过激战，他征服了中印度的阿般提国，跋沙和居萨罗也被吞并。到此时，摩揭陀几乎征服了所有的重要国家，称雄列国。

但是到公元前 346 年，摩诃波德摩·难陀杀害希苏那伽王朝的末帝摩诃南丁，建立难陀王朝。难陀王朝迅速扩展领土，直达希发西斯河，占领了北印度的主要地区。北印度基本上在难陀王朝的统治下统一起来。难陀王朝的统一事业，为即将到来的孔雀帝国的一统天下打下了基础。

难陀王朝雄踞恒河流域，兵强马壮，使入侵的希腊人胆寒。希腊人撤军回国后，难陀王朝也已进入其暮年，北印各地人民起义频繁，政局动荡，于是孔雀王朝的建立者旃陀罗笈多乘机而起。

据佛教文献记载，旃陀罗笈多的父亲是一个氏族的首领，死于边境冲突中，他幼时孤苦伶仃，靠牧人猎人养大。由于才能出众，被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考底利耶所看重，把他带至犍陀罗国首都坦叉始罗学习。那儿正是希腊人侵占印度首先占领的战略要地，旃陀罗笈多得以见识希腊军旅。他曾走访亚历山大，却因惹怒了亚历山大险遭杀身之祸，逃出来之后便与考底利耶联合召集军队反抗马其顿军队。

亚历山大撤军回国后，马其顿在印度的统治濒于崩溃。旃陀罗笈多利用这个机会，扩充其军队，并于公元前 324 年自立为王，开始了反马其顿的斗争。直到公元前 317 年，才迫使马其顿大将欧德穆斯撤退，旃陀罗笈多光复了印度西北部。

赶走希腊人以后，旃陀罗笈多在考底利耶的帮助下直接向难陀王朝的首都进军。大军势如破竹，他迅速攻下华氏城，杀死了难陀王朝的末代国王达纳·难陀。

不久，旃陀罗笈多又再次击退了希腊人塞琉古想收回阿富汗和印度的进军，使孔雀王朝版图及于阿富汗的喀布尔、坎大哈和赫拉特等地，最后他还向南印度进军，使帝国疆域扩展到迈索尔一带，从而在印度史上第一次建立了统一规模最大、开拓疆土最多的奴隶制大帝国，印度史也发展到帝国时代。

#### (4) 列国时代军事的发展

军事制度。到列国时代，印度的军队组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史诗的记载中我们得知，列国时代的国王们已经拥有了一支强大的常备军，并且有很好的训练。军队在兵种建设上，已从吠陀时代的两个兵种，即车兵和步兵，发展到四个兵种，即步兵、车兵、象兵、骑兵。这四个兵种在早期的佛教文献中亦到处可见，例如在《摩诃僧祇律》中写道：“军有四种：象军、马军、车军、步军。象军者，四人护象足，是名象军。马军者，八人护马足，是名马军。车军者，十六人护车，是名车军。步军者，三十二人执持兵仗，是名步军。是名四种军。”这四种兵种是古代印度传统的兵种，甚至在公元 7 世纪的《大唐西域记》中，仍讲“凡有四兵，

步、马、车、象”。但有时也有六兵种之说，在《摩诃婆罗多》的《和平篇》中记述说：“步兵，骑兵，战车和象，此外又附加以库藏和机械。”库藏和机械当为前面作为战斗部队的四兵种之外的后勤部队。而对于传统的四兵种，在两大史诗中一再强调步兵的重要性，但从《往世书》来看，在四兵种中战车或进而说战车上的战士，在列国时代的战争中被认为起着最显著的和决定的作用。

这时印度的常备军得以良好的训练。他们要练习攀登、骑马、快速行军、打击、进出堡垒等等，尤其要掌握在象背上的战斗技术、马术、战车驾御技术和弓箭射击技能。士兵们要经常进行检验和参加军事比武。古代印度人认为只有军队经过良好的训练时，他们才能打仗，未经训练的士兵是无价值的，有远虑的人民应当适时地训练他们。

作为常备军，印度军人大概领有固定的、正常的薪俸。在《摩诃婆罗多》的《大会篇》中，那罗陀告诫说，应及时向士兵发送俸给，一刻也不得延宕，否则将对国家是无益的。在《摩诃婆罗多》的《萨薄篇》和《和平篇》中也提到，在远征前夕要提前向军队全体人员发送额外津贴，还对阵亡士兵的家属赠予粮食。在《往世书》中，士兵的正常薪俸被当作头等重要的大事。

关于军队的编制，在《摩诃婆罗多》中有不少反映，但各篇介绍不一致，无法从中推断出一个统一的军事编制规则。据《初篇》反映，一头象、一辆战车、三匹马和五名步兵组成一个小分队，称为波特提；三个波特提组成一个塞那穆克；三个塞那穆克组成一个怛勒摩；三个怛勒摩组成一个哥纳；三个哥纳组成一个瓦黑尼；三个瓦黑尼组成一个普利特那；三个普利特那组成一个杰穆；三个杰穆组成一个阿尼吉尼；三个阿尼吉尼组成一个阿克绍希尼。阿克绍希尼是最大的军事编制单位，如同罗马的军团，包括 21870 头战象、28170 辆战车、65610 匹马和 109350 名步兵。以三三编制组成的各部队最终形成一个阿克绍希尼麾下的整个军队。

但在《备战篇》中又反映了另一种军队编制方法，认为由 500 辆战车和 500 头战象组成一个塞那，十个塞那组成一个普利特那，十个普利特那又组成一个瓦黑尼。这样，瓦黑尼的总数将达到 10 万，由 5 万辆战车和 5 万头战象组成。

在《和平篇》中却又介绍了另一种军队编制方法。这样，史诗各篇反映不一，我们又未发现别的史料文献，古印度军队编制方法难以解释清楚。

古代印度人喜好布置阵法作战，而且阵法多种多样，在《摩诃婆罗多》所描述的大战中，般度族就经常变换他们的阵法。他们经常采取的阵法有针阵、苍鹭阵、鹰阵、鳄鱼阵、圆阵、雷电阵等等。有的学者对《摩诃婆罗多》介绍的阵法经过严密的考查认为，在摩诃婆罗多战争中所采用的阵列，至少存在四种一般的运动形式，即圆形的、弯曲的、分散的和密集的，同中世纪英国的纵深密集队形差不多。在佛教文献《四分律》中也提到阵形时说：“阵者，四方阵，或圆阵，或半月形阵，或张甄阵，或函相阵。”布阵的战法，到孔雀帝国时代已退居次要地位，而代之以新兴的利用战争策略来克敌克胜。

---

玄奘：《大唐西域记》，章巽校点，1977年版，第38页。

转引自马俊达《古代印度军事制度》，加尔各答，1955年版，第39页。

《佛本生经》，，NO.283；，NO.492。

列国时代的国王们仍然发扬利用军旗和军乐来鼓舞战士士气和斗志的传统。此时的军乐器主要有贝壳、小鼓、罐鼓、铜钹和阿纳卡等。作战和行军时，古印度也如中国一样，军旗到处飘扬。《摩诃婆罗多》把军队就称为 Dhvajini，意即“旌旗的队伍”。古印度还有乐器发号施令指挥战斗，用吹海螺的声音表示战斗的开始，日落后的鼓声表示战斗的结束，出征时则以敲铜锣为令。

行军和野营。印度军队的行军和扎营很有特色。《摩诃婆罗多》和《往世书》中都介绍了军队行军的原则，当进攻的准备不足或和谈正在进行时，应采取慢速行军，否则应采取急行军。军乐和战鼓齐鸣是印度军队行军的经常特征。在《摩诃婆罗多》的《备战篇》中对般度族军队的行军有生动的描写：

“由四种传统的兵种组成军队，在激昂的海螺声中，在擂鼓和不断高声呐喊中参差不齐地行进。身着全副盔甲的怖军和若干骑兵作先头部队走在队伍的前面。第二队是普罗波德克和般闍罗。国王位于行军纵队的中央，前后护拥着装满粮秣、帐篷、财宝箱、武器和机械的大小车辆。紧随国王之后前进的是以骑兵为首的主力军队。军队的运动引起那样惊人的响声，‘像是新月之日高潮涌来那样深沉的吼声’。”

伴随着般度族军队的还有由医生和护士组成的野战卫生队。当行军停止、决定扎营时，一般要选择靠近森林或河边的地方。在《摩诃婆罗多》的《备战篇》中曾对居楼族的营地作了以下描述：

“在占地五由旬多的宽阔的地域内，还包括有无数帐篷和贮存有粮食和武器的大帐篷。营地周围还有轮流值班的军队担任哨兵和巡逻的任务。除了战斗人员之外，两个营地（居楼族和般度族）还住有大量的和混杂的非战斗人员的队伍，如吟唱诗人、颂扬者、祭司、拍卖者、商人、妓女和妇女行列。”

兵器和防护装备。在列国时代，印度人的兵器的种类多种多样。在《往世书》中曾提到，苏姆波进军时带有 86 种不同的武器和 84 种不同的棍棒。有的学者在经过深入研究后，提出一些比较常见和重要的兵器有弓、箭、矛、标枪、锤矛、攻防机械、战斧、铁饼，通常设置在堡垒或城堡的墙开口门上的百火神箭以及武器等进攻性兵器，还有盾牌、衣甲、金属盔甲、护颈、射箭手套等防护装备。

这些进攻兵器的防护装备因兵种而异。骑兵佩有剑和长矛；步兵主要持有矛、斧、弓箭和匕首；象兵主要使用弓箭，也佩有剑和斧，以便需要时使用；车兵则主要使用弓箭和标枪。因衣甲装备既沉重又昂贵，因此步兵和骑兵很少身披甲冑。而车兵和象兵则往往使用甲冑护身，因为他们在战场上是打击的主要目标，随时有遭受弓箭射杀的危险。

史诗和文献中的军事法规。从列国时代起在印度出现了为一般所公认的军事法规。史诗和别的文献中提供了宝贵的军事法规资料，它接近于现代国际法所规定的战争法。它注重强调不打击没有武器的、力不均衡的和倒下的敌人；惩罚破坏纪律和背叛者，奖励有功人员；对战俘实行人道；在特定条件下不掠夺敌人财物，对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区别对待等等，闪耀着人

道主义的光芒。史诗中记载了某些重要的法规如下：

身穿甲冑的战士不应同未着衣甲的刹帝利战斗（《摩诃婆罗多》《和平篇》）。

骑兵不应攻击车兵。这一原则的根据是战斗应在均等的条件下进行（《摩诃婆罗多》《和平篇》）。

不应使用带毒的和带钩刺的箭。不应用箭射杀无助的、麻木的或战败的人（《摩诃婆罗多》《和平篇》）。

不应杀害因恐惧而藏匿起来或只是个旁观的非战斗人员（《罗摩衍那》《战斗篇》）。

不应杀害一个放下了武器而求饶的敌人。应优待战俘。应给予成为战俘的未婚女子以周到的待遇，直到一年后遣送她们回家（《摩诃婆罗多》《和平篇》）。

对头发散开的人，对面向别处而不是面向对手的人，对合起掌来既无箭又无甲冑的人，对武器损坏的人和婆罗门，不应杀害（《摩诃婆罗多》《迦尔纳篇》）。

有病的和受伤的人，应给予照顾（《摩诃婆罗多》《和平篇》）。

法典不允许在交战中暗箭伤人（《摩诃婆罗多》《沙利耶篇》）。

在《往世书》和《摩奴法典》中也有类似军事法规的记载。例如《摩奴法典》第7卷的第90至93条写道：“战士在战斗中决不应该对敌使用奸诈兵器，如内藏尖锥的棍棒，或有钩刺的、涂毒的箭，或燃火的标枪。”（第90条）“自己乘车时，不要打击徒步敌人，也不要打击弱如女性或合掌求饶，或头发苍苍，或坐地，或说‘我是你的俘虏’的敌人；或在睡眠，或无甲冑，或裸体，或解除武装，或旁观而未参加战斗，或与他人厮斗的人；或武器已坏，或苦于忧伤，或负重伤，或怯懦，或逃走的敌人；要记取勇兵的义务。”（第91—93条）在记述这些军事法规后，法典认为：这就是关于武士种姓无可非议的和首要的纪律；刹帝利在战斗中杀敌时，决不可违犯它。”在《往世书》中甚至还提到，除非在十分必要的情况下，不得掠夺或破坏敌人的财产。

印度史诗和其它文献所规定的这些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军事法规，在古代世界还是罕见的，它们充分表现了古代印度人民从事战争的鲜明特色，是古代印度军事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

同上书，第57—59页。

《摩奴法典》（马香雪转译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 六、古代中国（夏、商、西周）

### 1. 夏朝——中国古代文明的开始

#### (1) 启建夏与甘之战

夏王朝的建立者为启，实际在启的父亲禹之时就已为他打下了立国的基础。禹早年率领民众治水有大功，提高了自己的声望，晚年则致力于王权的建立工作。其手段一是发动对三苗的战争并取得了胜利，接着，在淮水中游的涂山，大会夏、夷诸部众多邦国和部落的首领，史称“涂山之会”，即所谓“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诸侯们皆对禹朝贡，行臣服的礼节。“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禹俨然如君主，原始平等关系基本消失了，凌驾于社会公职之上的王权已初步形成。再者，在权力的移交上，禹也采取了手段。传说禹晚年在部落联盟酋长议事会上，先后提出均曾担任过重要公职的皋陶和伯益作为自己的继任人，但皋陶先禹而死，伯益任职很短，威望尚不很高。禹同时培植自己儿子启的势力，多数的诸侯、首领有大事找启而不找伯益相商。禹死后，启继立。伯益与启争夺王位而被杀，这就是《竹书纪年》中所说的“益干启位，启杀之”。

和“益干启位”差不多同时，由于传统的“禅让”观念尚有影响，夏西方的同姓（姒姓）诸侯有扈氏（今陕西户县）也起兵反对启继位，启亲率大军讨伐之，发生了著名的“甘之战”（一说户县西部有古甘水为证，另说甘在今洛阳西）。启声称有扈氏犯了“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大逆不道的罪行，他要“恭行天之罚”（即代天行事），要“剿绝其命”。命令部属按照一定的作战位置努力战斗（“左攻于左，右攻于右，御其马之正。”），并规定“用命，赏于祖”（认真执行战斗命令的，便在祖庙祭祀中给予奖赏）。否则，“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即在社坛前予以惩罚。经过启这番战前动员后，士气倍增，大败有扈氏于甘。有扈氏全体成员从此沦为“牧竖”（牧业奴隶）。有扈氏败亡的原因，是“为义而亡，知义而不知宜也”，即只知墨守旧“义”，而不能顺应时“宜”。

夏启杀伯益，灭有扈氏后，召集钧台（相传今河南禹县）大会，史称“钧台之享”，这是继“涂山之会”以后又一次重要的朝会，“所以示诸侯礼也，诸侯所由用命也”。

甘之战，是确立奴隶制王权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战。启排除了原始公社制度和坚持这种制度的守旧势力的干扰，从此，“大人世及以为礼”，开始了我国历史上的“家天下”的局面，巩固了王权，确定了世袭制度。

#### (2) 后羿夺位与少康中兴之战

---

涂山：一般认为在今浙江绍兴西北。

《左传·哀公七年》。

《左传·哀公七年》。

《尚书·甘誓》。

《淮南子·齐俗》。

《左传·昭公四年》。

《礼记·礼运》。

夏王朝建立之初，国家机器还不很完备，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也很激烈。启死后，子太康继立，夏王朝内部发生内讧，先有“五子”（启的五个儿子）争立，接着又有武观叛乱。这都引起人们对夏王朝的不满和怨愤。

东夷有穷氏的首领后羿，乘机“因夏民以代夏政”，攻入夏都，赶走太康，史称“太康失国”。

后羿当了国王。后羿残暴而听信谗言，治国无方。不久，被其亲信寒浞（音茁）杀死，寒浞取代之。

太康死，弟中康立。中康子相继位后，投靠同姓斟灌氏和斟寻氏，又为寒浞所攻杀。相之妻怀孕，从墙洞爬出，逃归母家有仍氏，生少康。

少康长大后，在有仍充当牧正之职。动荡的政治经历激起他从小立下复国之志。寒浞之子浇派人追捉少康，少康逃往舜后代有虞氏，有虞氏君主虞思很器重少康，用他为庖正，把两个姚姓的女子给他做妻，还封给分纶邑。少康在此，“有田一成，有众一旅”。积极召纳夏的余众，作恢复夏王朝统治的准备。夏的贵族名叫靡的，密切配合少康，收集“二斟”的残存力量。最后，经过反复的斗争和较量，以少康为代表的夏王室，终于灭掉寒浞父子，赶走了东夷军队，由少康称王，重新恢复了夏王朝的统治地位，史称“少康复国”，又称“少康中兴”。

“少康中兴”之战的历史意义远远超出了“复国”，更重要的是使初建的奴隶制得到巩固。作为原部落首领的后羿、寒浞和东夷人代表的是落后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他们入主夏土，给夏境新建的奴隶制秩序和社会生产力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少康中兴之战的胜利，制止了这种破坏的继续和蔓延，使中国古代文明在初建不久得以重新巩固下来，一直延续到今天。

### (3) 夏王朝的鼎盛与衰落

“少康中兴”以后，夏王朝的统治开始稳定下来。少康之子季杼继位后开始大规模地对东夷用兵，夏王朝的势力和影响已达黄河中下游大部分地区以至淮河流域，促进了这些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以及华夏族的形成，达到了夏王朝的鼎盛时期。

夏王朝到了帝孔甲时，开始衰落，因为他“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叛）之”。他的淫乱暴虐激起了民众的反抗，也引起了不少诸侯的叛离。“昔孔甲乱夏，四世而隕”。

孔甲三传到桀（履癸）。桀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民怨沸腾，咒骂夏桀“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你哪天完蛋啊？我们宁愿与你同归于尽！）。夏桀为转移视线，召集“有仍之会”，妄图加强对方国的控制，结果适得其反，有缙氏在会上就起兵反抗，夏桀发兵伐有缙，虽勉强压服有缙，但进一步陷入孤立，军力大衰，史称“桀

---

《左传·襄公四年》。

《左传·哀公元年》。

《史记·夏本纪》。

《国语·周语下》。

《史记·夏本纪》。

《尚书·汤誓》。

克有缙，以丧其国”。

正当夏桀残暴害民、危机四伏之时，东方的商部落悄然兴起。组成商部落的商族，子姓，到与夏桀同时的商汤，发展成为黄河下游的一个强大的方国，由夏的驯服属国变成了足以与之抗衡的强大对手，夏朝的灭亡指日可待了。

#### (4) 夏朝——中国奴隶制军事制度的发生期

夏代是中国以领土和财产为基础的奴隶制军事制度的发生期。夏代还带着浓厚的原始氏族社会的遗迹，由于以族为单位的血缘团体仍是社会组织的基本细胞，在军事上就体现为仍存在着为数较多的以血缘团体为基础的氏族武装。这样夏代军队就由以领土财产为基础的奴隶制国家军队和以血缘团体为基础的族兵两部分组成。

夏朝的国家军队是平民兵。平民兵是征发夏族平民而组成的军队。这是当时军事力量的主干。这种平民兵制度，是由军事民主制时期氏族成员战时从戎的惯例发展而来的。平民有自己的土地，平时耕种，战时出征。《左传·哀公元年》记载：少康在观，“有田一成，有众一旅”，一成之田自当是分配给一旅之众的，表明这些“众”即平民是以耕种土地为生的；但又以“旅”的形式组织起来，则表明具有军队的职能。

由于血缘纽带的残留，当时的“族”的规模很大。这些族的族长同时又是夏王朝的命卿，他们往往凭借自己的雄厚人力、物力、自行组织军队，这就是族军。如太康失国后，其孙少康正是在同姓贵族斟寻氏、斟灌氏等宗族的帮助下，才得以复国的。这几个宗族的武力就是由宗族兵组成的。

此外，夏代还有夏王的护卫制。护卫兵制由军事民主制时代的扈从队制度发展而来。它的来源，主要是贵族子弟，还有少数是王的亲信。如《左传·哀公元年》记载后羿被其家众杀死，这些家众就是后羿的护卫兵。

在兵种组成上，夏代的兵种包括步兵和车兵两种。而这两种兵种多是采取协同作战的方式的。

《世本·作篇》谓：“奚仲作车”，奚仲是夏时的人；《左传·定公元年》载：“薛之皇祖奚仲，居夏以为夏车正。”车是否由奚仲发明，难以断定，但从《左传》所载来看，至迟夏代已有车，并且设有“车正”一职来管理，表明当时车的产量已有一定规模。这些车，除用于贵族的乘驾、畋游之外，大部分当是用于军事方面的。

步兵是由来已久的兵种。在夏代，虽然战车已经出现，但很可能还存在步兵独立作战的情况。但在多数情况下，是采用车步兵结合的方式，这种作战方式较之单纯的徒兵作战，无疑战斗力大为提高，因而是一个进步。

作战中，兵车在前，徒兵紧随其后，即所谓“车驰、卒奔”。战车上一般乘坐甲士三人，《尚书·甘誓》：（启命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郑玄注”攻，善也”，“左，车左，右，车右。”车左，车右，再加上御手，恰好为三人。至于每辆战车配置多少徒兵以随其后，则无从得知。

关于夏代军队的编制，我们知道的也很少。根据在氏族制社会晚期，人

---

《左传·昭公十一年》。

《左传·宣公十二年》。

们为了固定居民组织，往往取一整数作为居民编制的进制单位。各民族大多以十作为进制单位（这似乎是个普遍的现象），夏代承袭氏族制而来，无疑仍保留着这种十进制的氏族组织，由于实行兵民合一的兵役制度，因而，这种编组方式也影响到军队的编制。只是限于史料，无法弄清具体情况。据“左传·哀公元年”：少康“有众一旅”，表明“旅”是当时的一个军事编制单位，杜预注认为旅为五百人，是不对的，因为五进制是春秋以来才出现的。这一旅之众要平分一成之田，一成相当于十平方里。据此，估计旅的编制以千人为宜。

夏代军队组织“寓兵于农”的特点，表现在军队的各级将领身上，就是“寓将于卿”，文武不分职。贵族官僚在平时管理庶务，战时即兴兵典戎。

《尚书·甘誓》说：“大战于甘，乃召六卿”中的“六卿”，即属此例。

军事的最高领导权操纵在王手中，而王也经常亲自出征。这主要由于军事民主制下部落首领的军事职能这一特点的残余的影响尚未消除。

夏代的军事制度，处于不完善的草创阶段，但已粗具规模。由于后来的商、西周时代的经济状况、社会结构等与此期相比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因而，这一时期军事制度的几个基本特点如车步兵结合、兵农合一、族兵制、十进制的建制单位、军赋制度、军队领导体制等，均被商、周所沿袭，并在此基础上得以发展和完善。

## 2. 商朝——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

### (1) 鸣条之战与商建国

商汤作为一代明主，任用著名贤臣伊尹和仲虺为左右相，积极作灭夏的准备。在政治上，针对夏桀的暴政，采取“以宽治民”的政策，争取民心，扩大影响，很快得到那些苦于夏桀奴役的小方国的拥护；经济上，努力发展农业和牧业，积极开展内外经济交流，增强实力。

军事上，商汤采取严密的步骤。为了察明夏桀的内部情况，商汤先后两次派伊尹打入夏朝内部，得知社会上流传着“上天弗恤，夏命其卒”的民谣，夏桀已处于天怒人怨的危机状态，便开始了伐夏的军事行动。

商汤首先采取逐个剪除夏桀羽翼，灭掉夏的与国、孤立夏桀的战略。第一个征服的是葛（今河南宁陵县北）。葛在商之西，是通往夏都的必经之路。为了争取它的归服，汤多次馈送粮食和牲畜给葛，并派人前去助耕，都被葛君拒绝。后来，汤以葛君杀害送饭的儿童为理由出兵灭葛，取得了攻夏的第一个胜利。接着又用重兵灭掉了夏在东方的与国——韦（今河南滑县东）和顾（河南范县东）。这样，不仅大大增强了商的军事力量，还大大提高了汤的威望，四海之内都赞扬他的军队是正义之师，打仗非为掠夺财物，各地老百姓像“大旱之望雨”一样盼望商汤的军队，从此，“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包括灭掉夏在东方最有实力的与国——昆吾（河南许昌），打开了直接伐夏的道路。

为了准备直接灭夏的战争，商汤召集会盟，联络同盟军，又采纳伊尹的建议，用停止向夏桀纳贡的办法，试探夏桀的反应。夏桀此时尚能调动九夷之师，准备讨伐商汤，商汤见夏桀威势尚存，“谢罪请服，复入职责”，暂

表假意臣服。

为在举兵以前进一步察明夏的内情，伊尹再次赴夏都，了解到夏桀残暴诛杀关逢龙等忠臣及对众叛亲离的恐惧心理，立即回报于汤。汤再行停止对夏桀的贡奉。桀召集九夷之师讨汤，并召集诸侯在有仍会盟，结果，不仅“九夷之师不起”，而且有缙氏公开反夏。这时，汤认为伐桀的时机完全成熟，遂决心出师一举灭夏。

商汤出师时，举行誓师动员大会，宣布他是奉上天之命伐桀。要求部属尽心辅佐他，然后他大大地赏赐这样的部属，“朕不食言”；否则，“尔不从誓言，予则始孛戮汝，罔有攸赦”，即说如果你们不服从我的命令，我就要惩罚你们，或杀死你们，或让你们当奴隶，决不宽恕。

内部早已分崩离析的夏王朝统治者，得知商汤出兵，仓惶西逃至豫西地区。商汤率师渡过黄河，大兵压境，夏桀率师离开都城仓促在鸣条迎战，汤师勇猛冲突，桀师迅即溃败，桀逃往南巢败死。

鸣条之战的胜利，意味着商代夏的开始，因此商汤和伊尹对此战非常重视，为了夺取此战的胜利作了长期的准备，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方针。他们善于争取和把握有利的战机，实行了争取民众和属国的正确政策，开展了战前的政治攻势，是中国军事史上决战速胜的最早战例，在军事史上也有很重要的地位。夏桀政治上暴虐、腐败，丧失了民众的拥护和属国的支持，内部分崩离析，是其失败的主要原因；桀遭汤进攻时，不知利用都城坚壁疲敌，却仓促出城，迎强猛之敌于野外，犯了兵家之大忌，为汤军提供了速战速胜的条件。

## (2) “武丁中兴”与商朝极盛

商汤灭夏建立商王朝后，国势获得迅速发展，周围小国纷纷臣服，尊商王为共主，形成“自彼氏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的强盛局面。

到第十一王仲丁时，统治集团内部出现诸子弟争立的“九世之乱”，削弱了商王朝的统治。一些方国部落乘机摆脱控制，起兵扰商，商王朝出现混乱局面。

第二十五王盘庚继位后，为了解决内忧外患，振兴商朝统治，迁都于殷，“行汤之政”，从此，商王朝政治走向稳定，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商从此后又称为殷或殷商。

第二十三王武丁。相传他少时曾生活在民间，了解“稼穡之艰难”。即位后，任用奴隶出身的傅说为相，励精图治，使商朝各方面发展起来。

当时商朝努力巩固和发展奴隶制，与周围日益强盛起来的以掠夺战争为正常职业的方国部落的冲突必然激烈。其中地处西北，以羌人为主体的西戎诸部常侵入殷之西北，掠夺庄稼、牲畜和人口，尤其是收获季节，抢夺更加频繁。有时分别出动，扫荡邑落；有时结成联盟，合兵侵掠，使殷西北边境严重不安。还有一些小方国也乘机时服时叛，经常以各种借口拒绝职责，甚至兴兵作乱。因此，武丁伐迫连续多年四方用兵。据甲骨文的记载，武丁征

---

《尚书·汤誓》。

鸣条：一说在今河南洛阳附近，一说在今山西安邑附近。

《诗·商颂·殷武》。

《尚书·无逸》。

代的对象包括上百个方国部落，有时几条战线同时作战。其中以伐鬼方和舌方的战争最为重要与激烈。

鬼方大约在今陕北和内蒙一带，是诸部中势力比较强大的一支。“高宗（武丁）伐鬼方，三年克之”。

伐舌方的战争是商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甲骨卜辞分析此战发生在武丁后期。甲骨文中有关舌方的占卜数量很多。据考证，其活动地区约在今晋陕北部和内蒙河套地区。舌方原臣服于殷，武丁时逐渐强大起来，雄据西北，成为一些游牧部落反殷联盟的首领，曾带领羊方、舌方并联合土方屡屡进犯。这种进犯虽一般规模不很大，却很频繁，不仅庄稼、人畜常被掳掠，而且往往造成边境地区的奴隶乘机逃亡或反抗，对殷构成很大威胁。因此，武丁伐舌方战争历时长，费力大。甲骨文中所载一次用兵一万三千人，就是伐舌方，这是前所未有的用兵规模，超过了对其它任何方国部落的用兵。

战争进程中，武丁始终十分重视敌情，不仅命令驻守西境的武官和地方行政长官严密监视舌方，还调集“多仆”和数千士兵专门负责守望。对具体作战方案，更是进行细致筹划，如舌方军队出动，是否由殷王亲自率师迎击，其遁走是否要乘胜追击，军队如何部署，将领怎样委派等都要经过反复的占卜，说明武丁对舌方用兵始终持以慎重求必胜的方针。这是武丁征伐舌方取胜的重要原因。战争断断续续进行多年，基本上解除了舌方对殷的威胁，到武丁子祖庚在位时，擒获了舌方首领，最终结束战争。

武丁对扰边的方国部落用兵作战，根据对作战对象取胜的难易程度，往往慎重选派军事统帅与将领。舌方是殷长期的劲敌，因此，武丁每每亲率大军伐鬻方，任用仓侯虎伐舌方，令妇好伐龙方，又征羌方，讨马方，克基方等等，互相密切有力配合。其中妇好是我国古代第一位著名的女将军，她是武丁的王妃之一，或独立作战，或协同将领会战，长期协助武丁征伐、镇守在边地。妇好墓中人殉和礼器很多，正是商王对她赫赫战功的褒奖。

武丁对秦岭以南江汉地区的荆楚、江淮一带的群舒和淮水下游、山东沿海一带的夷方，也曾用过兵。因为这些地区的方国部落在政治上也表现出比较强烈的离心倾向，所以，商王朝对这些地方也有时诉诸武力，进行征服。“挾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就是武丁时期比较重要的一次南征荆楚的战争，影响颇大，从此，商代对南方的统治力量，由沿长江一直深入到今湘赣一带。

武丁对四方的征伐战争解除了西北部的边患，扩大了商王朝的疆域和影响，使商王朝的发展进入极盛时期，成为当时世界范围内著名的奴隶制强大国家。武丁死后，其庙号冠以“武”字，被尊为“高宗”，受到殷人的极大崇敬，成为上古一代名君。

### (3) 征伐东夷与商朝灭亡

商朝末年，商王武乙、文丁、帝乙、帝辛（纣）相继在位。这四王都喜用兵作战，讲究武功。因此，前三王的庙号均冠以“武”字，如武乙称武祖乙，文丁称文武或文武丁，帝乙称文武帝或文武帝乙，即是明证。纣因是亡国之君，故无庙号，他在位期间，经常发动战争，其中最著名的是伐东夷之

---

《易·既济》。

《诗·商颂·殷武》。

战。

东夷历来与中原王朝（夏、商）有接触，武丁时更“分迁淮、岱、渐居中土”，与商王朝经常发生正面冲突，至商乙、帝辛（纣）时终于发生了几场大规模战争。

纣征东夷的起因，相传是纣在黎举行军事演习，东夷拒绝参加，纣乃大怒，发兵讨伐。实际真正的原因，是当时商直辖的本土上阶级矛盾已十分激烈，“小民方兴，相为敌仇”，纣为转移视线，发动了对东夷的大战。纣伐东夷的具体情况，史无明确记载，但从俘虏了“亿兆”夷人的战果来看，规模是相当大的。

纣讨伐东夷这类战争，是企图巩固和扩大商王朝统治的战争，它对于保护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扩大中原先进文化的传播范围，加速各民族间的融合，客观上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此战带有很大的野蛮性和掠夺性，东夷人的财物、牲畜遭劫掠，纣对战争俘虏采取奴役和杀戮政策，加剧了与周围方国的对立和仇恨。这与商汤伐夏桀全然不同，既反映商后期国力兵力的强大，也反映了商后期政治上的反动腐朽，是纣在搞穷兵黩武，虽取胜但耗尽国力。

东夷的地形，交通不便，商军出征距离甚远，此战中产生了先遣队的战斗组织。先遣队为主力军进军开辟道路，扫除障碍，保障了主力军的顺利前进，这是军事史上的一个创举。商军又用“乘马服牛”作长途运输工具，由中原通往四方的道路也由此得到迅速开辟。

正当商纣王率精锐之师征伐东夷连取胜利、踌躇满志之时，周武王率领的联军突然出现在商郊牧野，商军一战即溃，纣王自焚身死，商朝随即灭亡，周朝建立，取而代之。

#### （4）商朝——中国奴隶制军事制度的发展朝

商王朝在国家结构上实行内、外服制。概言之，内服是王朝直辖的地区，外服是诸侯的领地。《尚书·酒诰》中提到的侯、甸、男、卫、邦伯，都属于外服的诸侯。内外服制的国家结构影响到军事制度上，商朝存在王国军与方国军两类军队，王国军是中央部队，方国军是地方部队。而方国军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常对王国叛服。于是商朝的军队组织也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存在以地域组织为基础，以“师旅”为单位的编制系族；另一方面，又存在着以血族团体为基础，以“族”为单位的军事组织。

军队的构成。商朝有平民兵、族兵和王的护卫兵。

平民兵即王国军，是由平民即“众”、“众人”组成的队伍，是当时的主要军事力量。卜辞中经常提到的“师”、“族”即是指平民兵而言。

族兵即方国军。卜辞中常见“王族”、“多子族”以及“三族”、“五族”等出征的记载，他们自然都属于族军的范畴。区别在于：王族由商王的族人组成，多子族由子姓（即与商王同姓）贵族的族人组成，而“三族”、“五族”等泛称，很可能是指一般异姓贵族的族军。这些贵族建有各方国，以其族兵为方国军队，具有很大的独立性。

商代可能还存有王的护卫兵，他们可能是从贵族子弟的精良者中入选

---

《后汉书·东夷传》。

《尚书·微子》。

的。但卜辞中没有直接记载。

<2>军队编制。关于族军的编制，没有明确的材料。现仅就王国军即平民兵的情况作一介绍。

据卜辞，知当时有“师”、“族”等编制单位。如：

A、王乍（作）三自（师）：右、中、左。

B、王其令右旅眾左旅畷见方。

由卜辞 A 得知，师通常分为右、中、左三组；卜辞 B 提到右旅、左旅，则似当有中旅。这种三分法主要是为了适应战阵的需要，因而不是进制单位。

旅应是师的下一级编制，这在卜辞中没有明确证据。但《诗·小雅·黍苗》有“我师我旅”之句，则师是高于旅的，这首诗反映的是西周时的情况。由于西周军制是承袭殷商而来，故据周制上推，可知殷商军制亦如此。

师的长官称为“师长”，或称“师氏”。旅的长官，名称不详，有人认为是《尚书·牧誓》中的“亚旅”，但似嫌没有充足证据。

那么，师、旅所辖人数为多少呢？《牧誓》中依次提及“师氏、千夫长、百夫长”，而当时的编制是以十为进制单位的，则师当为万人，旅级很可能是千人，千夫长也很可能就是旅的长官官名；此外，百夫长之下当有以十人为组的建制；十之下，可能有“伍”的组织。

综上所述，商代的军队编制可图示如下：

师——旅——百夫——十夫——伍（？）

（万人）（千人）（百人）（十人）（五人）

兵种。殷商时期的兵种较夏代而言，没有太大变化，仍以战车、步卒为主。《论语·卫灵公》载孔子语：“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孔子将三代各自典型的東西列举出来，表明殷人制车（辂）的技术水平极高，甚至连周人都望尘莫及。此外，甲骨文中有许多“车”字的象形字，从中也可以略见当时战车的风采。战车的质量、数量的提高，无疑是车战规模扩大的主要标志。

步兵，人数最多，是军队的基础力量。一般情况下，是车步兵配合作战，但卜辞中有不少“步伐”、“步”（作动词用）的记录，据此，则当时尚有步兵独立作战的方式。应该指出，商代的这种步兵，与春秋时兴起的建制步兵在本质有所不同，春秋时的步兵是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而从车步兵配合作战的方式中分化而出的，商代的步兵，应是氏族制时代的步兵兵种的子遗。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传统的步兵独立作战方式的影响；二是战车数量不够配备全部的步卒。

战车的编制，一般是五辆为一组，一辆领头，其余四辆排成方阵。殷墟宗庙遗址出土的五辆战车，即如此排列。这种五车一组的编制形式似乎与夏代不同。每辆战车一般配置三名武士，其中一人驾车，一人执戈，一人执弓矢，其后跟从步卒十五人，殷墟宗庙遗址出土的一辆战车，有十五人陪葬，他们生前当是跟从此车的徒兵。

车徒步结合，决定了当时作战只能采用战阵的方式。因而，两军对垒，就要选择开阔平坦的原野，作为角逐的战场，《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载宋襄公语：“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即不据守险要。商代的情况正是如

---

《尚书·盘庚》。

《尚书·牧誓》。

此。

商代可能已出现了骑兵。前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第十三次殷墟发掘中，发现一座人马合葬墓（M164），包括一人一马，一套兵器，据此，有人认为死者生前系骑士。如果真的如此，则骑兵之制不是始自战国。但考虑到当时的社会条件、自然条件，骑兵的规模不会很大。

军事训练。由于平民兵是靠兵农合一的方式组建起来的，因而不可能像后世常备军那样进行长期的、专门化的军事训练，而只能是在农闲时节举行不定期的军事训练。卜辞中有“振旅”的记载，即指军事训练。《左传》中曾提到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的军训制度，这是晚出的、且较规范化的制度。但在商代，尚没有明确的四季划分，当时只是将一年分为春年、秋两季，至西周时仍然如此。因而，当时的军训，大概亦即以两季举行。

军训的方式，仍保留较原始的特征，即通过狩猎来进行军训。《左传》所说的蒐、苗、狝、狩、名称虽异，就实质而言，都是围绕畋猎进行的。《左传·昭公四年》：“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则商代当有“蒐”的名称。卜辞中没有直接的关于军训的资料，但有关畋猎的资料却不在少数，这些畋猎自当含有军事训练的用意。

族兵由于隶属于方国宗族，因而，有可能作一些经常性的军训，不过，其训练方式，大概同平民兵一样，都以畋猎的手段进行。

王的护卫兵属于常备兵，最为精良，采取经常性的训练方式。卜辞中有“序教”的记载，其对象即是王的卫士。

军队领导体制。殷商时期的国家结构带有明显的部落联盟的色彩，王国维认为商王不过是“诸侯之长”而已。因而，在军队领导体制上，当时的军队领导权是分散的。除了王国军，非但畿外诸侯的军队，商王操纵不得，即便是畿内贵族的族军也有很大的独立性，商王只能以族为单位征调他们，而不能自行对他们重新编组。

当时的王权还残留有部首领的特点，即以军事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能。卜辞中常见商王亲征的事例，再就是派太子或后妃率军出征。后妃中，妇好即是最有名的一个。商王这样做的目的，无疑是为了加强王权。此外，大多数情况下是命将出征，出征前要举行授将以“册”的仪式，以表明将的权力得到了王的认可。

卜辞中习见的武职有：马、亚、大亚、马小臣、走马、射、箠亚等。其中马和亚（大亚）的职位最重，马类似于周代的司马。

由于当时官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文武不分职，因此，这些武职在平时亦负责其它方面的庶务。同样，有些偏重文职的职官在战时也有从戎的义务。

### 3. 西周——中国古代奴隶制文明的鼎盛

#### (1) 牧野之战与周朝建立

周也是个历史悠久的部族，姬姓。他们最早的活动地区，是在宜于农耕的陕西黄土高原。其始祖后稷和稍后的公刘，都重视农业，经济迅速发展。

---

参见胡厚宣《殷墟发掘》第108页。

参见于省吾《岁时初考》，载《历史研究》1961年第4期。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十。

九世传到古公亶父，率领族人由豳（今陕西栒邑）迁到周原（今陕西岐山），从此进入有“城郭宫室”的阶级社会，更加强大起来，他被尊为“太王”。

与商纣王同时在位的是周文王姬昌。商处末期而腐朽，周新兴而崛起，形成鲜明对比。

商纣是个恃才狂傲的君主，他“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但他和夏桀一样，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他凭藉武力对内进行残酷的压迫，敲骨吸髓地剥削奴隶和平民，“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以满足他的穷奢极欲。他又大兴土木，南从朝歌（今河南淇县），北到邯郸，建了很多“离宫别馆”，还建“酒池”、“肉林”，痛饮狂欢，过着腐朽糜烂的生活。这时，商与周围各方国的矛盾也不断加剧。对东夷的连年战争，虽然最后取得了胜利，但把人力物力消耗殆尽，加深了内部的阶级矛盾，“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叛）者”，“小民方兴，相为敌仇”，社会动荡不安，“咨女（汝）殷商，如螟如螾”，到处是哀怨和愤怒声，像开了锅一样。统治集团中有人惊恐万状地哀叹“今殷其沦丧，若涉大水，其无津涯”。但商纣王却一意孤行，他宠爱妲己，又滥用“炮烙”等酷刑，其王叔比干强谏被杀，箕子被囚，庶兄微子啓出走。商纣已陷入众叛亲离的境地。

周却是一派兴旺发达景象。文王在位五十年，始终把灭商作为自己的战略目标，他吸取前辈的教训，注意在形式上臣服于商，在暗地里积极积蓄力量，招揽四方人士，扩大周的影响。对内，他制定了“有亡荒阅”的法令，即定期大规模清查逃亡的奴隶，得到各级奴隶主贵族的拥护，对外，常帮助解决邻近小国的纠纷和领土争端，进一步赢得诸侯国的信赖，出现了“诸侯多叛纣而归西伯（文王）”的局面，这些都表明周在内政和外交方面都优胜于商。

周文王的战略意图被商纣王的亲信崇侯虎所觉察，他向纣王指出周对商的威胁，纣囚禁文王于羑里（今河南汤阴），文王的谋臣们向纣进献美女和宝物，终于使文王得赦归国。之后，文王采取由近及远、先弱后强地逐个征服周围的敌国，消灭商的一些邻近属国，又及时联合西方诸侯讨伐崇侯虎，拔除了东进路上最后一个拦路虎，基本上形成了对商的钳形夹击的态势。文王晚年，周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局面。

文王死后，子发继立，是为武王。此时商王朝内外交困，周取代商的形势已形成。武王继承父志，在泮水东岸建镐京，将军事政治中心东移，继续积极作灭商准备。武王九年，联合各路诸侯东向观兵至孟津（今河南孟县西南），有八百诸侯参加，史称“孟津之誓”，这是一次“诸侯所由用命”的

---

《史记·殷本纪》。

《史记·殷本纪》。

《史记·殷本纪》。

《尚书·微子》。

《诗·大雅·荡》。

《尚书·微子》。

《左传·昭公七年》。

《史记·殷本纪》。

《论语·泰伯》。

重要盟会。从此，众多的诸侯都听从周王的指挥，灭商已有充分的把握。

过了不到两年，灭商的条件完全成熟了。周武王兴兵讨伐。他亲率戎车三百乘，虎贲（勇猛的战士、亲军）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还有由各地来会的诸侯军和庸、蜀、羌、鬃、玁狁、濮等众多南方部落国军队，当时东北的肃慎族也进贡“楛矢石弩”（箭镞）来助战。大军从孟津渡河，沿河向东进军，于周武王十一年正月甲子日到达殷郊牧野（约在今河南汲县境）。周武王在此举行了大战前隆重的誓师，作著名的战前动员（见《尚书·牧誓》）。商纣闻讯，率十七万大军与周军对战。

周军以姜尚为前锋，冲入商军阵中，商纣的军队虽多，“皆无战心，心欲武王亟入”，希望周军赶快胜利入城。于是，临阵都调转戈头，发动阵前起义，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前徒倒戈”。商军顷刻间土崩瓦解，商纣见大势已去，登鹿台，“自燔于火而死”。周军乘胜占领商陪都朝歌（纣常居此享乐）和殷都，商王朝迅即灭亡。

牧野之战是我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最早战例。它是周商长期政治、军事优劣较量的结果。其特点是周君臣从战争准备到进行，始终把政治攻势和军事攻势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充分发挥了政治攻势的影响和作用；此战还开创了联军合力作战，具有崇高威信的盟军统帅统一指挥作战的先例和经验。这说明早在三千多年前我国的军事家驾驭战争的能力已颇高超。

## (2) 周公东征

周武王攻克殷都后，又分兵四出，暂时控制了商王朝统治的主要地区。同年四月，胜利班师，回到镐京，正式建立了周王朝，周武王成为天下的共主了。

克殷后两年，武王病死，子诵继立，是为成王。成王年幼，武王弟周公旦摄政。管叔、蔡叔等人无端怀疑周公有夺取王位的意图并散布流言蜚语。这被武庚利用，便互相勾结，又联合东方的徐、奄、薄姑等部，起兵反周，发动叛乱，局势一时变得极为严重，刚建起的周王朝面临复辟被颠覆的危险。

周公采取果断措施，兴师讨伐叛军，史称“周公东征”。

为了迅速组成东征军平叛，周公首先专门发布了平叛文告，即后来收在《尚书》中的《大诰》。周公在文告中分析当时的形势内外不稳，周王朝面临“天降大祸”。经过占卜，结果是武力平叛吉利。他决心执行上帝的旨意，继续文、武的大业，藉助他们的余威，动员大多数诸侯和臣属，迅速组织起东征大军，他亲任统帅。

东征的第一步是讨伐武庚。周对殷民并无暴虐之举，武庚叛乱不得人心，背信忘恩，周军一到，“殷大震溃”，武庚被杀死（一说逃走了）。同时，周公分兵一路直取管叔的封地，迅即占领之，杀掉了作恶多端的管叔。周军接着攻占了蔡叔封地，活捉并流放了他。霍叔就范归附。武庚和“三叔”的复辟与叛乱很快被平息下去，东征之战决定性的第一步胜利结束了。

当时周对整个东方和东南方的统治尚不稳定，以徐为首的东南“九夷”也参加了叛乱。徐等“九夷”地处淮河下游，地势低洼，河湖较多，周军车兵行动不如殷地方便，人马对水土也不服。经过旷日连续作战，徐等“九夷”

终被征服。“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徯九邑。”征服了徐等“九夷”诸小国后，周公乘胜北上挥师灭奄。

奄是东方一个较强大的诸侯国，随武庚叛乱后，成为周在东方的一个劲敌。周军占领奄西、南两面邻国后，奄已处孤立无援之势，周军以连续胜利之余威，进迫奄都（今山东曲阜一带），奄君只好被迫投降了。

奄投降后，薄姑等山东北部和东部诸国也相继投降。这样，周的统治势力扩大到了渤海黄海边上。历时三年的周公东征胜利结束了。

周公旦曾随武王征战，参与国家军政大事的决策，对国家形势了如指掌。周公东征是反击复辟势力、平定武装叛乱之战，而且当时周灭商不久，周把人民从商的残酷统治下解脱出来，因此得到人民的拥护。周公所作决策及时，措施果断正确，战略步骤恰当。平叛中，“擒贼先擒王”，在摧毁首恶势力后，采取先攻小而易之敌，后攻大而难之敌的方针；在取得连续攻战胜利后，又采取主要以军事胜利相威慑，辅以政治攻势迫敌投降的正确方针。这都是周公东征取胜的原因。周公旦不但是西周初年著名的政治家，也是杰出的军事家。

### (3) 昭王南征和穆王西征

立国于汉水之南的楚国是芈（音米）姓诸侯国，周初，楚对周表示臣服，定期向周王室进贡“包茅”等物，但周对楚“以蛮夷视之”，楚君遭冷遇，祭祀时只能被分配去看守祭神的火堆。因而，楚君怨恨，在诸侯中第一个称起王来。成、康之后，楚渐强大，与周王室的冲突不断加剧。

周昭王十六年，第一次由昭王亲自领兵伐楚。昭王以统帅自炫，排场十足，出发前就派人去南方准备行宫，给沿途小国增加了负担。虽终于取得了胜利，王师振旅凯旋而归，但却埋下了祸根。

又过不到四年，昭王第二次出征。这次出征，昭王颇为轻敌，沿途疏于防范。在渡汉水时，昭王坐上了用胶粘结的船只，船到中流解体，昭王落水淹死，周军大部丧亡。（另一说是由船只联结起来的浮桥倾覆，昭王落水溺死）。这成了后来管仲说齐桓公讨伐楚国即以“昭王南征而不复”的事实根据。周经过了这次南征的严重挫败，失去了控制“南土”的力量，楚国便在江汉地区不断发展起来。

周昭公死后，他的儿子姬满即位，是为著名的穆王，这时，居处西北方的犬戎势力强大起来，有时侵扰到宗周附近。周穆王亲自领兵西征一向被列为“荒服”和以前常来宗周朝贡的犬戎。大臣祭公谋父曾劝阻穆王，要持慎重态度，穆王不听。西征犬戎的结果，只取得四白狼、四白鹿作为战利品，也算胜利而归。根据《古本竹本纪年》载，穆王战胜犬戎后，又继续西行，经青鸟（今敦煌）一直抵达昆仑，与母系部落首领西王母在瑶池相会。这作为西征的副产物，对了解中国及西域的地理风土人情，促进各族交流和发展相互关系，是很有益处的。因而，周穆王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游历家而著称。

昭、穆二王南征和西征时，西周的国势尚强大，但是征伐之后，国力大损，从此，西周王朝由盛转衰。

---

《逸周书·作雒》。

《左传·僖公四年》。

#### (4) “宣王中兴”与周势渐衰

周穆王死后，西周王朝进入中期。共、懿、孝、夷四王相继嗣位。西周国势日趋衰落，外来戎狄侵扰日甚。懿王曾被犬戎一度赶出镐京，可见严重。夷王曾率大军讨伐抗命的南淮夷，虽暂时镇压下去，但由于周王室对南淮夷、淮夷加紧盘剥压榨，这些“夷”族不久又联合起来抗周。

夷王死，子厉王立，西周处于西北来的戎族和东南来的淮夷两面夹击之势。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说：“至于厉王，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居于彘，诸侯释位，以间王政。”厉王的暴政更招致外患入内。《后汉书·东夷传》说：“厉王无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这次淮夷大举入寇，进逼宗周，局面几至不可收拾。据《禹鼎》铭文厉王最后动用“西六师、殷八师”等两系精锐部队以及卫武公的军队全力对付，才渡过难关。但还有“戎狄寇掠，乃入大丘，杀秦仲之族”（《后汉书·西羌传》），东南和西北，淮夷戎狄相继肆虐，宗周面临危机。接着在公元前841年，镐京又发生“国人暴动”，他被赶跑在外十四年后死去。西周王朝岌岌可危。

厉王子宣王继位后，西周内外四方处于“大纵不静”的严重局面，对周边各部族和一些地方势力更难加以控制。

当时，对西周威胁最大的，是黄土高原上群狄（狄又作“翟”）部落中的獫狁。从西周中期以来，獫狁就不断南下侵扰宗周，直接威胁到镐京。他们掠取财物，杀害人民，给渭泾一带的人民群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靡室靡家，獫狁之故”，“岂不戒日，獫狁孔棘”，可见獫狁侵扰带来的破坏的严重性。

面对如此严重的局势，颇有雄才的周宣王不得不集中力量对付。他一方面派南仲驻兵朔方，加强防守力量；同时派大将尹吉甫领兵北伐，深入到太原，取得了较大的胜利。铜器铭文和《诗经》对此均有描写叙述。獫狁受到打击，向北逃去，周王室所受的威胁暂时解除了。但散在西北的其他各部，周王室仍无法有力控制，中小规模的侵扰活动时时有发生。

周宣王在战胜獫狁后，又派方叔带兵南征荆楚，也取得一些胜利。派尹吉甫用武力压服南淮夷进献贡物，暂时控制了东南地区。在宗周以西，以秦仲为大夫，命他西征西戎，结果为西戎所杀。宣王又召秦仲之子庄公等兄弟五人，给了他们七千人的兵力，再讨西戎，才勉强取得胜利。

周宣王用武力取得上述重大胜利，暂时稳定了边境，被后来的史学家誉为“宣王中兴”。但这种暂时的“稳定”很不牢固，因西周王朝的统治早已江河日下，如同回光返照。这些胜利虽暂时缓和了一些社会与民族矛盾，但也暴露了周王室统治力量的虚弱。到后来，除了战胜一次申戎外，伐太原戎、条戎和奔戎，都遭到了失败。特别是在宣王三十九年（公元前789年）伐姜氏之戎，周军大败于千亩（今山西介休县南），他调去的“南国之师”，全军覆没。周宣王下令“料（搜寻）民于太原”，力图补充兵源再战，结果没能“料”到多少民，战争无法进行下去。甚至象征周天子为天下共主的“藉田”仪式，宣王也此后多年不加举行，史称“不藉于亩”。从此，西周王朝

---

《诗·小雅·采薇》。

此处的“太原”，泛指陕北、晋北地区。

更加呈衰败景象。

#### (5) 犬戎攻进镐京，西周灭亡

周宣王死后，子宫涅继位，是为幽王。周幽王是个昏庸而又暴虐的君主，加之时乖运蹇，其在位的十一年中，西周王朝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二百五十多年的西周王朝终于灭亡在他之手。

幽王继位的第二年，关中发生大地震，灾情很严重。本已动荡不安的社会就更加人心惶惶，当时就有人惊呼“周将亡矣！”。幽王对严重的震灾不加认真有效的抚恤，对尖锐的社会矛盾不加以缓和，却火上加油，任用“善谀好利”的虢石父为卿士（相当于后世的宰相），一味地行搜刮掠夺之能事，早就“诸侯多畔（叛）王命”，这时更引起国人的极大怨愤。

幽王又宠爱褒姒，废申后和太子宜臼，改立褒姒为王后，立褒姒所生的伯服为太子。这种“废长立幼”的谬举，违背了宗法制的极重要原则，且并非废愚立贤，只因母贵子荣，这将造成王位继承上的混乱。舆论立即哗然，引起了朝政混乱，人心叛离。

幽王不仅在内外政策上失尽人心，而且行为又极荒唐，留下千古笑柄。他为了引逗宠爱的褒姒一笑，随意发烽火报警，调诸侯兵赶赴镐京，愚蠢地“导演”了一场“烽火戏诸侯”的闹剧。申后之父申侯联合犬戎兵真的兵临城下时，幽王的烽火警报便失灵了，再无诸侯兵“勤王”保驾了。镐京城内空虚。犬戎兵如狼似虎冲进镐京。幽王仓惶逃走，被犬戎兵追杀于骊山之下。周王室积蓄数百年的财宝全被犬戎官兵抢掠一空，西周王朝遂即灭亡。

幽王死后，申侯串通郑武公、卫共伯、秦襄公等保护宜臼，立为天子，是为周平王。由于都城镐京已残破不堪，又处在犬戎的控制之下，平王乃于西周灭亡的第二年即公元前 770 年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西）为都，史称“东周”。

#### (6) 西周——中国奴隶制军事制度的完备期

周朝在国家统治方式上实行分封制，周在灭商及东征平叛之后，分封了大批同姓、异姓诸侯。“以藩屡周”。这种分封在以后也一直没有中断。分封的结果就是在地方造就了众多的诸侯国，这些诸侯国与商代的方国不同，后者大多是自然成长起来的部族，而前者则是经过中央的认可。这就加强了王室对诸侯的控制。所以王国维说：西周时“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

政治结构上的这一变化，自然会影响到军事制度。随着王室、诸侯间等级关系的确立，军队的数额、规模也要相应地加以确定。《公羊传·隐公五年》解诂：“天子六师，方伯二师，诸侯一师。”方伯是一方诸侯之长，故可备二师。这种标准的划分，也在于保证王室的绝对军事优势。为此，周王室建立了庞大的直辖武装，从《小臣谏簋》、《禹鼎》、《小克鼎》等铭文知道当时王室拥有“西六师”、“殷八师”、“成国八师”等武装。此外，周王室有权调动诸侯国军队从征。因此周天子有能力做到“刑不祭，伐不祀，

---

《史记·鲁周公世家》。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十。

征不享”，形成“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局面。

西周处于中国奴隶社会的上升期，在军事上体现为军权不断向天子手中集中。在西周时代，只有周天子才有权“作师”（即组建军队）、“帅师”（即统帅军队），一般诸侯无权参与。诸侯想组建军队，必须“承天子”，听从天子准许，才能按天子规定的军队数量组建军队。天子成为全国军队的最高统帅。

但是由于西周时期疆土的扩大以及官制的进一步发展，周王亲征的事例已不像商代那样多见了。王的僚属中，师氏的军权最大。师氏又称“师”，与保傅并为“三公”，地位极高，他本是王的师佐，负有教诲，扶佐王或太子的职责。由于当时职官具有文武不分的特点，因而，师在战时，即是军队的统帅。师氏以下有司徒（金文作司土）、司马、司空（金文作司工），即铭文中的“三有司”。这三司，平时皆非军职，如司徒，其主要职责是管理土地和农业生产。但由于实行“寓兵于农”的兵役制度，兵源来自六乡的国人，因此，战时国人即由司徒率领，司徒以下的各级乡官也是如此，如《周礼》乡师之职：若有军旅，即“正治其徒役与其輶辇，戮其犯命者。”此外，如司马、司空分别负责养马与土木工程，因与战事有关，故也以武职身份从戎，像司马，后来地位还日渐提高，至春秋时，师氏的名称消失，司马取代了它的位置。

军队构成。在军队构成上，西周有平民兵、族兵，王的护卫兵和夷隶兵组成。

平民兵，即以平民（国人）为兵源的武装。前面提到的西六师，成周八师，殷八师即属此类。其中，成周八师与殷八师可能是同事异称，则当时共有十四师。

族兵是由贵族的族人组成。西周金文中经常可以见到族兵出征的记载，其战斗力很强。族兵在很大程度上要受王室的间接指挥，如《毛公鼎》铭文：王命毛公：“以乃族干吾（捍御）王身。”《明公毁》铭文：“唯王令明公，遣三族，伐东国”。

王的护卫兵在文献中称为“虎贲”，取其勇武之意。金文中提到的“王行”，当应指此。这支军队由贵族子弟即“国子”组成，受过良好的训练，远较平民兵精良，因而往往成为作战的中坚，如牧野之战，周人即以虎贲三千作为先导，但平时，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护卫周王。诸侯国中也有这类武装，但名称稍异，称为“旅贲”，负责护卫国君。

夷隶兵是一支较特殊的武装。它由被俘获的周边民族人组成，这些人的身份属于官奴。《周礼·师氏》之职：“使其属帅四夷之隶，各以其服守王之门外；且蹕；朝在野外，则守内则。”《师酉簋》铭文提到西门夷、秦夷、京夷等，表明《师氏》所载是有所本的。从《师氏》看，夷隶兵的主要任务是充当王室警察的角色。这种现象初看起来颇为奇特，但有关材料表明，由奴隶（特别是异族奴隶）充当警察，在古代世界是很普遍的现象，如古希腊、罗马就是如此。

军队编制。西周的军队编制是沿袭殷制而来，包括师、旅等级别，以十为进制单位。《周礼》所载的军事编制体系，是以五为基本进制单位，反

---

《论语·季氏》。

《国语·鲁语下》。

映的是春秋以来的情况，因而不能据以论述西周的制度。所以，有关西周军事编制的材料很少。最主要的就是《尚书·牧誓》，我们在论述殷商军事编制时已使用过这段材料。因为殷、西周的军制带有继承性，所以，这里不再详细探讨西周的情况，简而言之，西周时的军事编制由大到小为：师、旅、百夫、什、（伍？）。师、旅各为万人、千人。另外，《周礼·司马》中提到的卒、两，与什、伍相通，可能是沿袭西周的旧制，如果这样，那么百夫之下即为卒、两。

兵种。西周的兵种仍以车兵、步兵为主。这两个兵种在作战中是相互配合的。这与商代并无不同，但在具体的人员配备上，可能有所变化。如《牧誓》载牧野之战中，周军的阵容是“甲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而《史记·周本纪》载此事则谓：“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即增加了“甲士四万五千人”一句，司马迁当是有所本的，很明显，虎贲是独立作战的，不需配置战车，则这三百乘战车自当由四万五千名甲士配置，《牧誓》以战车为整体的作战单位，故而只言车数，而省略了甲士，从这一点来看，与殷制是完全相同的。而《禹鼎》铭文载：“武公乃遣禹，率公戎车百乘，厮驭二百，徒千”，据此，则每辆战车跟从十名徒兵，此外，还有两名厮驭，即后勤人员，加在一起，共十二人，与《牧誓》不合。按《禹鼎》是周厉王时之器，临近西周末年，所以，可能在枝节问题上有所更动。

前面提到虎贲，它属于独立的步兵，不必配置战车，但由于它的主要任务是护卫周王。因而，单独派虎贲出战的情况是没有的，一般是在车徒兵配合作战的情况下，由虎贲作为先导，在阵前开路，车徒兵紧随其后。

军赋制度。周人在征服战争中，将被征服的异族人迁至郊野，使其世代务农，称为“野人”；而本族人则居于“国”（即城）中，称为“国人”。这就是国野制的主要内容。周人为了独擅武装力量，不允许野人当兵。因而，兵源全部出自“国人”。

金文中的“西六师”、“殷八师”和“成周八师”，均属于平民兵，因而其兵源皆来自周族平民。“六师”之名也见于《诗经》，它与金文中的“西六师”是一回事，属于王室直辖的军队，其兵源则来自王畿内六乡的国人。

关于殷八师，有人认为是周人征服殷人后，将归降的部分殷人改编为八师。这种看法有悖于常理，难以想象，征服者会把自己的死敌武装起来。因此，殷八师即是成周八师，二者名异而实同。殷八师或成周八师，驻扎在成周，处于原殷人统治的中心地区，因此，建立此军的用意就很明白了，即主要是为了镇抚殷遗民和东方部族。那么，成周八师的兵源从何而来呢？原来，周人命殷后，武王即命周公负责在洛邑建置成周，据《逸周书·作雒》知，成周有国野（乡·遂）之制，因为成周是以东都的规模出现的，周公又曾一度居洛，分陕而治，故此处的乡遂制度与王畿的六乡六遂不会相差太远。所以，由成周的诸乡提供八师的兵源还是可以办得到的，只是每乡所出当不限于一师，否则就凑不足八师之数。

王畿六乡征兵之法，《周礼》中有记载。《周礼》成书虽晚，但尚保存许多古制，像征兵之法就是其一，《小司徒》：“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余为羨，唯田（畋）与追胥竭作。”即每家只出一人，其他人称为“羨”（意为“余”），只有举行畋猎或追捕盗贼时才全部征发。所以这是一种正卒、羨卒并行的兵役制。

关于服兵役的年限也有记载，《乡大夫》：“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

辨其可任者，国中自七尺及六十……皆征之。其舍者，国中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贾疏：“七尺谓年二十”，贾公彦是据《韩诗外传》立说，基本可信。据此，则六乡国人服兵役的年限为二十岁至六十岁之间。但有些人可以豁免兵役，如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等等。

成周和各诸侯国的征兵之法，从原则上来讲，与王畿六乡当是相同的。

国人除服兵役外，还要承担一定的军赋负担，即《孟子·滕文公》所说的“国中什一使自赋”；野人因不服兵役，所以其赋额要高，一般为九一税。并且要进献兵甲车马等武备。武器平时藏于官府，如《周礼》中有司甲、司兵、司戈盾、司弓矢等职，金文中还有司箛（箭袋）等。战时则授兵甲于七卒，如《左传·隐公十一年》：“郑伯将伐许，五月甲辰，授兵于大宫”，大宫即祖庙，则授兵的仪式是很庄重的。

军事训练。就平民兵而言，由于兵农合一，因而不可能进行专门化的军事训练，只能以类似春秋时的“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的方式来进行，同时，军训的方式也承袭军事民主制时代的特点，带有较原始的色彩，即通过畋猎的方式进行，如《左传》所说的春蒐、夏苗、秋狝、冬狩；《周礼·司马》之职：“中春教振旅，……中夏教茺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阅”。这些名目虽不相同，但总的方式却是一样的，只是训练的侧重点各有差异。

应该指出，《左传》、《周礼》等书记载的春、夏、秋、冬四季军训的名目，在西周时是不齐备的，因为，直到西周末，四季的划分法和相应的名称均未出现。由此可知，《左传》、《周礼》所反映的是春秋时的情况。还有前面提到的“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无疑亦是后起的制度。但即便如此，这只是名目、频率上的差别，就算西周每年以春、秋两次举行军训，与春秋时代的四季军训在方式上也没有什么差别，况且实际上春秋时代很少有一年四季均举行军训的范例，《左传》、《周礼》所记的只是一种整齐化的制度。

这种军事训练，尚带有炫耀武力的用意，《逸周书·世俘》记载武王伐纣，在战争过程中却举行了一次大蒐（即畋猎），获猎物甚多。此外，整顿军纪、发布文告等，也都在军训中进行。

贵族的族兵的训练方式多也采用畋猎的方式，不过，他们训练的机会要多一些，因为他们一般不受农时的约束。

周王的护卫军虎贲属于常备兵。因而也另有一套文武结合的训练方式。如《周礼·保氏》之职：“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国子”即贵族子弟，是虎贲的来源；所谓礼、乐、射、驭、书、数，是国子学习的内容。

---

《国语·周语上》。

于省吾：《岁时初考》，载《历史研究》1961年第4期。

## 七、古代希腊

### 1. 古代希腊文明的出现与特洛伊战争

#### (1) 爱琴文明的出现与希腊文明的滥殇

古代希腊的地理范围以希腊半岛为中心，包括东面的爱琴海和西面的爱奥尼亚海的群岛和岛屿，以及今土耳其西南沿岸、意大利南部及西西里岛东部沿岸地区。公元前 2000—前 1100 年，希腊世界进入了文明时代，这就是爱琴文明，或叫克里特·迈锡尼文明。

爱琴文明最先兴起的中心在克里特岛。公元前 2000 年，克里特岛上的居民开始大量使用铜器，岛上并出现了城市国家。这些城市国家是一种独特的宫廷国家，以一个规模宏大的宫殿作为政治、经济、宗教活动中心，城市成为宫殿的附属品。到公元前 1600 年左右，在克诺索斯城建立的米诺斯王朝成为当时的一个海上强国。“根据传说，米诺斯是第一个组织海军的人。”依靠最早的海军，米诺斯王朝称霸克里特岛，控制了爱琴海诸岛，而且远达希腊大陆的雅典。

但不幸在公元前 1400 年左右，克诺索斯的王宫突然遭到破坏。随后，克里特其它各地的宫殿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克里特文明从此衰落，爱琴文明的中心转移到希腊本土。

公元前 1600 年，阿卡亚人以迈锡尼为中心，在南希腊建立了一些城市国家，史称迈锡尼文明。迈锡尼文明同样表现在它也以宏伟的宫殿为活动中心，主要是在接受克里特文明影响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克里特文明的继续。

#### (2) 特洛伊战争

到公元前 12 世纪初的时候，西方世界发生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海上远征，这就是特洛伊战争。以迈锡尼为首的希腊城邦组成联军，根据传说，率舰船 1200 艘东渡爱琴海，远征小亚细亚的特洛伊城。

按照希腊神话传说，特洛伊城的王子帕里斯诱拐了斯巴达王门涅劳斯之妻海伦，门涅劳斯之兄迈锡尼王阿伽门农于是率希腊联军东渡兴师问罪。希腊联军与特洛伊人激战了九年，一直相持不下，双方死伤惨重。到了第十个年头，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想出了著名的“木马计”。希腊人制造了一匹巨大的木马，挑出几十名希腊最勇敢的战将，全副武装地进入木马腹内。又让西农化妆成逃亡的希腊人，藏在木马腹下。希腊联军则放火烧了营寨，登上战船，伪装撤退。特洛伊人见希腊联军撤退，出城来查看木马，发现了木马腹下的西农。此时西农装出恐惧的样子，哭泣着说：“救救我吧！希腊人都不愿打下去了。临行前怕雅典娜怪罪，就制造了这匹木马作为献礼，并用我的血作献祭。幸亏我挣断绳索逃跑了，直到希腊军队撤走我才出来。”特洛伊人轻信了他的话，把他和木马押进城里。

夜半，西农偷偷爬上城墙，点着火把，告知希腊联军返航。他又叫出藏在木马中的将士，共同将城门打开，希腊军里应外合，涌进城中。刹时特洛伊城变成一片火海。战后的特洛伊成为一片废墟。希腊人则俘获了大批财富

和奴隶，满载而归。

特洛伊战争的爆发，当然不可能如传说中的起因那样简单。古希腊民族是个航海贸易民族，注重功利，富有冒险性和征服性。特洛伊城位于小亚细亚东北海岸，正好处在赫勒斯滂海峡和爱琴海交接处，而这个海峡又是往北进入普多提斯海和黑海的唯一通道。它扼住了爱琴海及整个地中海通达黑海的航运，不利于希腊人往东与黑海沿岸民族进行贸易。特洛伊城周围又有海岸平原，农牧业发达，当时以富裕著称，富有金银财宝，对外贸易发达，与希腊世界产生了尖锐的对抗。正好当时赫梯王国在小亚细亚西部的势力开始衰落，以阿伽门农为首的希腊人想乘机加强在小亚细亚西部的活动和势力。战争虽然打胜了，但迈锡尼文明当时已极盛欲衰，特洛伊战争只是阿卡亚人最后的壮举，同时战争也消耗了他们的实力。不久之后，他们无法抵挡“海上诸族”的侵袭，在北希腊一带集结的多利亚人随后乘虚而入，破坏了迈锡尼，逐步征服了除雅典以外的中希腊和伯罗奔尼撒各国。

因此，特洛伊战争虽以特洛伊的毁灭为结束，对希腊人来说却未必也是胜利。爱琴海运随之没落，希腊人垄断财源的梦想也落空；得胜的希腊联军疲惫不堪，国力始终未见恢复，难以应付日后外来的挑战。希腊人终于以辉煌文明的湮灭作为代价落了个两败俱伤的结局。随后，希腊从公元前 11—前 9 世纪进入黑暗时代，又称荷马时代，希腊文明在此时期处于停滞不前的地步。

## 2. 早期希腊文明的酝酿和发展

### (1) 早期希腊的社会发展

在荷马时代，北方入侵的多利亚人及其它西北部族为希腊带来了冶铁术。冶铁术首先是赫梯人在公元前 16—前 15 世纪发明的，到公元前 10—前 9 世纪时，铁器在希腊被广泛应用。希腊人用铁制成剑、矛、刀、斧等武器开始用于军事战争，极大地加强了战斗杀伤力。而在荷马史诗之一《伊里亚特》所描述公元前 12 世纪的特洛伊战争时，希腊军队的主要武器投枪和矛，尖头都是用铜制的。可见希腊人接受并利用铁是非常迅速的。

在公元前 8—前 6 世纪，希腊经济迅速高涨，商业贸易进一步发展，农业因利用铁制工具也有腾飞般进步。这时的希腊造船业非常发达，一般军舰有一排或两排桨手，船上有甲板 and 兵房，船头带有一个铜包的冲角，作战时可以用它冲撞敌舰。三列桨舰船在这时也已开始建造了，只是数量还较少。造船业的发达，加上希腊是个临海半岛，在希腊军事上，致使海军力量相当强大。在以后的希波战争中，希腊的海军确实显示了威力。

这时的希腊主要是公民兵，战时为兵，平时为民，这与各个城邦较小，人口较少有一定的关系。即使全民皆兵，一个城邦在战时能提供上万军队就算是个大国了。

公元前 8—前 6 世纪，是希腊奴隶制城邦形成时期。这一时期在希腊各地形成 200 多个城邦，其中以两个主要的城邦——实行民主政治的雅典和实行贵族寡头政治的斯巴达为代表。

### (2) 雅典的民主发展道路与早期军事状况

雅典在公元前 8—前 6 世纪，实行了提秀斯改革，梭伦改革和克里斯提

尼改革三次主要的改革，处于民主共和国形成时期。

公元前9世纪末前8世纪初，提秀斯把原来阿提卡的4个部落联合统一，设立了以雅典城为中心的中央议事会和行政机构，并把公民划分为贵族、农民和手工业者三个等级。这标志着城邦国家的建立。

奴隶制国家建立后，平民和贵族的斗争迅猛发展。为调和平民与贵族的矛盾，公元前594年，首席执政官梭伦主持改革，颁布解负令，解除平民的债务，按财产把雅典公民划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等级为五百斗级，第二等级为骑士级，第三等级为牛轭级，第四等级为日佣级。并按等级享受担任政府官职之权和承担军事义务。第一、二级公民充当骑兵并自备战马，第三等级充当重装步兵，第四等级则任轻装步兵和战船上的水兵、桨手，战船则由第一、二等级出资建造并任舰长，日后则主要由国家出资造船。重装步兵是陆军主力，水兵则随海军的发展而日趋重要，因此第三、四等级公民构成了雅典军事力量的主体。梭伦还设立了新的政府机关四百人会议，成为平民遏制贵族的有效手段。

梭伦改革并没有彻底解决平民与贵族的矛盾，公元前560年底西特拉图作为僭主依靠平民支持执政。公元前509年起，克里斯提尼掌握政权，实行改革，把阿提卡划分为10个地区部落，100多个村社，每个村社既是一个政治组织，也具有军事职能。当时每个地区部落要提供一支步兵队和骑兵队，还要提供五艘配有船员和船长的舰船。部落长（菲拉尔赫）指挥部落的骑兵，塔克色阿赫指挥部落的步兵，将军指挥部落的全部武装力量。建立五百人会议取代四百人会议；建立十将军委员会，每个部落选一人，一年一任，轮流统率雅典陆海军队。直到此时，雅典民主共和国才最终确立。

当时的雅典实行“兵民合一”的公民兵制，并以部落为基础，类似于古代中国基于乡遂制或井田制的“兵农合一”的公民兵制。服兵役既是公民的权利又是公民的义务。早在公元前621年的德拉古立法中就已规定，“凡能自备武装的人有公民权利”。

雅典人注重航海、航运和对外贸易，工商业发达，因此它的海军比较强大，是整个国家军事力量的基础。早在公元前5世纪以前，雅典就已拥有一支规模不大的海军，但直到公元前480年特米斯托克利建造舰队后，海军才开始处于鼎盛时代。

在雅典军队中，步兵要较海军逊之，分重装步兵和轻装步兵。重装步兵的装备有长达2米的长矛、短剑和护身装备，轻装步兵的装备有标枪和弓箭。如同斯巴达等别的希腊国家一样，雅典骑兵较少，在东方诸国驰骋疆场的战车，在西方也是不存在的。这可能因为希腊境内多山、地势崎岖，没有战车的用武之地，骑兵的活动也受限制。

### (3) 早期斯巴达的贵族专政与其军事

斯巴达是在征服土著居民过程中形成的，并在征服过程中形成贵族寡头共和国。

斯巴达约在公元前8世纪中叶统一了拉哥尼亚，同时开始建立剥削黑劳士的黑劳士制度。公元前8世纪后期，斯巴达人又对西边的邻邦美塞尼亚发动战争，史称第一次美塞尼亚战争（约公元前740—前720年）。

斯巴达人对美塞尼亚的肥沃土地起了贪心，于是突然袭取美塞尼亚边境上的一个小城镇，致使战争爆发。但美塞尼亚人的步步为营战术和顽强抵御，迫使斯巴达人不仅倾全国之力，而且借了盟邦科林斯军来助战，才赢得了这场战争。

公元前7世纪后期，美塞尼亚人不甘忍受斯巴达人的奴役，发动起义，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爆发。后来在公元前5世纪还出现了第三次美塞尼亚战争。斯巴达人正是通过这种战争手段，将残酷的黑劳士制度确立下来。

黑劳士制度使斯巴达人不用从事农业生产，而进行专职军事战争。国家分给每一个斯巴人土地和奴隶（黑劳士），作为他们专仕军职的物质保障，整个斯巴达民族于是得以完全而且终身脱离社会生产而专门从事军事活动。

斯巴达军队也实行公民兵制，兵农合一，兵民不分，但他们又是实质的常备军，斯巴达公民都是终身的职业兵。

为了使每个斯巴达人都能成为合格的战士，斯巴达人的军事训练是很严酷的。据说婴儿一出生就要受长老检查，体弱残疾不合格者就要扔进山谷，只允许强健的婴儿活下去。男童从7岁便进军营集中训练，还要忍受名为考验青少年忍受力的鞭笞。从18岁至20岁，便要接受军事教育，并参加“克里普特”制度下的屠杀黑劳士的活动。20岁起正式成为军人，直到60岁才完成服役。

斯巴达人的军事训练有击剑、跑步、拳斗和操练等。他们还通过军歌来鼓舞战士视死如归的勇敢精神，例如一首军歌中写道：

“ 不要怕敌人的军队，  
不要给恐怖所支配！  
让每个人拿着战盾，  
站立在战士的前驱。  
生命是不足怜惜的，  
预言家所说的死亡，  
在我们反觉得可爱，  
有如一片灿烂旭阳……  
青年人，比肩作战吧，  
不要作可耻的逃亡。  
青年人，比肩作战吧，  
不要作懦夫的丑态…… ”

斯巴达作战主要靠步兵，尤其是重装步兵。每个斯巴达人都是重装步兵。每次作战时，斯巴达战士都要携带带有铁头的长矛和短剑进行肉搏战，带着有镶铜的圆盾、铁制的头盔、金属胸甲和草制护胫作为防御性装备。这些装备足有30公斤之重，重装步兵可谓名不虚传。由于斯巴达轻视商业贸易，航海业很不发达，没有像样的海军，骑兵也较少。

斯巴达征战方法像整个希腊世界一样，主要依靠方阵作战，但它的方阵比雅典的更具有冲击力。作战时，重装步兵的矛兵按方阵组成密集阵列，纵深为8列横队。各横列之间的距离，行进时为2米，进攻时为1米，打击退敌时为0.5米，方阵作为一个整体，像一堵带矛的墙压向敌人。此时的轻装步兵的弓箭手和投石手在方阵前方向敌人射击，打乱敌人阵脚。当方阵进行

进攻时，他们则退到方阵两翼和后方配合作战。

但是，由于方阵的阵线太长，进攻时需保持整个阵列的秩序，如果局部过于突出或落后都会造成战线的紊乱，这对作战是不利的。可是方阵在早期希腊军事战争确实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后经腓力和亚历山大改进成马其顿方阵。马其顿方阵驰名一时，成为当时所向披靡的一支劲旅。后来的罗马人又接受并发展了马其顿方阵，用于早期征服战争。

总而言之，公元前 8—前 6 世纪是希腊文明迅猛发展的时期。但到公元前 5 世纪时希腊文明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一场意想不到的外来战争是否要中断刚刚蓬勃发展起来的希腊文明？古希腊文明也可能像历史上其它无足轻重的诸多文明那样被扼杀在摇篮里，不能大发光彩吗？于是希腊人为了生存、独立和保护自己的灿烂文明，团结起来实行全民皆兵，协同作战，与东来的波斯人进行了东西方文明的第一次较量，这就是希波战争。

### 3. 希波战争及其对希腊文明的推进

希波战争是在公元前 5 世纪上半期，以雅典、斯巴达为领袖的希腊城邦和波斯帝国在东地中海地区所进行的一场东西方两大文明的较量。当然，战争的胜负并不足以说明文明的优劣，而且古代文明也不能以此优彼劣来评价。战争从公元前 500 年小亚西海岸的希腊人城邦米利都发动爱奥尼亚诸城邦反抗波斯统治的起义开始，到公元前 449 年希波双方缔结和约为标志，断断续续绵延达半个世纪之久，可谓是古典世界的一场巨大持久战。

#### (1) 波斯第一次远征希腊

波斯帝国在公元前 6 世纪后半期兴起于伊朗高原的西南部，作为古代东方奴隶社会发展到帝国阶段的后起之秀，它一开始就以征战见长，具有强烈扩张性。进行掠夺在波斯人看来是比进行创造性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勇武”被看成是“一项最大的美德”。波斯凭借一支强大的军队，东征西伐，从公元前 546 年至 525 年其王居鲁士和冈比西斯先后攻占了小亚细亚的吕底亚、新巴比伦、中亚、埃及，控制了巴勒斯坦和腓尼基，建立了领土广阔，地跨亚非两洲的大帝国。公元前 522 年，更具勃勃野心的大流士上台，他进行了有名的军事改革，把全国划分为五大军区，每个军区辖若干行省。常备兵包括步兵、骑兵和海军。军队指挥官有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军队的精锐部分由波斯人组成，称为“不死队”，始终保持一万人的员额，缺员时立即补足。在帝国境内，波斯人的主要职业就是当兵。据色诺芬说，波斯国王颁发奖赏的时候，首先约请那些在战场上显身扬名的人，因为如果没有人保家卫土，耕种多少亩地都是没有用的。除了波斯人组成的军队，大流士还广泛使用由各征服民族的成员组成的军队，其最高指挥官由波斯人担任。为了密切中央与地方的联系，保证军队的迅速调动，大流士继像亚述人那样，修筑道路、设置驿站，使帝国境内道路四通八达。

大流士改革以后，军事力量更为增强，西进之势更为紧张。公元前 514—前 513 年，他率军渡过波斯普鲁斯海峡，进入欧洲，远征西徐亚人却失败而归。但他占领了色雷斯和黑海海峡，截断希腊与黑海的交通，在此留下一部分军队，由将领美伽巴佐斯率领，屯驻在色雷斯。大流士妄想建立一个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不以仅仅逼近希腊门户而为满足，他要征服希腊半岛，

希波战争是在所难免的。

公元前 500 年，小亚细亚的米利都等希腊城邦不堪波斯的统治发动了反抗波斯统治的暴动，这却成了希波战争的导火线。当时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向斯巴达和雅典求援，没有海外利益，又没有海军力量的斯巴达以路程太远为由拒绝了，雅典派出 20 艘军舰和与米利都曾经是同盟者的埃列特里亚派出 5 艘军舰联合到达小亚细亚，但被波斯军所败，援军只好回国。公元前 497 年，波斯集中兵力围攻米利都，到公元前 495 年被攻陷。接着别的希腊城邦也再次沦为波斯殖民地。不久，大流士又以雅典和埃列特里亚援助米利都为借口决定武力进攻巴尔干希腊。

公元前 492 年，波斯派马尔冬尼斯率海陆军渡过赫勒斯滂海峡，沿色雷斯海岸海陆两路进军希腊半岛，开始第一次远征希腊。

但是波斯海军航行至亚陀斯海角时，遭遇暴风。据希罗多德描述，这次损失相当惨重，“许多船舶被吹得撞到亚陀斯山上面去了。据说，毁坏的船只总数达 300 只，失踪的人数有两万多人”。陆军也遭到色雷斯人的袭击，死伤很多，波斯只有撤军退回亚洲。

第一次远征的失败并未让大流士死心，他一面命令加紧建造新的战舰和船只，一面进行外交恫吓，要求希腊献出“土和水”。不少城邦慑于波斯淫威而屈从，但雅典把波斯使者抛入深渊，斯巴达则投之于井以让其自取水和土。于是战端又起，大流士决定发动第二次远征希腊的战争。

## (2) 波斯第二次远征希腊与马拉松战役

公元前 490 年，大流士派其甥阿尔塔弗涅斯率大军乘 600 艘舰船，由以前的雅典僭主希庇阿斯当向导，向巴尔干希腊进发。波斯军队在占领那克索斯后，进达优卑亚岛，迫使卡里斯托斯降服。进而围攻埃列特里亚，遭到顽强抵抗，但终因叛徒出卖而被攻陷。此后，波斯军乘船来到雅典东北的马拉松平原，登陆扎营。消息传到雅典，雅典立刻向斯巴达求援，并组织一万重装步兵急赴马拉松应战。前来援助的有普拉提亚的重装步兵一千人，斯巴达虽决定援助但不能及时出兵。而波斯海陆兵员总数在五万以上，其中还有希腊人最为畏惧的精锐骑兵队。雅典以一万公民之旅迎战，不啻以卵击石，但雅典也有自己的优势，除了公民以死卫国的昂扬士气外，其重装步兵无论在战备和战术上都是第一流的：战士皆着头盔铠甲，左手持盾，右手握矛，以密集队形冲刺；而波斯步兵则是轻装，只有籐盾护身，并且是在各地强征入伍，士气涣散；在地形上，希腊人布阵于山麓，波斯则扎营于山下平川地带，希腊军有居高临下之利，若主动进攻便于长驱直入，迂回包围。另外，率兵到达马拉松的雅典十将军，推举雅典名将米尔太德为战斗的总指挥。米尔太德的祖先是雅典著名的显贵家族。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他的叔父老米尔太德在庇西特拉图当僭主的时候是雅典很有势力的人物。公元前 524 年，老米尔太德曾任执政官，他因与庇西特拉图不睦，便招集一批人，到色雷斯建立了一个殖民地。米尔太德的父亲客蒙是雅典的大富翁，曾用同一队马在奥林匹亚赛会上三度赢得塞车的胜利。米尔太德本人也当过雅典的执政官，后来成了在色雷斯的殖民地赫尔松涅索斯的僭主。他娶了色雷斯的国王的女儿赫格西皮列为妻。

由于长期生活于色雷斯地区，米尔太德对波斯军队的虚实与战术特点有所了解，合乎知己知彼的要求。波斯方面则只带着被逐出雅典数十年且不熟悉军事的希庇阿斯。应战之前，米尔太德对士兵和司令部同僚作了热烈的演讲，他说，雅典将披上奴隶的枷锁，还是永远保存其自由，关键就在他们自己的身上。米尔太德特别选定了波斯骑兵夜间放马于北面沼泽，受阻而不能返回的最好时机，在清晨向波斯军队发动猛攻。他根据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和波斯军队惯于中央突破的特点，排出传统希腊方阵，把重装步兵重点布置在两翼，中央兵力较弱，只有数列厚度。战斗一开始，雅典军队的中央部分突入敌军阵地后又且战且走，让波斯主力尾追，然而雅典军的两翼很快就突破对方的阵线，迅速插向敌军纵深，形成包围封合之势，把首尾失援并被分割包围的波斯军打得狼狈逃窜，伤亡惨重。这时，迟到的波斯骑兵虽冲入战场也由于阵营已乱而无所作为。因此，经过几小时的激战，雅典军获全胜，俘获战舰七艘，打死波斯士兵 6400 人。溃败的波斯军窜上舰船，离岸南逃，波斯第二次对巴尔干希腊的入侵终于以失败告终。雅典人在战地为阵亡的 192 名勇士建陵合葬，世代垂念，陵墓至今仍屹立于马拉松平原之上。

雅典人在马拉松战役中，为保卫国家的独立和自由，英勇奋战，以弱小的兵力战胜强大的入侵者，成为世界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这一空前巨大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整个希腊民族抗击侵略者的斗志，而雅典孤军应战独抗强敌，大大提高了它在希腊各邦的威信。以雅典为榜样，许多动摇观望的城邦开始转而积极主战，为日后希腊联军的组成打下了基础。希腊人也正是从此战役开始了拯救自己文明的斗争，这次战役为日后希腊人战胜波斯人打下了基础。

### (3) 波斯第三次远征希腊的战前备战

大流士得知第二次远征希腊又失败了，感到非常恼火，但他还是不甘心失败，积极筹划准备第三次远征。希罗多德说：“他于是立刻派遣使者到一切城市，命令他们装备一支军队，要他们每一个城市提供远比以前为多的船只、马匹、粮饷和运输船。由于这些通告，亚细亚忙乱了整整三年（即从公元前 489 年至前 487 年），精壮的人们都给征入了讨伐希腊的军队并且为这件事作了准备。”但正在准备过程中，公元前 488 年大流士死去，其子薛西斯即位后，继承父志，积极继续作远征准备。

据说薛西斯建立了包容骑兵、陆军、海军的强大远征军。希罗多德甚至说：“除去那些巨川大河之外，哪一条河的水不是给他的大军喝得不够用呢？”为远征后大军有足够粮秣，薛西斯在他即将远征的途中，包括整个色雷斯沿岸，设置了许多贮备粮秣的兵站基地。他还为远征顺利通过赫勒斯滂海峡，建造了横渡赫勒斯滂海峡的索桥，用绳索连锁橈船，又为稳住连锁船只而在海中坠下了许多巨大的锚，桥面上铺实树枝，桥两侧设有栅栏，既稳固又便于人马通行。

薛西斯征集建立了多民族组成的，服装和兵器各异的古代世界规模最大的杂牌军，只参加远征的士兵足有 20 多万。他还组建了强大的骑兵和战车兵，由沿海民族组成一支相当庞大的舰队。海军的主要部分是三列桨舰船，

---

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第 629 页。

同上书，第 643 页。

据希罗多德报道共 1207 艘。薛西斯就是率领这支庞大的军队远征希腊，刮起另一场战争飓风。

#### (4) 希腊人的战备工作

正当波斯帝国积极备战，暴风雨即将来临前夕，雅典却围绕怎样对抗波斯，展开了激烈斗争。以阿里斯帖德为代表力主陆上卫国，要建立强大陆军；以特米斯托克利为代表力主海上卫国，要发展海军。最终特米斯托克利胜利，提出了加强雅典海上势力和建造新舰队的海军纲领。

特米斯托克利建立雅典海军。特米斯托克利是公元前 5 世纪上半叶雅典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是当时雅典政坛上的风云人物。他的父亲涅奥克利斯虽然富有，但不属于最显赫的望族。公元前 493 年，特米斯托克利当选为执政官时，就考虑到加强海军对于雅典的重要性，开始增建比雷埃夫斯港的防御设施。特米斯托克利的巨大历史功勋在于，他能正确地认识马拉松战后雅典的国内外形势，在复杂的斗争中，善于利用各种有利因素，推动有利于发展民主政治、增强国力的政策，使雅典变成拥有强大海军的海上强国。他巧妙地利用雅典人与拥有强大海军的近邻埃基那的敌对关系，说服了公民的大多数，在公元前 480 年，把劳里温新发现的丰富银矿的收入用于建造军舰。这样，到波斯再次入侵前，雅典已经拥有当时希腊诸城邦中数量最多的新式军舰，总数达 200 艘左右。

在特米斯托克利倡议和主持下建造的雅典军舰共分两类，一类是战舰，也即“长舰”；另一类是供应兵和军用物资的运输船。此时建造的军舰主要为三列桨舰船，每舰有 170 名划桨手，分上、中、下三层配备划桨手。舰船头角包以黄铜，用以冲撞敌舰。在舰上还设有小桥，在与敌舰接舷后可将小桥搭在敌船上，舰上的重装步兵便可以冲入敌船，与之展开白刃战。后来的罗马海军也采用了这种接舷战术。

希腊军事防御同盟初步形成。希腊世界城邦既小又多，单以一两个城邦是无法与波斯帝国时对抗的，于是各城邦使者穿梭往返于各城邦之间，为建立一个反波斯同盟、团结御侮，保卫自己家园而奔走，参加反波斯同盟的城邦共有 31 个，特别是雅典和斯巴达两个强国联合起来，对以后的战争胜负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雅典自特米斯托克利主持建立强大舰队以后，一跃成为爱琴海上第一流的海上强国。特米斯托克利把雅典从陆上防卫波斯转为海上防卫是很有远见的。如果说未来的第三次希波战争中希腊的胜利是某种意义上海军的胜利，那么雅典组建强大海军的改革使雅典海军赢得了战争，而且为战后在希腊世界称霸奠定了基础。但是雅典海军强大了，陆军的作用则相对降低了，于是在未来战争中就需要有别的陆军强邦的协同作战，斯巴达勇敢的陆军正好补其不足。

反波斯军事防御同盟以斯巴达为马首是瞻，斯巴达人占据了陆军统帅职位，还占据了海军统帅职位。这与特米斯托克利的团结御侮为重，说服雅典人，奉斯巴达人为最高统帅有关。但雅典在战争中的作用并没有因此而逊于斯巴达，这也可以从战后雅典称霸希腊世界看出来。

### (5) 温泉关战役与第三次希波战争爆发

公元前 480 年春，薛西斯亲率海陆军从阿比多斯出发，进入欧洲，沿着色雷斯海岸水陆并进。据希罗多德记载，陆军总数 170 万，战舰 1200 艘，这些数字显然是夸大了。但据近代研究者估计，海陆军战斗人员的总数仍可达 50 万左右。希腊联军在数量上处于明显的劣势：陆军 11 万，海军 400 艘战舰，而且由于城邦众多，能集结在指定地点抗击波斯主力的联军人数往往只有一两万人，甚至更少。因此，战争态势对希腊人来说是非常严峻的。

两军对抗的第一回合是著名的温泉关之战。温泉关号称天险，扼于南下中希腊的主要道口，傍山靠海，关口窄道仅容羊骑通过。守卫温泉关的联军仅 7200 人，其核心是 300 斯巴达战士，统帅则是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斯。

列奥尼达斯是阿那克山德里德斯的第三个儿子，于公元前 488 年继哥哥之位为王。公元前 480 年，当波斯国王薛西斯亲帅海、陆两路大军气势汹汹地进犯希腊的时候，他担任希腊盟邦陆军总指挥，亲自负责扼守战略要冲温泉关。来到关上后，他首先指挥修复了年久失修的壁垒，接着对兵力作了部署。希腊守军凭借有利的地形，击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薛西斯出动了称之为“不死队”的精锐部队，也溃败下来。当正面攻击迟迟不能得手的时候，当地的一个希腊人叛国投敌，在夜间带领波斯军队，从一条小路迂回到温泉关背后。面对陷于重围的危险局势，列奥尼达斯命令大部分部队安全撤走，以便保存有生力量。他率领 300 名斯巴达人，400 名忒拜人和 700 名特斯皮亚人坚守在山上，次日上午，波斯人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希腊人殊死抵抗，长矛断了用剑砍，短剑钝了用拳头和牙齿与敌人格斗。希罗多德生动地描述了斯巴达人的战斗场面：“他们大多数人的枪已经折断了，于是他们使用刀来杀波斯人。在这次的苦战当中，英勇奋战的列奥尼达斯倒下去了。和他一同倒下的还有其他知名的斯巴达人”。斯巴达人终因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波斯人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后人在这个战斗地点，为斯巴达战士立了一个纪念碑，并于上铭刻诗文：“过路的人，请告诉拉西第梦人（即斯巴达人），我们遵守他们的指令，躺在这儿了”。鲁迅先生于 1703 年在《浙江潮》上曾发表《斯巴达之魂》一文，介绍有关温泉关战役的故事，称赞说：“巍巍乎温泉门之峡，地球不灭，则终存此斯巴达武士之魂”。

列奥尼达斯和他率领的士兵，临危不惧，忠于职守，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以英勇牺牲的榜样鼓舞了希腊全军的士气，其精神力量之伟大远胜于具体战斗之得失，在希波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从战略布置上看，这场守卫战也是成功的。它保存了联军的主力，使希腊舰队能够顺利驶往萨拉米岛附近，为后方备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为后来萨拉米战役的胜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 (6) 萨拉米海战

温泉关失陷之后，希腊海军迅速撤退集结到萨拉米海湾，把中希腊拱手相让给波斯人。波斯人不久用火箭攻城，攻陷了雅典。雅典的再陷，引起了萨拉米海军的惊慌，在雅典海军统帅特米斯托克利的坚决要求下，希腊人决定在萨拉米海峡与波斯人展开激战。

萨拉米海峡水域狭窄，具有深遂谋略的特米斯托克利企图诱使庞大的波斯舰队进入此处，以便为快速灵活的希腊战船提供良好的歼敌机会。于是他

设法说服了担任联军舰队司令的斯巴达人埃弗里比阿德斯采纳了他的作战计划，之后又派了一名心腹奴仆逃到波斯方面，诡称希腊舰队准备逃出海湾，建议波斯迅速出船拦截。薛西斯信以为真，于夜间调动舰队封锁了海峡出口。已被敌方包围的希腊舰队意识到只有拼死决战才是唯一出路。

公元前 480 年 9 月 23 日天刚破晓，总数约 380 艘的希腊舰队出现于萨拉米岛与雅典海岸之间的狭窄水域，波斯舰队随即全面出击。波斯舰船大而且数量占绝对优势，但在狭窄的海湾里无法施展；相反，希腊的小型舰船运转灵活而且熟悉航路，主动进击性非常大。于是，波斯舰船进入狭湾后便只能以纵列行进且互相挤碰起来。看见时机已到，以雅典为主力的希腊舰队猛冲过来，纷纷从侧面撞击波斯船只。波斯舰队顿时一片混乱，几乎丧失了作战能力，有的触了礁，有的搁了浅，更多的是被灵活机动并装有撞角的希腊战舰击沉。战斗持续到晚上，拥有千余艘舰船的波斯舰队已溃不成军，战舰被击沉 300 余艘。波斯海军几乎全军覆没，而希腊仅损失 40 艘舰只。

此役的失败使薛西斯再也无心恋战，他害怕退回亚洲的道路被希腊海军截断，遂匆忙“御驾回朝”，只留下马尔冬尼斯率陆军余部在希腊继续作战。薛西斯的撤退表明战局已发生根本变化，现在是希腊人取得攻势，而留下的波斯陆军则难脱身死于异域的命运。萨拉米海战从根本上扭转了希波战争的战争形势，奠定了以后希腊人胜利的基础。

#### (7) 普拉提亚战役和希腊的最终胜利

在整个希波战争中，如果说萨拉米海战是希腊反击波斯的一次海上大规模的，决定性的胜利，那么普拉提亚战役应该说是希腊反击波斯的一次陆上大规模的，决定性的胜利。

公元前 479 年，驻守北希腊的马尔冬尼斯又进兵阿提卡半岛，再次占领雅典，但此时的波斯军队已是强弩之末，接着波斯军队又与希腊军队在普拉提亚展开了一次大决战。

这次希腊联军的声势相当强大，据希罗多德统计，希腊联军重装步兵共有 38700 人，轻装步兵共有 69500 人。其中斯巴达的黑劳士奴隶在这次战斗中也被武装起来，作为轻装步兵，每一个斯巴达人配备 7 个黑劳士。希腊联军以斯巴达和雅典军队为主力，总共达 11 万人，在斯巴达国王乌撒尼亚斯为最高统帅的率领下，列阵在阿索波司河南岸，准备与波斯人决一雌雄。

波斯军队的数量，据希罗多德记载总共有 30 万人，其中不少是希腊人，最精锐部队由波斯人组成，包括“不死队”，部署在阿索波司河北岸，与希腊联军隔河对峙。

双方对阵多日，战争一天天拖延，波斯统帅马尔冬尼斯日感军队给养供给困难，面对希腊人在本土作战，援兵越来越多，他决定先派骑兵进攻希腊人，迅速结束战争。

波斯骑兵骚扰了希腊军队，并切断了希腊人的水源，于是一部分希腊人撤走了，但作为主力部队的斯巴达和雅典军队还按兵不动。波斯军队误认为希腊人逃跑了，于是既不整顿队形，也不按照原来的部署，像追击逃兵似地涌上来，主要对准拉西第梦人，与斯巴达人展开了激战。

战斗开始后，希罗多德描述说，波斯人用他们的藤盾连成一道壁垒，从这后面射出了“像雨点一样多的箭”，给希腊人以很大打击。但波斯人主要靠骑兵和弓箭手作战，一旦当战斗进入近战，特别是肉搏战时，波斯人的缺

陷就暴露出来了。他们没有希腊人那样专门的训练，战斗技术较差。尤其应该注意的是，波斯军队中异邦军数量众多，他们完全视波斯人为贻，旗倒兵散，正如希罗多德所言：“异邦军的全部命运是以波斯人为转移的，因为其他的人看见波斯人逃跑了，故而在他们甚至还没有和敌人交锋，便立刻也逃跑了。……胜利者就这样跟在薛西斯的士兵后面进行了追击和杀戮。”

不久，希腊人发动猛攻，与波斯人展开肉搏战，希罗多德描写：“直到最后，这场战斗竟形成了肉搏战；原来异邦军抓住了对方的长枪，并把它们折断了。波斯人论勇气和力量都是不差的，但是他们没有防护的武装，此外他们的训练不够，论战斗的技术到底也比不上他们的对手。”结果，波斯军队伤亡惨重，30万大军除了一支4万人的军队逃跑了以外，只有3000人幸免于难，其统帅马尔冬尼斯也阵亡了。而希腊方面，斯巴达人阵亡91人，铁该亚人16人，雅典人52人。

普拉提亚战役是希波战争的最后一次大决战。经过这次决战胜利，希腊人开始全面反攻，希腊大陆很快全部解放。与此同时，希腊海军又在小亚细亚的米卡尔海角击败波斯舰队。公元前478年，雅典进攻黑海海峡，占领赫勒斯滂左旁要塞。从此，战争完全在海上或海外进行。

随着战争从陆战转入海战，希腊联军内部出现分裂，以农立国的斯巴达对海上作战不感兴趣，而且海军不如陆军发达，撤回到伯罗奔尼撒半岛。公元前478年，拥有海上强大力量并且声威日盛的雅典和希腊本土、爱琴海各岛及小亚希腊各城邦组成了新的对抗波斯的军事同盟，史称雅典海上同盟，或叫提洛同盟。从此以后，希波战争就是主要在以雅典为主的提洛同盟和波斯人之间进行的。

公元前468年，提洛同盟大败波斯海军于小亚的攸里梅敦河。公元前449年，又大败波斯海军于塞浦路斯岛附近。最终波斯只好和希腊人签订和约，规定波斯承认小亚希腊各邦独立，放弃对爱琴海和黑海一带的统治。至此，希波战争以希腊获得彻底性胜利告终。

#### (8) 希波战争对希腊文明发展的推进

一场庞大的外来战争对一个民族来说有时可能是一场灾难，因为它可能导致其文明的毁落。有时对其来说又可能是其文明发展的外来推动力和发展推进剂。其民族在外来压力下，为追求生存和独立就要对内励精图治，缓和内部矛盾，克服众多小国寡民的一盘“散沙状态”，联合成一体，共同团结御侮，推进自己文明的发展，赢得了战争，也就使自己的文明获得了重生。

古代希腊文明就是面临如同境地，在面对东来强大的波斯帝国的冲击下，自己在公元前5世纪初才刚刚发展起自己完整的文明，是逆来顺受接受东方文明的统治，把自己的文明扼杀在其“摇篮期”里，还是奋起御侮，保卫自己的文明？马拉松、萨拉米、普拉提亚三大会战如果在希波战争中完全失败，那么古希腊文明很可能像历史上其它无足轻重的诸多文明那样被扼杀在摇篮里，不能大放光彩。若波斯西进成功，则地中海将成为单一的古代文明区，不可能在此后的世界文明发展格局中形成东西方分庭抗礼之势。原来地处西亚北非地中海东岸、南岸发展的古代东方文明，虽有巴比伦和埃及两大中心的并立，但比较类似，都是“神授的王”统治的专制主义国家，而且

在波斯把巴比伦和埃及统一合并进其帝国后已渐趋合一。正是希波战争中这三次大会战的胜利为古代希腊文明的生长发育和成熟在时间和空间上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希腊的胜利使波斯西征受挫，先在地中海东部形成希波对峙局面。虽然在以后的岁月里，希腊民族被征服了，但已结出累累硕果的希腊文明却反过来征服了征服者本身。以后希腊文明在希腊化时代广泛传播于地中海，很快及于罗马再扩及欧洲，形成西方文明；波斯则经安息、萨珊和伊斯兰文明等以后，继而形成东方文明，而这个世界性格局形成的分水岭就是希波战争。

希波战争对希腊来说的确是一次生死存亡的考验，战争的胜利不仅保住了希腊城邦，也极大推动了希腊文明的发展。由于波斯的势力退出了爱琴海和黑海，希腊城邦的海外交通和贸易便无所阻碍，这就为希腊工商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战争对雅典意义尤其重大。战争期间，第四等级广泛参军作战，加强了第四等级公民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城邦制度得到迅猛发展。战后，雅典通过提洛同盟确立了海上霸权，提洛同盟各成员实质演变成雅典帝国的下属。经济的繁荣，城邦制度的发展，为雅典奴隶制城邦的“黄金时代”——“伯里克利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希腊古典文明的繁荣又为日后欧洲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此意义上说，希波战争不仅没有毁灭希腊文明，反而推进了希腊文明的发展。

#### 4. 雅典称霸与希腊大规模内战的酝酿

##### (1) 提洛同盟与雅典建立霸权

在希波战争中，雅典为了联合希腊各国在海上共同反击波斯帝国，于公元前478年，组成以雅典为首的海上同盟。因同盟集会会址和金库在成立时设于爱琴海中的提洛岛而得名。入盟城邦最初只有35个，后来随着战争胜利，成员增到近250个。以盟主雅典为一方，所有其它盟邦为一方，双方立盟，军事外交一致行动，实际上是听从雅典指挥，结盟时双方共把一块巨铁投入海中，声言只要铁不浮出海面，便要永远忠于盟约。以铁表志，宣誓入盟后不得随意退出。

同盟成立之初，入盟各邦仍是独立的，雅典亦无任何特权擅自行动和实施未经同盟会议批准的法规或侵犯各邦利益。但提洛同盟的建立，对雅典来说，如虎添翼，成为希腊世界第一等强国。

在希波战争中，同盟在雅典领导下主要对付波斯，奋勇作战。但战争结束后，同盟逐渐变为雅典统治同盟成员，自己称霸希腊的工具。从此，同盟会议不再召开，雅典命令代替一切，金库迁入雅典城，加强对盟邦的勒索和控制，提洛同盟变成了雅典帝国。

雅典帝国的出现，使雅典古典文明臻于极盛。公元前461年，伯里克利任首席执政官，标志着希腊古典文明繁荣时代的到来。

伯里克利出身于雅典名门，年轻时代是在提洛同盟抗击波斯人的战争中度过的。他任首席执政官后，对内实行改革，权达下层公民，使古典希腊文明臻于极盛。对外以扩大雅典势力和利益为原则，加强控制提洛同盟盟邦，变提洛同盟为“雅典海上帝国”，把同盟金库从提洛岛迁至雅典，同盟会议不再召开，雅典积极准备扩张。虽然雅典与斯巴达作为不同的政治制度国家一直有宿怨，但是基于斯巴达组建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势力比较强大，时机不

够成熟，伯里克利与斯巴达在公元前 445 年缔结了 30 年和约，可是他又对别的城邦和地区进行了扩张。

## (2) 未来内战的酝酿与根源

希腊民主政治的发展是在与贵族派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民主政治以雅典为首，贵族政治则以斯巴达为基地。在希腊各个城邦里，几乎都有两派斗争。民族派与贵族派力量互有消长，于是在斗争中，各城邦各派常常要求雅典或斯巴达出面干涉或派兵支援。这种形势在希波战争后日益恶化，酝酿着一场大规模内战。

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在经济和政治上也矛盾重重。雅典与伯罗奔尼撒同盟中的工商业城邦，尤其与工商业发达的科林斯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为发展工商业，雅典与科林斯展开全面竞争。雅典与斯巴达为称霸希腊，分别各自扶植自己的势力，巩固并推行自己的政治制度。基于两者的深刻矛盾，内战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

公元前 431 年春，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成员底比斯袭击了雅典的盟邦普拉提亚，雅典给予普拉提亚以援助。以此为起点，至 6 月中旬，斯巴达王阿基达马斯率军入侵阿提卡，战争全面爆发。

## 5. 伯罗奔尼撒战争与希腊文明开始衰落

伯罗奔尼撒战争从公元前 431 年开始直到前 404 年结束，历时 27 年，战火几乎遍及整个希腊世界。根据史学传统，这次战争可分成三个阶段：一、自公元前 431 年至前 421 年，史称“十年战争”，或以斯巴达国王之名称为“阿基达马斯战争”；二、自公元前 415 年至前 413 年的西西里战争；三、自公元前 413 年至前 404 年雅典投降，战争结束，史称“德凯列伊亚战争”。

### (1) 十年战争

雅典的战略与瘟疫骚扰雅典。当伯罗奔尼撒人在科林斯地峡集结军队，正将出发向阿提卡进攻的时候，雅典的首席执政官伯里克利在人民大会上发表演说，让雅典郊区的农民放弃家园，把家眷和财产迁入城内，固守城垣，运用海军同敌人战斗，以自己海军之长对付伯罗奔尼撒同盟海军之弱。

伯里克利早在战前就预料到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为了及早防备斯巴达人从陆上入侵，曾在雅典城与外港比雷埃夫斯之间，修建一道长垣，这样就使陆海两方面的防务都有所巩固。战争爆发后，他采取一件稳妥战略：陆上主守，乡民迁入城中，必要时放弃农村，坚壁清野，据城坚守；同时充分发展海军优势，发兵袭击伯罗奔尼撒沿岸城市，逼迫敌方疲惫求和。伯里克利提出的战略基于他的依靠雅典的财富和资源打持久战的军事思想。正如他之所言：“因为同盟者所缴纳的金钱就是雅典的力量，战争的胜利全靠聪明的裁断和经济的资源。”第一年的战事，雅典就是在伯里克利的领导下以此战略行事的。

伯罗奔尼撒同盟军侵入阿提卡后，大量农民涌进雅典，雅典变成了巨大的难民营。伯里克利绝没想到这一战略在下一步却使他陷入极端被动的处

境。

公元前 430 年夏，一场意想不到的灾祸突然降临到雅典头上。一场可怕的瘟疫从非洲的埃塞俄比亚传至埃及和利比亚，再从海上传至皮里优斯港，然后蔓延至雅典城。战祸引起大量农民涌入雅典城内，促使雅典瘟疫更加恶化。许多人相继死亡，据估计，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死于这场瘟疫。加上前方军事失利，雅典公民开始对伯里克利不满，不久，公元前 429 年，他也罹难于此疫。

普拉提亚围城战。伯里克利死后，雅典发生了主战还是主和的两派斗争。以克里昂为首的主战派主张继续推行对外扩张的战争政策，加强对盟邦的控制，以武力逼使敌方就范。公元前 427 年，克里昂出席首席将军，基本继承伯里克利的弃陆从洋战略，与伯罗奔尼撒人继续作战。

公元前 429 年，斯巴达国王阿基达马斯率伯罗奔尼撒同盟军，向中希腊的雅典盟邦普拉提亚进军。普拉提亚人固守城池，在卫城上建筑一排大木栅，内砌以砖，加固加高城墙。伯罗奔尼撒人却在靠近城墙的地方造一土山，与城相接，利用他们的攻城机械——破城锤（撞墙车）来进攻城池。普拉提亚人利用套索和吊梁破坏敌人的破城锤。其中吊梁与中国古代的滚木起同样作用，但吊梁是用两根铁索悬挂在两根平行地放在城墙上的木杆上。当发现破城锤撞击城墙时，他们把吊梁移动到破城锤的正上方，然后放松铁索，让吊梁突然落下，这样便可把破城锤的头部砸坏。不久伯罗奔尼撒人利用破城锤攻城就在吊梁的打击下失败了。

接下来，伯罗奔尼撒人利用火攻想烧毁普拉提亚，但一场大雨挽救了普拉提亚。

围城日久，城内粮食日缺，普拉提亚人只好在公元前 427 年向伯罗奔尼撒人投降。普拉提亚城遭到了屠杀，一年后被彻底毁灭。

派罗斯、安菲波里斯战役及尼西亚和约。公元前 427 年，克里昂开始出任首席将军后，亲自带兵出征。公元前 425 年 5 月，雅典派兵占领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南部的战略重地派罗斯港。同年 7 月，克里昂又亲自率军占领与派罗斯港相对的斯法克特里亚岛。雅典鼓动那儿的斯巴达黑劳士发动暴动，让斯巴达深以为患，于是斯巴达主动求和，但遭雅典拒绝。

正在斯巴达危难之际，斯巴达人接受了其将领拉西伯达的建议，进攻爱琴海北岸的雅典城市。这样一方面可以把雅典军队引出伯罗奔尼撒半岛，以免除其严重的威胁；另一方面可以鼓动那里的雅典同盟国背叛雅典，以破坏对方的物力和人力支援。公元前 424 年，拉西伯达率军占领安菲波里斯，接着又攻陷许多地方，引起雅典在希腊东北地区各同盟国的背叛。

公元前 422 年克里昂亲率雅典军队与斯巴达人又在安菲波里斯展开激战。由于盟邦叛离，雅典军事失利，主和派在雅典抬头并逐渐占了优势。公元前 421 年，雅典主动与斯巴达提出议和，双方缔结了为期 50 年的和约，史称尼西亚和约（以雅典将军主和派首领尼西亚得名）。至此，“十年战争”结束，伯罗奔尼撒战争暂告一段落。

## (2) 西西里战争

雅典远征西西里。尼西亚和约，并未解决双方战争的根源。事实上有些斯巴达的同盟者自始就反对和约。主要只是由于斯巴达和雅典都有点对十年的持久战倍感疲乏，它们需要缔约取得暂时和平，赢得时间来重作休整，

为未来战争进行新的准备。因此，战争再起，势所必然。

公元前 420 年，年轻的雅典激进民主派亚西比德被选为将军。他一登上政治舞台，就竭力鼓吹对斯巴达重开战端，提出了一个远征西西里、称霸全希腊的狂妄战略计划。他的海上战略思想，与伯里克利、克里昂等前辈一脉相承，只是更富于野心，更脱离实际。但他得到大多数下层城市公民的支持，其主张逐步在雅典政治中占了上风。

公元前 416 年，西西里岛的雅典盟邦塞格斯塔与斯巴达在西西里的同盟者叙拉古的盟邦塞林努斯发生纷争，塞格斯塔向雅典求助。于是亚西比德在雅典主张借此远征塞林努斯和叙拉古，切断叙拉古这条斯巴达和科林斯的左臂。雅典于是同意远征西西里。

远征前夕，尼西亚在一次人民大会上发言说：“你们往西西里去了，留下许多敌人在后方，很明显的，你们在那里也会有敌人的，而且也要应付那些敌人。可能你们认为你们所签订的条约会给你们以保证；……如果我们的大军在任何地方遭到失败的话，这个和约不一定能阻止敌人马上向我们进攻。”尼西亚的这段发言，恰好说明亚西比德战略错误的要害：不是远攻近攻，而是远攻近和，把敌人留在后方；一旦和约破坏，则两面受敌。以后的事实正是这样发展的。但雅典人并没有把尼西亚的警告放在心上。

正当雅典远征军出发前夕，雅典城内的许多当作路标的赫尔墨斯神像被捣毁了，谣言散布这事与亚西比德有关。但好战心切的雅典人希望从速出征，公元前 415 年 5 月，远征军由战舰 136 艘，重装步兵 5100 人，轻装步兵 1200 人，桨手 26000 名组成，在亚西比德、尼西亚和拉马卡斯率领下，向西西里的叙拉古进发。

叙拉古战争。雅典大军刚踏上异邦土地，雅典公民大会却下令亚西比德回国受审。他交出指挥权，却在回国途中逃往斯巴达。他向斯巴达建议：速派军增援西西里，以解叙拉古之围；从陆上发兵，长期进驻雅典近郊德凯列伊亚，瓦解提洛同盟。斯巴达采纳了他的建议，这给雅典带来致命的打击。

公元前 414 年，雅典人把叙拉古团团围住。战事之初，雅典军队甚为得手，叙拉古处境不利。但斯巴达人很快率军及时到达西西里，占据埃皮波拉伊高地，使雅典人的壁垒包围不能奏效。

公元前 413 年，德摩斯特涅斯主张雅典人应该撤兵回国，而尼西亚优柔寡断，迟疑不决，贻误军机，接下来就是雅典人在大港海战中的惨败。

叙拉古的东、南、北三面环海，只有西面同陆地相连。叙拉古人为对付雅典海军，加强水域大港的防御。叙拉古人在他们旧的船坞前面的海底中钉下了大量木桩，使他们的船停泊在障碍物里面，以免雅典人把舰船划进去撞击它们。这些木桩或露或没于海面，如同暗礁，对舰船航行威胁很大，致使雅典虽有强大的海军，却在战争中没有充分发挥出作用。

叙拉古人还为了其舰船适于狭小的大港内作战，对它们的构造作了很大改进；减少船头长度，在吊锚架的两旁增加一些材料，使船头更加坚固。改进后的舰船可以利用船头撞击战术，在狭小大港内横冲直撞。而雅典舰船的船头构造较轻，并非为迎头撞敌舰而设计，主要用来冲破敌人阵线，环绕敌舰，向敌舰的侧面或船尾冲撞。这种环航战术适于在宽阔海面作战，船多而水面狭窄则不利于环航，难以施展其威力。因此，叙拉古人正是以己之长击

敌之短，巧妙打击敌人，雅典海军在大港海战中处于相当不利地位。

大港海战开始时，雅典首先进攻，叙拉古起而应战，不多时不大的大港海面布满了船只，展开了古代世界罕见的大海战。据修昔底德记载：“这是一次剧烈的战斗——比以前任何一次战役都要激烈些。双方面的桨手们，当受命把船划往交战地方时，从不退缩，舵手们表现出很高的技术，彼此互相竞争。……许多船舰挤在一个小面积上互相进攻（真的，过去从来没有这么多的船舰在这么狭窄的水面上战斗过。双方面的船舰总共差不多有二百条）。因此，用船嘴冲击船身的进攻方式比较少（指雅典的作战方式——作者），因为没有倒划退却，也没有冲破敌人阵线向周围转动的机会；在进攻别的船舰或逃避别的船舰的冲攻中，船碰碎船的时候比较多得多。”最后叙拉古和它的同盟者大获全胜，雅典海军死伤过半，余者争相登陆逃走。

雅典远征军全部覆灭。公元前 413 年秋，大港海战后，雅典人只有从陆路撤退，海路已被叙拉古及斯巴达人封锁。撤退的军队约有 4 万人，士气沮丧，行动迟缓，饥渴交加，军心混乱，斗志涣散。沿途不断遭到敌方的围追堵截，雅典人只得投降。后来，他们不是被处死就是送往采石场作苦工，惨死于疾病和苦役中。雅典的西西里远征军全部覆灭异乡。正如修昔底德所言：“这是这次战争中希腊人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照我看来，是希腊历史中我们所知道的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对于胜利者说来，是最光辉的一次胜利；对于失败者说来，是最悲惨的一次失败，因为他们是全军覆灭；他们的痛苦是很大的，他们的毁灭，诚如俗语所说的，是整个的毁灭，海军、陆军——一切都毁灭了。许多人中间很少有回到故乡的。西西里的事件就这样终结了。”因此，西西里之战是整个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转折点，从此之后，雅典的形势江河日下，难脱战争最终失败的命运。

### (3) 德凯列伊亚战争

德凯列伊亚战争。公元前 413 年春，斯巴达采纳亚西比德的建议，侵入阿提卡半岛，以德凯列伊亚（距雅典约 20 公里）为据点，派军队四出蹂躏阿提卡，掠夺物资，包围雅典使其变为孤城，并实行长期占领，给雅典带来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损失。修昔底德说：“这是雅典势力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

此时的雅典陷入困境，它必须在两个战场上同时进行两场战役：一个是西西里战场进行的叙拉古战役；一个是阿提卡战场的德凯列伊亚战争。雅典被困，丧失了全部农村，盟邦也纷纷叛离，军费入不敷出，发生严重的财政危机，雅典失败的时日已不长久了。

雅典投降。雅典西西里战场的全军覆灭和阿提卡战场的形势日蹙，使雅典陷入困境。外则同盟叛离，内则政局动荡。公元前 411 年，贵族寡头发动政变，残害民主派；接着在公元前 410 年民主派又推翻了贵族寡头政治。政局动荡，自始就影响战局，而且越来越严重。公元前 405 年，雅典与斯巴达两支海军大战于赫勒斯滂海峡的羊河河口，雅典经营数十年的海军全部覆灭。公元前 404 年，雅典被迫投降，投降条件要求：取消雅典海上同盟；自

---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 1978 年版，第 547—548 页。

同上书，第 563—564 页。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 1978 年版，第 516 页。

行拆毁一切从雅典到比雷埃夫斯的防御设施；除留 12 艘警戒船只外，把全部船舰交给斯巴达；参加伯罗奔尼撒同盟，废除民主政治。这些苛刻的条件，已把雅典的伟大和光荣全部抹掉，雅典从此变为二流国家。长达 27 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最终以雅典彻底失败而宣告结束。

#### (4) 雅典失败的原因与希腊文明走向衰落

雅典失败的原因。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一直政局动荡，貌似强大，内部矛盾丛生：奴隶主与奴隶的矛盾，自由民内部民主派与贵族派之间的冲突，主战派与主和派的争执不休，雅典与同盟国的纠葛等。这些矛盾在战争中都进一步激化了，奴隶纷纷逃亡，民主派执权得势则排斥贵族派，贵族派上台则残害民主派，尤其在处于战争关头两派相斗，战争没有相对固定的领导，没有稳固的后方，同盟者们又趁火打劫，造成分崩离析的局面，使雅典内耗严重，大伤元气，从自身内部加速了战争的失败。

斯巴达内部虽然也存在各种矛盾，但与雅典相比，政局则稳定得多，这让斯巴达可以放心腾出精力专门对付雅典。而且为了打败雅典，斯巴达不惜与波斯相勾结，以承认波斯对小亚细亚各希腊城邦的统治为交换条件，取得对方的金钱资助，用以建造舰队。本来斯巴达陆军力量又强大，这可谓给斯巴达虎上添翼。斯巴达没有发生像雅典财政严重危机的状况，军心稳定，斗志昂扬，军饷充足，加上正确的战略战术，让叙拉古在西西里拖住雅典主力部队，自己则围困雅典，长期占据和蹂躏阿提卡，让雅典远近为难，最终只好投降。

雅典采取的战略计划也是不够高明的。伯里克利在战争爆发前夕，就动员人民放弃土地和房屋，保卫海上的城市，让人们避开同伯罗奔尼撒同盟国家作陆战，而号召人们走向海洋、打海战。这是一个涉及全民的总体战略。但战争开始后，雅典并没有从全民备战出发，而是把农村拱手让给斯巴达，任其蹂躏。大量农民涌入城市，既无粮食，又遭瘟疫横行，给雅典人民带来灾难。而亚西比德在此道路上走得更远，他不主张去攻打直接的、最近的、最主要的敌人——伯罗奔尼撒同盟的首脑斯巴达，却去攻打与雅典关系不大而且远隔重洋的叙拉古，舍近求远，正如尼西亚所言，把主要敌人留在了后方。结果斯巴达攻入阿提卡，雅典疲于西西里和阿提卡两地作战，终于两地的军队几乎都全部覆灭，强大的雅典在日益窘困中死亡。

希腊文明走向衰落。伯罗奔尼撒战争给希腊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是空前的，正如修昔底德所言：“过去从来没有这么多的城市被攻陷，被破坏，有些是外族军队做的，有些是希腊国家自己做的；从来没有那么多的流亡者；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生命的丧失——有些在实际的战斗中，有些是在国内革命中。”如果说希波战争给希腊带来古典文明的繁荣，那么这次战争却给希腊带来衰落和危机。

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以后，各城邦间混战更是愈演愈烈，斯巴达的任意干涉各城邦的内政和推行其贵族寡头政治，日益激起各城邦的反抗。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取得了霸权，实际在战后又立刻丧失了霸权。日后，斯巴达、雅典、底比斯都为了本城邦的扩张，竭力争夺霸权，加剧了各城邦的混战。这样不仅加速了其它城邦的衰落，也加速了自身的日益衰落。到公元

前 4 世纪中叶，希腊各城邦的生命力已近枯竭，城邦本身的危机为马其顿的征服准备了条件。从城邦内部而言，城邦混战使大奴隶主大发横财，日渐豪富；而手工业者和小农疲于作战，荒废了自己的土地，土地被大奴隶主强夺，土地日趋集中，于是作为城邦制度基础的小农小土地私有制遭到破坏。作为公民兵制度基础的小农因纷纷破产沦为奴隶，公民兵制度也失去了基础。这是由于希腊本身各城邦混战不休，以及希腊世界存在着很牢固的城邦体制传统，以后历史的发展使命只好由别的民族来领导了。不久，北方的马其顿兴起，并侵入希腊，成了希腊世界的主人，希腊被包容进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版图之中。但是已经结出累累硕果的希腊文明反过来又征服了征服者本身，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实际上是在希腊文明的光环中发展前进的。

## 八、早期与共和时代的罗马

### 1. 罗马国家的形成与塞维军事改革

#### (1) 伊达拉里亚文化——罗马文明的源头

古代罗马国家的中心地区是意大利，它的地理范围包括意大利半岛及其南端的西西里岛，罗马城则位于半岛中部。

意大利最古的居民是利古里亚人。从公元前 2000 年开始，印欧语族陆续分批进入意大利，此后的青铜文化和铁器文化便以他们为主发展起来。他们从公元前 1800 年开始进入青铜文化时期，主要以特拉马拉文化（约公元前 1700—前 1100 年）为代表。特拉马拉文化发明了影响日后罗马城市和兵营设计的村落方阵布局，就是在一块四方形的土地上，用壕沟围绕，挖沟的土筑成围墙，围墙内房屋是枝条和粘土结构，建在木桩和堆起的平台上，房屋成排成行，直角交叉，进村要通过一座桥跨过壕沟。这种村落的建造显然经过了苦心组织。从前 10 世纪开始，意大利进入以维兰诺微文化（公元前 1000—前 500 年）为代表的铁器文化时代。大约从公元前 8 世纪，中部意大利的一些维兰诺微型的村落已开始发展为伊达拉里亚的城市和国家。

公元前 6—前 5 世纪是伊达拉里亚文化的鼎盛阶段，各地皆建立城邦，相传有 12 个城邦之说。他们采用希腊字母书写本族语言。在此期间，罗马城一再而再地受到伊达拉里亚人的统治。据罗马古代的传说。王政时代的 7 个国王中最后 3 位都属伊达拉里亚血统。现在考古发掘亦证明在公元前 550—前 470 年间罗马是个道地的伊达拉里亚城市，罗马修建了许多伊达拉里亚式建筑，伊达拉里亚的商业也在罗马占据垄断地位。即使到罗马共和初年，伊达拉里亚的统治也曾在罗马反复建立。这一切表明了伊达拉里亚文化对罗马国家的巨大影响。

#### (2) 罗马城的建立与王政时代

罗马人的祖先是属于印欧语系的拉丁人。当罗马人进入文明时代时，已开始了铁器时代。所以罗马军队一开始就是用铁制武器装备起来的。由于意大利半岛缺少良港，罗马人又不重视航海业，军队主要是由农民组成的陆军。海军是在罗马征服意大利向外扩张时才建立起来的。

大约在公元前 600 年，罗马人建立了罗马城。很快，罗马进入了传说中的王政时代，也就是罗马的军事民主制和国家形成时期。这时的国王拥有军政、司法、宗教等大权。国王在隆重的场合必头戴金冠，身着紫袍，手持鹰头权杖，坐于象牙宝座上。王的身边有 12 个侍从，手捧一束棍棒，上插斧头，此即著名的称为“法西斯”的权标，它象征着军事统帅的绝对权力，因而日后成为专制独裁的代名词。这种权标及整套仪仗皆源自伊达拉里亚。与此有关的另一影响深远的礼仪则是凯旋式的举行。当国王率军征战班师回城，必举行盛大的凯旋式：国王立于四马战车之上，亲率凯旋部队通过城市街道，直达神庙奉献牺牲，而群众则夹道欢呼，蔚为壮观，这种凯旋式在以后的共和国和帝国时期都照样举行，而且愈演愈烈，成为罗马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个传统内容。

#### (3) 塞维·图里乌斯改革与罗马国家形成

罗马奴隶制国家的形成是通过发生于约公元前 6 世纪的塞维·图里乌斯改革实现的。

据罗马历史学家李维所述，塞维·图里乌斯是拉丁城市科尔尼库鲁姆的一个被俘的贵妇之子，因受老塔克文夫妇的喜爱，从小被收养在宫中，长大后还被招为附马。老塔克文被刺死后，塞维便在岳母的帮助下登上王位。后来他注意争取民心，得到人民拥戴，王位渐趋巩固。

塞维为了适应当时社会发展和加强罗马实力的需要，首先废除原来按亲属关系组成的三个氏族部落，而代以四个城区部落，同时将罗马的乡村分为 15 个（或 16 个）乡村部落。凡在地域部落登记入册的自由民都获得公民权，同时承担服兵役和赋税等义务。

此外，塞维在建立新的地域部落囊括所有自由民为公民的同时，又对全体公民进行财产普查，在此基础上按照公民财产多寡和提供武器的能力划分了五个等级。据说，第一等级公民的财产资格为 10 万阿斯，第二、三、四等级的财产资格分别为 7.5、5 和 2.5 万阿斯，第五等级的财产资格为 1.1（或 1.25）万阿斯。低于五等级的最贫穷公民则为等外之人，被称为“普罗列塔里”（Proletarii），意即无产者。

随着五个等级的划分，也就相应地规定了每级负担兵力之数，当时军队以百人队（每 100 名战士组成的连队，拉丁文称之为“森都利亚”）为单位，每个等级出百人队之数不是按各级人口比例，而是按财力负担武器装备的比例，因而第一等级组成的百人队最多，包括 80 步兵百人队和 18 骑兵百人队，总数共达 98 个；其余二、三、四等级各出 20 百人队，第五等级则出 30 百人队。各等级百人队的半数由 17 至 45 岁的年轻者组成，另一半由 46 至 60 岁的年长者组成。另有 5 个非战斗性的百人队，其中工匠百人队 2 个，乐师号手百人队 2 个，最后一个分给无产者，让他们组建 1 个百人队。这样总共有 193 个百人队。

在百人队中，战士的地位是取决于财产状况的。第一等级中最有钱的公民在骑兵中服务而被称为“骑士”。这一等级中的其他成员应当有步兵的全套重武装（头盔、铠甲、护腿、盾牌、矛和剑），并且位于百人队的前列。其它各级的公民则依照自己的地位而拥有较轻的武装，在军队中占后面的地位。第四等级为轻装步兵，第五等级大概只有投石器等。

很明显，百人队组织制度起初是适应当时罗马对外扩张和战争需要而创建的。划分公民等级，首先是把服兵役者（五等）和不服兵役者（等外）加以区分。各等级的百人队配备不同的武器装备，都明显带有军事目的。工匠和乐师、号手单独组成百人队，他们在战争期间可能是分派到军队中担负专门性的工作任务。另外，当时罗马公民数量大大超过军队数量。也就是说，每个百人队实际上包括的公民人数要比作为军事单位的百人队包括的战士数目多得多。百人队不仅是军事训练和作战单位，而且还是征召公民军的基础。由于把平民纳入罗马公民队伍，公民人数的增加，兵源也随之扩大，这就为扩充和改组公民军，增强罗马的军事力量，创造了条件。

百人队组织制度的核心是百人队大会。这是以服兵役的五个等级的公民组成的大会。等外的无产者在总数近 200 票的大会中只有 1 票之权。开会以军号召集，会址设在城界以外的战神操场——马尔斯田野，因为按通例罗马城内不准召集军队。投票时也是列仗以呼喊表示同意或反对，每一百人队内以多数票决定意见。百人队大会不久由军事集会发展为政治性会议，成为罗

马的公民大会，代替了原先以胞族为单位组成的民众会——库里亚会议。

塞维的改革，作为他的本人主观意图，是为了加强王权，但他的改革措施却带有民主效果，平贵斗争有所缓和，人们经受了初步的民主洗礼。不久，罗马人在公元前 510 年驱逐了王政时代的最后一个国王小塔克文，翌年由百人队大会从贵族中选出两名执政官管理国家事务，从此罗马进入共和时代。

## 2. 罗马征服意大利半岛与罗马军团的发展

### (1) 兵民合一的罗马军团

罗马实行典型的兵民合一的公民兵制度。罗马公民从 17 岁到 45 岁须在野战军中服役，46 岁至 60 岁的公民在战时仍要去守卫后方。他们都是自备武装，战时出征，战后解甲归田。

罗马的兵民合一的典型性主要体现在百人队大会制度上。百人队大会既是公民大会，又是战士会议。实行兵民合一的公民兵制的斯巴达的公民大会也是战士会议，但斯巴达的战士没有依据财产资格划分为各个等级，仍是基于斯巴达人的血统关系上。雅典实行兵民合一，其战士虽也以财产资格为依据被划分为各个等级，但是他们的公民大会是全体公民的大会，不是战士会议。斯巴达和雅典的兵民合一制都没有罗马的典型和彻底。

罗马公民兵的基本组织和基本战术单位高度融结为军团。军团的数目、其中的人数及其作战方式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不相同。共和早期，罗马大概有四个军团。每个军团约有 4200 名重装步兵和一定数量的轻装步兵。其中，两个军团由年轻力壮的公民（17 至 45 岁）组成，担负出征野战任务；另外两个军团由年长的公民（46 至 60 岁）组成，战时负责卫戍后方和支援前线的任务。早期的军团按希腊——马其顿式方阵排列阵式。重装步兵按横列排成六行，每行 500 人，持精良武器者居前。两个军团的方阵往往并列，形成密集阵列，纵深八列，侧翼配置骑兵，轻装步兵散开列于主力队伍前面发挥作用并掩护两翼。由于这种方阵不适于复杂地形作战，不够机动灵活，难以顶住机动敌军的袭击，于是在公元前 4 世纪时卡米路斯改变军团阵式，放弃了方阵。

### (2) 向北意大利扩张

罗马建立共和国以后，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相当严峻。北方仍有强大的伊达拉里亚城市，如果罗马想不再受到伊达拉里亚人的统治，那么当时只有去征服他们；东部和南部还有经常入侵的萨宾、埃魁和沃尔斯奇人等山地部落。罗马为了征服这些山地部落和伊达拉里亚人，和拉丁城市缔结卡西乌斯和约，以便对付主要的对手。

公元前 5 世纪上半期，罗马通过持久的战争击败了埃魁人和沃尔斯奇人。接着，罗马对伊达拉里亚人发动进攻，主要与北方的伊达拉里亚城市威伊展开了三次战争，持续近一个世纪。

公元前 405 年，罗马第三次发动对威伊的战争，这场标志着罗马征服地中海世界的第一次明确的战争，在罗马传统中作为这个城市军事史的转折点而记录下来。

罗马对威伊进行了 10 年围困（公元前 405——前 396 年）。正是在这场战争中，罗马将军马尔库斯·卡米路斯在罗马第一次试行军饷制度，而在此

以前服军役是没有报酬的。罗马军团士兵每日约得 800 克谷物。出征时，发给士兵 15 日的粮食，有时甚至是 30 日。军团士兵亦可靠地方补给，这就使有组织的掠夺成为合法化。他还改进和统一武器装备，公民兵自筹武装参差不齐、规格不一会削弱战斗力的弊端得以解决。从此，公民兵出战可以从国家获得军饷、给养和规格统一的武器装备，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 2 世纪末的马略军事改革。

公元前 396 年，卡米路斯决定用地道攻城的办法攻陷威伊城。他命令士兵挖掘一条从城外通向城堡内部的坑道。军队被分成 6 个分队，轮流作业，直至工程完成为止。罗马从地道突然攻入城堡，出威伊人之不意，威伊陷落。罗马掳获了大量战利品而变得富有起来，又占领了几乎把它的领土总面积扩大一倍的版图，罗马强大起来。

当罗马刚刚站起来的时候，在公元前 4 世纪初，突然发生了一场战祸，险些使罗马覆灭。

公元前 390 年，罗马突然遭到从西欧和中欧南来的高卢人的侵袭。罗马投入了全部军队和来自临近拉丁城市的援军，在阿里亚与高卢人展开残酷激战，却终没有挡住勇猛的高卢人的攻击。罗马人被围困在卡皮托利乌姆卫城，最终因粮绝而被迫投降。高卢人也苦于军中疾病流行，同意和谈，在罗马人给付了一千磅黄金后撤离了罗马。

罗马幸运地从高卢人的侵袭下逃脱出来，保存了自己刚刚建立的城邦文明。当时的高卢人仍属于游牧民族，具有很强的作战机动性。其军队可以在敌方准备不足时迅速突击，也可以在形势不利时立即撤离。再加上游牧民族特有的勇猛和骠悍，使他们具有较强的战斗力，因此罗马人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很容易被高卢人攻入。但是由于游牧民族物质生产比较落后，仍处于半野蛮状态，一旦在对农耕民族的战争中取胜，必然会大肆掠夺、屠杀，甚至会用自己落后的生产方式攻变农耕的生产方式，摧残了农耕民族的文明。可是游牧民族往往在战胜农耕民族后，经常大捞一把而离去。高卢人在掳获了大量财物后离开了罗马。罗马虽然遭到了沉重打击，但幸运地保存了其文明，并且清醒了头脑，为提防高卢人再次入侵，他们修建起大约 12 英尺厚、24 英尺高的坚固石造城墙。最重要的是，罗马人在高卢战争后实行了根本性的军团改革，以实行三列队战法的中队军团取代原来的希腊——马其顿式方阵。

### (3) 公元前 4 世纪的军事改革

公元前 4 世纪的军事改革从卡米路斯实行军饷制改革开始，在整个公元前 4 世纪由多个人经过多次改革才完成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军团的体制改革。

首先，罗马的野战军团由 2 个增至 4 个，每个军团的重装和轻装步兵共 4200 人，骑兵 300 人。每个军团又分为 30 个中队，每个中队又分为 2 个百人队。每个百人队为 60 人或 30 人。在共和时期，中队是作战单位，而百人队只是一个小的战斗组织。军团的战斗队形改变了。罗马军团放弃了原来按财产资格配置兵种的办法，根据士兵的年龄、受训程度和战斗经验，把重装步兵排成三列：第一列是最年轻的战士，被称为哈斯塔提(Hastati)，即“枪兵”；第二列是由成年的有经验的战士组成，他们被称为普林西佩斯(Principes)，即“主力兵”；第三列是经过锻炼而最富有战斗经验的老兵

组成，他们被称为特利阿列 (Triarii)，即“后备兵”。其中第一、二列各有 10 个中队，每个中队配置 120 名重装步兵；第三列也有 10 个中队，每个中队只有 60 名重装步兵。各列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由于前两列是战斗队伍，所以彼此稍微接近。第三列是后备队，相隔稍远。此外，每个军团都配备 1200 名轻装步兵和 300 名骑兵，列队于军团的前面和两翼。这就是罗马军团著名的三列队法。

三列队法的作战方式通常是如下进行的：部署在军团前面和两翼的轻装步兵首先投入战斗，他们向敌阵发射箭支，投掷标枪、石块。当敌人逼近时便撤走，第一列枪兵投入战斗。如果第一列枪兵抵挡不住敌人的进攻，出现缺口，第二列主力军随即冲上来，第一列枪兵稍微退后与第二列主力军重新形成一条密集战线共同打击敌人。只有在前两列战士处于紧急关头，老练的第三列后备兵才加入战斗。这时战斗的最后结局往往取决于后备兵。从这里古罗马产生了一句谚语：“事情发展到后备兵了”，意即事情发展到最决定性关头了。

三列队法优于密集方阵。方阵只能适用于平地作战，遇到复杂地形就难以全线展开，阵线中有的地方互相拥挤，有的地方兵力疏散，易被攻破。而三列队法中，中队是独立的战斗单位，各列和各中队之间有一定间隔，这就使得各中队在战斗中较密集方阵具有较大的灵活机动性，适于任何地形作战，其阵线也较坚固。因此，这种军团体制直到公元前 2 世纪末的马略军事改革以前没有多大改变。

这时罗马在作战中鲜明展现了它的战术特征，就是设立防御营地。罗马军队随时随地驻扎都要挖壕筑墙，建立营地，避免敌人突袭，并可随时进攻。

罗马军队实行铁的纪律，军纪和服从高于一切，如有任何反抗，都要受到无情惩罚。如果违犯军令、临阵脱逃和表现怯懦，都要在军列前受鞭挞再砍头示众。如果整个部队怯阵脱逃，则实行“什一抽杀律”让士兵排成一横列，每 10 人抽杀 1 人。

在战场上立功的士兵可以晋级，获战功章，戴月桂冠。获得巨大胜利的将领可以率领得胜的军团实行凯旋式，借以鼓舞士气，激励作战。

公元前 4 世纪所进行的军事改革，保证了罗马在将要征服中部意大利的战争中取得辉煌的胜利。

#### (4) 逐鹿中部意大利

罗马人虽然从高卢人的铁蹄下侥幸解脱出来，但高卢人的入侵使罗马的国际地位动摇了。从前的敌人伊达拉里亚人、埃魁人和沃尔斯奇人都同罗马人重开战端。罗马人为了战胜他们，同他们连续进行了 50 年左右的战争。其中罗马首先经过近 40 年的战争，到公元前 4 世纪中叶才彻底打败了伊达拉里亚人。到公元前 338 年，沃尔斯奇人也被罗马打败，从此归从罗马统治。

到公元前 350 年，罗马人已获得足够的土地来满足当时罗马人拥有土地的不足，他们不再生活在少数入侵者威胁之下。然而，他们仍然四处扩张，他们的军队已变成征服的工具，战时出征、平时耕种的公民兵，由于经常出外作战，变成了事实上的职业军队。

罗马人向南拉丁姆扩张，与萨姆尼特人发生冲突。罗马人接连与萨姆尼特人发生过三次重大战争，从公元前 343 年至前 290 年，才最终将其打败。至此，北至波河流域，南到卢卡尼亚边境，全部中部意大利都在罗马统治之

下。

### (5) 皮洛斯战争与征服南意大利

萨姆尼特战争以后，罗马便和南意大利的希腊城市开始接触。公元前 282 年，罗马派军队以援助图里依为名占领了图里依，引起塔林敦的不满。当罗马舰队驶进塔林敦海湾时，塔林敦袭击了罗马军队。于是罗马派军进攻塔林敦。塔林敦遇到罗马军队的进攻，难以抵御，决定向伊庇鲁斯国王皮洛斯求助。

皮洛斯（公元前 319——前 272 年），是一位富有才能和胆略的军事家。他长于布置阵势，善于指挥战斗，巧于利用地利，堪称为一位卓越的战术家。就连伟大的汉尼拔都称他是仅次于亚历山大的战略家，自称是他的学生。

皮洛斯出身于伊庇鲁斯王族。幼年时，伊庇鲁斯发生了政变，其父被驱逐，从此他在伊利里亚和埃及避难，后来终于回国当上了国王。

他崇尚武功，有雄心大略。不以统治伊庇鲁斯为满足，时刻谋划着对外扩张。当与罗马人作战的塔林敦人邀请皮洛斯前去支援时，他决定借此机会，征服意大利、西西里，然后再挥师东进，征服巴尔干，建立一个囊括地中海的大帝国。于是，皮洛斯率领 2 万名训练有素的步兵、3 千名帖萨利亚骑兵、2 千名弓弩兵、500 名投枪手和 20 头战象，横渡亚得里亚海，于公元前 280 年开赴意大利，挺进塔林敦。

在离塔林敦海湾沿岸不远的赫拉克里亚城附近，皮洛斯和前来迎击他的罗马军队发生第一次会战。战斗之前，他先察看了敌情。面对罗马士气的高昂，队伍的整齐，他没有惊慌，沉着地指挥他的军队向前，并亲率 3000 骑兵冲锋在前。在战斗的关键时刻，皮洛斯的战象和帖萨利亚骑兵起了作用。因为罗马的战马没见过战象，当它们与战象相遇时，便吓得掉头狂奔。皮洛斯借机掩杀，大败罗马军。据说，在这次战斗中，罗马伤亡 7000 人，被俘 2000 人。

赫拉克里亚战役之后，皮洛斯挥师进军罗马，直抵罗马几十公里的地方安营。他自料罗马难以攻克，决定与罗马和谈。由于皮洛斯的声誉和罗马在战败中遭受的灾难，使罗马元老院中有部分元老认为在对罗马比较有利的条件下可以和谈。正在犹豫不决时，德高望重的阿庇乌斯·克劳狄命令他的儿子带他来到了元老院。他义正辞严地说，如果皮洛斯想要同罗马人订立和约，建立友谊，必须率军队退出意大利，然后派遣他的使节来和谈；不然，只要他的军队留在意大利的土地上一天，就不能同他进行和谈。他并以热情洋溢的演说鼓励罗马人的士气，改变了元老们的情绪。讨论结果，元老院拒绝了皮洛斯的和谈建议。

公元前 279 年 4 月，在阿斯库伦附近，皮洛斯与罗马进行了第二次大战。皮洛斯抢占地形，巧妙地布置阵势，而罗马人不能很好地发挥自己的威力，因此被皮洛斯战败。在这次战斗中，罗马伤亡 6000 人，皮洛斯伤亡 3500 人。

皮洛斯虽两败罗马，但他的处境并不令人乐观。罗马人力资源充足，又有拉丁同盟的支援；而皮洛斯的军队却得不到很好的补充，因其专横暴虐，塔林敦等城市对他的不满日益增加。皮洛斯不愿把与罗马的战争拖延下去，再次向罗马提出了新的谈判建议，但又遭到罗马元老院的拒绝。此时，罗马已经占领了南意大利许多城市，并又征服了投到皮洛斯方面去的卢卡尼亚人和萨姆尼特人。不久，在贝尼温敦附近，皮洛斯与罗马进行了最后一次战斗，

却被罗马彻底击败。皮洛斯只好在公元前 275 年秋，无可奈何地离开了意大利，回到了伊庇鲁斯。

由于罗马国内平贵斗争暂告结束，内部矛盾缓和，能够团结起来，无后顾之忧而一致对外。加上有充足的人力物力资源，还有同盟者的支持，本土作战不愁补给不足，于是最终取得了对皮洛斯战争的胜利。从此罗马能够全力以赴地对南意大利进行最后降服。很快，罗马攻陷塔林敦，又降服了以前投到皮洛斯方面去的南意大利诸部落：萨姆尼特人、卢卡尼亚人、布鲁提伊人和阿普里亚人等。

到公元前 3 世纪末，除波河流域仍为高卢人占领以外，意大利的其余地区全被罗马所征服并在其统治之下。

### 3. 布匿战争与称霸地中海

#### (1) 罗马军队装备的新发展

公元前 4 世纪时，罗马军队的武器有所改进，到布匿战争时武装发生重大变化。罗马重装步兵的主要武器是投矛和双刃剑。投矛长约 1.5 至 2 米，重达 4—5 公斤，以铁尖头安在木柄上，可投掷长达 30 米的距离。短剑长约 0.5 米，宽 4—7 厘米。每位士兵都要装备这两种兵器，与敌人相隔较远时实行标枪打击，离敌人较近时用双刃短剑展开白刃战，实行近身肉搏。

罗马人的主要防御武器是盾牌。在公元前 4 世纪初的高卢战争后，旧的圆形小铜盾被半圆筒形的大盾所代替，并一直沿用到帝国前期。重装步兵还有护身甲冑，主要由铜制头盔、胸铠和胫甲组成。有时战士还披有斗篷。

罗马军队装备的改进，保证了罗马人在不久将至的布匿战争中拥有了杀伤力和进攻性，从武装上保证了战争的最终胜利。

#### (2) 第一次布匿战争

战争的爆发。在征服意大利半岛之后，罗马走上由奴隶制大国变为帝国之路。当时西部地中海的强国迦太基成为罗马走上帝国之路的第一个目标，于是罗马与迦太基进行了一个多世纪的争霸战争。因为罗马人称迦太基人为布匿人，所以这场争夺西部地中海霸权的战争被称为布匿战争。

迦太基位于非洲北岸今突尼斯境内，其工农业较发达，商业、海运尤为发达，迦太基船队经常穿梭往来于地中海南北岸各地，它的舰队在质量和数量上都远远超过任何西部地中海的势力，这为迦太基海军的强大提供了条件。

利用充足的资源，迦太基建立了一支拥有海军和陆军的强大军队。陆军装备精良，是职业雇佣兵；海军拥有 50 支桨的战船几百艘，每船配备水兵 120 人。不仅有三列桨舰船，而且有巨型的五列桨舰船。公元前 3 世纪以前迦太基曾牢牢掌握着从叙拉古到塔林敦的西部地中海海域。

公元前 265 年，叙拉古派兵包围墨萨纳城（在西西里岛东北端）。城内的意大利雇佣兵分成两派，分别求援于迦太基和罗马。迦太基捷足先登打败了叙拉古，控制了墨萨纳。罗马不能眼看墨萨纳落入迦太基手中，进而控制整个西西里，封闭地中海，于是在公元前 264 年，罗马派军队渡过墨萨纳海峡，迫使迦太基军队后撤，占领了墨萨纳城。于是迦太基立即又派一支远征军收复失地并向罗马宣战。罗马元老院又派出一支部队去加强占领军。这样

就正式爆发了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第一次布匿战争。

公元前 263 年，一支强大的罗马军队沿西西里东海岸南下，直抵叙拉古城下，把叙拉古围得水泄不通。叙拉古被迫同意与罗马结盟，这大大便利了罗马军队的进一步军事行动，他们在西西里东南部继续推进，切断了迦太基人同海峡的联系。为了对付迦太基人的反扑，在公元前 262 年罗马军队又将阿格立真坦团团围住。经过一场恶战，罗马攻城部队进城后洗劫了这座城市。

罗马取得初步胜利，控制了西西里东部和东南部的广大地区。但战争的胜负远未确定，因为迦太基的舰队还未受到攻击，在罗马没有海军的情况下，迦太基可以利用海军进行回击，封锁西西里和意大利海岸，断绝罗马军队的后路，置罗马军队于绝境。为了争取最后胜利，罗马必须作出巨大的努力和牺牲，来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

创建海军。当时的罗马是个农业国家，只有农民组成的陆军，而没有海军。罗马要想在与布匿人的战争中获胜，要想称霸地中海以至建立帝国，只有必须由一个陆军强国变为一个全面发展的陆海军强国。罗马人很快在南意大利希腊人技师的帮助下，建立起一支包括 120 只舰船的大舰队，有 3 万多个划桨手。为了迅速建成一支舰队，在造船的同时，罗马人加紧在陆地上训练划桨手，让他们坐在板凳上练习划桨。在希腊人的帮助下，一支新的海军很快就要出现在地中海中。

罗马年轻的海军在海战技术上显然无法与老牌海军强国迦太基相比。罗马人为补己之短，制彼之长，发挥自己陆军强大的优势，在舰船上发明了吊桥战术。那就是在每只舰船的舰首安装一种前端装有抓钩、两侧装有栏杆的吊桥，前进时竖起系在桅杆上，当接近敌舰时放下，吊桥前端的抓钩便像乌鸦嘴一样钩住敌舰的甲板，使两只船连接在一起，这时罗马步兵如履平地般的从吊桥上冲过去，在敌舰的甲板上展开肉搏战。这实质上是在海洋上进行陆战。罗马人由此把自己的陆军特长得以发挥，从而导致在海战中反而处于有利地位。

公元前 260 年，罗马舰队和迦太基舰队在西西里岛北面的米列海岬展开了一次大海战，罗马军队用上述桥舰第一次打败了迦太基舰队。罗马又利用舰队进攻科西嘉岛和撒丁岛，公元前 259 年在撒丁岛附近再次打败迦太基舰队。

迦太基人在陆上和海上失利以后，退到西西里西部，凭借那里的海军要塞固守，战争出现了相持局面。罗马人看到在西西里迅速取胜是不可能的，便决定进攻迦太基本土。公元前 256 年，执政官塞占卢斯和曼利乌斯率领 230 艘战舰，载着 4 万名步兵，远征非洲，第一次布匿战争进入第二阶段。

进军迦太基。罗马舰队由墨萨纳出发，在西西里南岸的埃克诺穆斯海峡附近遇上了由 350 只船舰组成的迦太基舰队。迦太基人决定让他们的中军佯退牵着罗马人的鼻子，他们准备两翼包抄。罗马的中军虽然已入圈套，但侧翼却通过钩船和铺板拦住了敌人的包抄。而中军又果断突围使自己脱身出来，回到原位，打垮了靠着海岸的迦太基舰队的左翼。在这次海战中，罗马的桥舰再次发挥了威力，大败迦太基舰队，迦太基损失 100 艘船舰，罗马只损失 24 艘。罗马军队在迦太基东面的卢克佩亚登陆，进展顺利，屡败迦太基军队，一直进抵到迦太基城不远的地方。

迦太基迅速征集了新的雇佣军，大败罗马军队。公元前 255 年，载着残余军队的罗马舰队在返国途中又遭遇风暴袭击，使罗马远征军几乎全部覆

没。

罗马取得胜利。战场重新回到西西里，罗马人重建了舰队，在公元前 251 年攻下了西西里北岸的主要城市帕诺尔穆斯，把迦太基人一直挤到西西里西部。

公元前 247 年，西西里的迦太基军队改由精干的哈米尔卡尔指挥，但他已不能挽回败局。不久罗马又迅速发起攻势，终于占领了迦太基人在西西里的最后据点利里拜乌姆和德瑞帕努姆。公元前 241 年罗马又在一次海战中打败了迦太基舰队。

连续 23 年的战争使迦太基精疲力竭，只好与罗马议和。罗马也感到财匮力乏，便与迦太基签订和约。和约规定迦太基向罗马割让西西里及其与意大利之间的其它岛屿，十年内向罗马赔款 3200 塔兰特。这样，第一次布匿战争以罗马的胜利告终。

### (3) 第二次布匿战争

迦太基的战前准备与萨贡杜姆事件。第一次布匿战争并没有彻底解决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矛盾。罗马虽然扩大了地域范围，得到了巨额战争赔款，但还没有掌握对西地中海的控制权。而迦太基并不甘心失败，它的经济政治力量并没有被摧毁。它利用其丰富资源，轻易偿付了战争赔款，迅速从战争灾难中恢复了过来。因此，爆发新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迦太基在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以后不久即开始为新的战争进行准备。在公元前 237 年派曾在西西里指挥作战的哈米尔卡尔率军去西班牙，恢复和扩大在那里的地盘，以弥补在上次战争中的损失，并为未来的战争准备进攻基地。

公元前 228 年，哈米尔卡尔战死，其女婿哈斯德路巴尔成为继承人。哈斯德路巴尔在西班牙建立“新迦太基”城，成为迦太基在西班牙的主要据点，附近巨大的银矿又为迦太基提供了丰富的财政来源。

公元前 221 年，哈斯德路巴尔被人杀死，哈米尔卡尔的长子、年仅 25 岁的汉尼拔成为继承人。

汉尼拔是古代的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少年时期就在他父亲和姐夫的培育下，受到专门的军事和外交训练。他 9 岁就随父从军出征西班牙，后又成了哈斯德路巴尔的助手。多年的军旅生活，不仅丰富了汉尼拔的军事知识，而且培养了他的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为他后来掌握兵权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汉尼拔自幼就有非凡的抱负，立志要为国家干一番事业。长大成人后，决心用武力打败罗马，征服意大利，雪洗迦太基战败的耻辱。据说，当汉尼拔还是一个少年时，就在他父亲的命令下，跪在神坛前宣誓说：“长大成人后，一定要成为罗马不可调和的对手。”在他看来，迦太基经过长期备战，已有足够力量战胜罗马。

公元前 219 年，汉尼拔完成了对罗马人作战的一切准备后，攻占了罗马在西班牙的同盟者——萨贡杜姆城。

萨贡杜姆陷落后，公元前 218 年春罗马派以费边为首的使团去迦太基交涉，要求迦太基把汉尼拔当作和约破坏者引渡给他们，否则要承担一切后果。

罗马历史学家李维是这样描述罗马使团在迦太基元老院进行交涉的最后场面的：迦太基人拒绝了罗马人的要求，这时费边撩起长袍前襟，作了个褶，

说道：“这里我给你们带来了战争和和平，你们喜欢什么，就挑吧！”他的话得到了同样高傲的回答，说他喜欢什么，任他给。当费边放下长袍，宣布给他们战争的时候，所有在场的人一致回答说，他们应战，并且将以应战时的同样决心进行战争。

于是罗马正式对迦太基宣战，第二次布匿战争开始了。

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当时罗马的计划是，兵分两路：一路由执政官塞姆普罗尼乌斯·隆古斯率领，从西西里进攻迦太基本土；一路由执政官斯奇比奥率领，从西班牙登陆，以便牵制汉尼拔的军队，使其不能援助非洲本土。但是，汉尼拔却以惊人的胆略，准备进攻意大利，在敌人境内作战。

他认为从海上进入意大利太冒险，因为自从第一次布匿战争以后，迦太基再也没有取得制海权。汉尼拔选择了极难越过的欧洲最高峰阿尔卑斯山这条路线。这条路线的优点，在于罗马人意料不到会有来自这方面的进攻。罗马海军当时守在沿海，陆军集结在南意大利，准备进攻非洲。他们认为，迦太基人是不可能越过阿尔卑斯山的。

公元前 218 年春，汉尼拔率领由 9 万步兵、12000 名骑兵和几十只战象组成的军队从新迦太基城出发，开始了对意大利大规模的军事远征。部队沿着西班牙东部向东北部方向挺进。罗马人由于对汉尼拔的进军意图认识不足，拖延了出征西班牙的时间。当普·斯奇比奥率军从海边到达罗丹河口时，汉尼拔已经进抵那里，并且迅速渡过了河，然后溯河北上，躲过罗马军队的拦截。斯奇比奥悟出了汉尼拔的进军意图，便派自己的弟弟格·斯奇比奥率军继续去西班牙，自己则率一部分军队迅速上船，赶回意大利。

这时，汉尼拔经过长途跋涉，于 9 月初到达阿尔卑斯山麓。当时已近寒冷季节，山中的隘路已经有了积雪，加上阿尔卑斯山山高坡陡，道路崎岖难行，行军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汉尼拔以惊人的毅力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终于在公元前 218 年 9 月末，率领疲惫不堪的军队走出深山，到达意大利北部波河上游地带。此时，汉尼拔只剩下 2 万名步兵、6 千名没马的骑兵和一头战象了。

波河首战和特拉西美诺湖大捷。汉尼拔的突然出现，使罗马大为惊慌，元老院不得不放弃侵略非洲和西班牙的计划，集中兵力保卫意大利，命令斯奇比奥在波河左岸迎击敌人。但波河左岸已被汉尼拔占领，斯奇比奥只好命令军队守在波河右岸，等待第二支军队的到来。

塞姆普罗尼乌斯率援军到达后，就迫不及待地渡河与汉尼拔决一雌雄。双方兵力相当，各有 4 万人左右。罗马人把步兵摆在中央，骑兵分在左右两翼，以保护步兵。针对罗马人的战术，汉尼拔用他的战象对付罗马骑兵，用他的步兵对付罗马军团。罗马人首先发起冲锋。但罗马人的马匹一见到战象，吓得队伍就马上乱起来，并开始向后逃跑。罗马步兵迎上去用长矛刺伤它们，把迦太基步兵逼向后退。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汉尼拔立即命令他的骑兵出击，从侧面包抄敌人。失去骑兵保护的罗马步兵顿时慌乱起来，并开始向后撤退。这时，埋伏着的迦太基军队从后面包抄过来，切断了他们的后路。在两面夹击之下，罗马军队全线崩溃，只有塞姆普罗尼乌斯带着 1 万名步兵冲出包围圈。

这次战役，罗马损失惨重，4 万军队只有 1 万人生还。而迦太基军队只伤亡 400 人，充分显示了汉尼拔的军事才能。

公元前 217 年春，汉尼拔秘密进军，他选择通过伊达拉里亚的道路。此

路段有一片沼泽地，汉尼拔艰难地率军渡过了它，绕过了罗马新任执政官弗拉米尼乌斯布下的防线。弗拉米尼乌斯完全没有料到汉尼拔会选择这条进军路线，只好连夜尾追，却在特拉西美诺湖中了汉尼拔设下的埋伏。

特拉西美诺湖在伊达拉里亚中部，湖北岸是一个三面环山、只有一面临湖的谷地，汉尼拔在通向谷口的隘路上设下了埋伏，把骑兵安排在隘路入口处。在谷地出口处的山峰上又配置了轻装步兵。汉尼拔亲自率领步兵占据着与湖平行的高地。

公元前 217 年 6 月 21 日，天刚拂晓。罗马 4 个军团近 30000 人，鱼贯进入谷口。当时浓雾笼罩着整个湖面和峡谷，追击者没有经过认真侦察就进入山谷。汉尼拔及时发出进攻信号，顿时伏兵四起，迦太基军队向罗马军队的两翼和后卫发起突然猛袭。罗马人根本来不及进行任何有组织的抵抗。战斗不到 3 个小时就结束了。罗马损失惨重，执政官弗拉米尼乌斯战死，15000 人阵亡，几千人被俘。只有 6000 人冲出敌人阵线，跑出谷地，但在汉尼拔军队的追击下只好缴械投降。汉尼拔区别对待俘虏，命令将俘虏中的罗马士兵全部带上枷锁，而对无罗马公民权的其他意大利人则立即释放，不取赎金。汉尼拔十分注意利用罗马和意大利各同盟之间的矛盾，目的在于孤立和削弱罗马。

罗马实施拖延战略。汉尼拔踏上了通向罗马的大道，罗马紧张起来，立即采取紧急措施：一方面加强城防，一方面任命费边为独裁官，统一指挥军事行动。然而汉尼拔并没有直接向罗马进军，因为他知道，以他现有的兵力不可能拿下罗马，因此按照原先的设想，在意大利土地上纵横驰骋，蹂躏意大利土地，打击罗马的有生力量，同时采用区别对待的手法以图瓦解意大利同盟，孤立罗马。这样，他在特拉西美诺湖大捷后，没有立即挥军南下进攻罗马，而是向东来到亚得里亚海岸，在那里补足给养以后再向南进入阿普里亚。

罗马独裁官费边就职后，率领 4 个军团急速向阿普里亚进发。

费边出身于贵族名门，据普鲁塔克说，他从小个性温顺，人称“奥维库卢斯”，意即“驯良如羔羊的人”。他曾于公元前 218 年率使团前往迦太基，交涉汉尼拔攻打萨贡杜姆一事。费边当选独裁官后，率军在阿尔皮赶上汉尼拔。但他不与汉尼拔决战，而是尽可能与汉尼拔周旋，避其精锐，不和汉尼拔发生正面冲突，而是紧紧跟在其后，拖住汉尼拔的军队，消耗其给养和兵力，同时伺机打击敌人，使其陷入困境不能自拔。这就是他采用的使他闻名史册的拖延战略。罗马帝国史学家阿庇安曾对此作了如下描述：

“……非比阿（费边）紧紧地追随着汉尼拔，但是他不跟汉尼拔交战，虽然汉尼拔屡次向他挑战。他小心地监视汉尼拔军队的行动，他把军队靠近汉尼拔，使汉尼拔不能围攻任何市镇。当这个地区资源已经耗尽的时候，汉尼拔开始缺少粮食。所以他又穿过这个地区，每天把他的军队列成阵势，进行挑战。但是非比阿不来应战……非比阿和以前一样，监视汉尼拔，防止汉尼拔劫掠乡村。他不以全部队伍作战，而只截断他的散兵，因为他很清楚地知道汉尼拔不久就会缺乏粮食的。”

费边当时采用这一战略应该说是相当正确的。汉尼拔的军队战斗力强，特别是他的骑兵更优于罗马骑兵，但他是孤军深入，缺乏后援；罗马军队虽

然几度失利，兵员伤亡也大，但他们是在意大利本土作战，人员和给养补充都比较容易，时间、地理对他们有利。在这种情况下，罗马只要注意保存实力，援助同盟城市，帮助他们自卫，使他们不倒向汉尼拔一边，就可使汉尼拔的军队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只要再能抓住有利时机，消耗敌人的力量，迫使汉尼拔陷入欲战不能、欲胜不成的境地，侵入意大利的迦太基军队最后就会像燃尽的篝火一样自行熄灭。

基于这种战略指导思想，费边率领罗马军队尾随汉尼拔后面，敌人驻扎他驻扎，敌人拔营他拔营，小心谨慎地与汉尼拔保持一定的距离，牵制住敌人，使汉尼拔不敢贸然分散兵力围攻城市。

费边的拖延战略在军事上是比较稳定的，但在政治上却包含着巨大的风险。罗马的战争威力不仅在罗马本身，而且是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意大利的同盟城市在人力、物力上对它的支持。汉尼拔率领军队在意大利境内驰骋，可能动摇意大利同盟城市对罗马的忠诚，从而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同时，汉尼拔蹂躏的主要是意大利广大农业地区，战争的拖延引起了农民的不满。这种不满情绪一天天增长起来，人们讥讽地称费边为“孔克塔托尔”，意为“迟疑不决的人”。

康奈会战。公元前217年底，费边6个月的独裁官任期届满。新当选的执政官瓦罗在越来越高的要求迅速结束战争的呼声中决定改变战略，主张速战速决，一举结束这场战争。

公元前216年8月2日，罗马与迦太基军队在康奈展开了大会战。

参加会战的罗马步兵在数量上大大超过敌人，计8万人，而汉尼拔只有4万人。但汉尼拔拥有14万名骑兵，而罗马只有6000名。

罗马军队开到康奈附近的平原上，布成阵势。罗马士兵总共排成了3行，每行之间有个小间隔。精选的重装步兵以密集队形摆在中心。骑兵放在步兵的左右两翼：右翼是罗马公民组成的少数骑兵，左翼主要是意大利联盟的骑兵。罗马想以步兵的强力冲击突破敌人的阵线。

针对瓦罗的战术，汉尼拔采用两翼包抄战术，布阵成中间向前突出的半月形。中间突出部分是较弱的步兵，精锐步兵部署于两翼，再将骑兵分署两侧。

战斗首先由罗马步兵发起猛攻，汉尼拔军队在罗马人压力下顺势向后退却，半月形遂向相反的方向弯过去，以致迦太基的中间凸出战线竟变成凹进去了。罗马步兵由两侧向中间汇合进攻，越是深入地楔入敌人的队列，他们的纵队也就越加从两侧向内收缩而变长。罗马人的左右两侧都是汉尼拔的精锐步兵。汉尼拔的骑兵亦相应出击罗马骑兵，对罗马军队形成了包围圈。陷入重围的罗马军队混乱一片，失去了战斗能力。结果，罗马人几乎全军覆灭，而汉尼拔仅仅损失6000人。

罗马转败为胜。康奈战役以后，罗马一时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同盟者纷纷倒戈，南意大利的许多城市都投到汉尼拔方面来了。罗马总结了失败的教训，重又回到费边的战略上去，谨慎行动，避免和汉尼拔发生大会战，努力保卫余留地区，支持继续忠于罗马的城市，惩罚倒向汉尼拔的城市，破坏汉尼拔的补给，消耗他的有生力量，并设法切断汉尼拔同本国的联系。

公元前212年，罗马军队开始转守为攻，围攻卡普亚。汉尼拔率军前来救援，但两次都未能解围，卡普亚不得不向罗马投降。

公元前209年，费边率军攻克塔林敦。在这次战役前，费边派一支军队

进攻塔林敦以东的布林狄西乌姆，然后乘汉尼拔赶去增援之际，从海陆两路一举将塔林敦团团围住，经过数天激战，拿下该城。据说事后汉尼拔对费边的韬略慨叹不已，并说他已经相信，要占领资源、人力如此丰厚的意大利是不可能的。

汉尼拔在意大利的处境每况愈下。迦太基政府对他心怀疑忌，一直没有给他什么真正的支援。他又曾寄希望于留在西班牙的两个弟弟的支援，但是他大弟弟率领援军进入意大利后却被击溃。公元前 210 年，罗马又打败汉尼拔的另一个弟弟玛戈，占领了西班牙。

公元前 204 年春，罗马军队在普·斯奇比奥的率领下，从西西里出发进攻非洲，第二次布匿战争进入最后阶段。迦太基形势危急，只好召汉尼拔回国救援。汉尼拔只好含恨撤离转战 15 年，没有遭受过一次重大损失的意大利战场。公元前 202 年，在扎玛，汉尼拔和斯奇比奥展开会战，汉尼拔有生以来第一次被打败。迦太基被迫求和，于公元前 201 年签订了和约。和约规定迦太基只能保留非洲本部的土地，不经罗马允许不得和邻国作战，除保留 10 只船舰防止海盗袭击外，必须交出全部船只和战象，此外还得交出 100 名名门子弟作人质，50 年内向罗马赔款 10000 塔兰特。第二次布匿战争就这样以罗马再次战胜迦太基而结束了，从此罗马成为西地中海地区最强大的国家。

#### (4) 第三次布匿战争

东方战争。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以后，罗马立即利用东地中海各希腊化国家之间的矛盾，走上了向东方扩张的道路。

公元前 197 年，罗马和马其顿在北希腊的辛诺塞法利发生激战。马其顿军队手持长矛，排成密集方阵闯进罗马人的左翼，以排山倒海之势把它击溃。但是罗马军团的右翼向马其顿的左翼发动猛攻，把它击退。这时，马其顿的左右两个分队开始相互错开，出现缺口，右翼在前而左翼在后。罗马军队趁机用右翼的一部分兵力包抄马其顿方阵右翼的后卫。结果，马其顿密集方阵由于不能及时掉过头来应付侧翼的进攻，在罗马军团的双刃短剑前败下阵来。曾经不可一世的马其顿方阵在罗马军团面前显得笨拙、被动，失去了效力。

后来，马其顿、希腊被迫接受了罗马的统治。紧接着经过公元前 190 年的马格尼西亚的会战失败后，叙利亚也失去了独立。罗马把东地中海沿岸广大地区纳入了自己的版图，建立了对整个地中海四周广大地区的统治权。

罗马侵入迦太基。第二次布匿战争虽然摧毁了迦太基的军事力量，但是它的经济力量并未受到多大影响。半个多世纪以来，迦太基注意发展农业和工商业，迅速从战争创伤中复苏过来，重又成为一座繁荣的城市。

迦太基的迅速复苏引起了罗马的忌恨和不安。老加图就把迦太基看作罗马贸易上的竞争对手。公元前 153 年，他曾率一个使团去非洲，看到迦太基的繁荣景象，回来后每次在元老院发表演说时，最后总要加上一句：“我认为迦太基是必须摧毁的！”

在公元前 149 年，罗马向迦太基重又宣战，派出 8 万步兵、4000 骑兵和 600 艘船舰组成的军队在两位执政官率领下攻打迦太基。

迦太基居民日夜赶造武器，修筑工事，贮存粮食，妇女们甚至剪下自己的头发搓成绳索。当罗马军队来到城下的时候，城市已经牢固地设防。罗马军队包围了城市，但是城里有充足的粮食贮备，城外有部分野战军策应，海

岸也没有被封锁住，迦太基人坚持顽强的斗争。罗马军队连续围攻两年，没有能够拿下城市。

迦太基的陷落。公元前 147 年，普·斯奇比奥的养孙斯奇比奥·埃弥利阿努斯率援军来到非洲。他整顿军队，加强训练，规定每个士兵所应携带的必要装备，并对多余的、成为军队累赘的车辆、驮畜及其它军需物资作了坚决的处理，并对迦太基实行严密的海陆包围，断绝了迦太基同外界的联系，致使城里发生了饥馑和瘟疫。

公元前 146 年春，罗马军队对迦太基发起了最后攻击，从一处防守薄弱的地方进入了城里。迦太基人进行殊死的抵抗，巷战进行了六天六夜，终因众寡悬殊，被罗马人攻进卫城。

根据罗马元老院的命令，5 万被俘的迦太基人全部被卖为奴隶，城市也被付之一炬，大火一直烧了 15 天，然后被夷为平地。

这样，第三次布匿战争以迦太基城的被摧毁为结束。此时，罗马不仅完全占领了西部地中海，还占据了东部地中海，整个地中海成为罗马的内湖，罗马迅速变成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

#### 4. 罗马兵源危机与马略军事改革

##### (1) 罗马出现兵源危机

罗马实行“出则为兵，入则为民”的公民兵制度。起初，公民们去从军，怀着强烈的爱国心和维护国家利益的自觉性与责任感，可长期的对外征服扩张战争，使他们变成了事实上的职业军队。大征服的胜利，罗马奴隶制度得以充分发展，奴隶劳动开始在社会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受奴隶劳动的排挤，加上频繁战争的破坏和高利贷的盘剥，自由农民纷纷破产，失去土地，沦为无产者，丧失当兵资格。据统计，公元前 164 年参加选举的公民达 372022 人，到公元前 136 年降至 317933 人。公民人数的下降意味着有资格服兵役的人数减少，造成兵源不足，军队补充困难。公元前 171 年至前 169 年，公元前 154 年至前 151 年，罗马都出现过新兵补充不足的情况，到格拉古兄弟改革前，征兵甚至扩及 17 岁以下的未成年男子，可见问题的严重。

在军队素质上，长期作战的公民兵在社会经济和商品货币关系膨胀发展的情况下，也滋长着对财富的贪求，发财致富开始成为他们参战的主要目的。战时掠夺战利品，战后出卖战利品，使军营里充满了随营商贩、奴隶贩子、各类经纪人和乌七八糟的人物。这些人的到来，破坏了军纪，损害了战斗力，降低了军队素质。这在第三次布匿战争期间已经很明显了。第三次布匿战争开始以后，罗马军队围攻迦太基久攻不下，据阿庇安记载，这是因为“军队里完全没有纪律和秩序，……士兵们惯于闲散、贪婪和劫掠”，他们更“像是一些强盗”。

军队兵员补充的困难和战斗力的下降，对罗马国家的发展产生了致命的影响。此时，罗马复杂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奴隶纷纷起义，被征服地区居民反抗罗马统治的斗争正在兴起。这一切都要求罗马从数量上和质量上加强军事力量，以确保内部安定并巩固对地中海地区的统治。统治阶级中部分有识之士已经觉察到问题严重，开始采取措施改变现状，以求军队有足够的补充和强大的战斗力。

第三次布匿战争后期的罗马军队统帅斯奇比奥·埃弥利阿努斯，在公元

前 147 年主持对迦太基作战。他竭力在军队中恢复纪律和秩序，清理腐蚀军队的无用之人，对士兵严加训练，鼓励他们首先要克敌制胜。他的努力终于很快结束了旷日持久的战争。

公元前 133—前 121 年，格拉古兄弟也挺身而出实行更广泛的改革。阿庇安清楚地意识到这次改革的目的是为国家取得战斗力，使罗马“有许多勇敢的士兵去征服世界上其他地区”。提比略·格拉古制订土地法，想通过限制贵族占有过量土地并给失地农民分配份地的办法来恢复小农经济，从而保证有充足的兵源。盖乌斯·格拉古更进一步制订同盟法，提出“给意大利人以同等的罗马公民权”，使军队有更充裕的来源，他还制订军事法，禁止未滿 17 岁者入伍，由公款供给士兵衣着，保证军队的战斗力和提高士兵待遇。但当时小农破产已成必然发展趋势，城邦基础已经动摇，企图恢复独立的小生产经济来保证兵源和提高军事力量已不再可能，旧的适合于城邦制度的兵农合一的公民兵制已经过时，格拉古兄弟改革在贵族的反对下也宣告破产。

公元前 111 年，非洲努米底亚国王朱古达掀起反罗马战争，罗马对朱古达宣战。可罗马军官接受贿赂，士兵出卖武器，军纪荡然，士气涣散，战争伊始便屡遭失败。公元前 109 年，执政官麦特鲁斯到达非洲，接收的竟是“一支软弱、懦弱、无力面对危险和困难的军队”，“毫无纪律和约束”，“营地没有设防，军营没有巡逻”。麦特鲁斯对军队进行了整顿，但战争仍然拖延不决。

这时，麦特鲁斯的部将马略许诺尽快结束战争，赢得了罗马骑士和平民的支持，当选为公元前 107 年的执政官，受命主持指挥朱古达战争。从此开始，一直到公元前 101 年对日耳曼人战争结束，马略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增强罗马军事力量，提高罗马军队的战斗力，史称马略军事改革。

## (2) 马略军事改革

盖约·马略（公元前 157 年——前 86 年），出身于地位低微的农家，自幼少受教育，早年投身行伍，后又投身政界。长期行伍生活，使他深知军队弊端；参与政治活动的经历，启发了他对社会问题的认识，有助于他不顾传统断然采取行动。他的改革解决了罗马军队的危机，摆脱了共和国面临的困境，却又促使罗马逐步从共和走上帝制之路。

以募兵制取代征兵制。马略实行新的募兵制度，取消了公民兵制的征兵制，放弃传统的财产资格限制，吸收志愿的无产者入伍。《朱古达战争》一书的作者塞琉斯提乌斯说，鉴于符合财产资格的人员不足，马略“不再按照祖先时期形成的等级，而允许任何人志愿参军，其中大部分是无产者”。普鲁塔克对此也有类似记载：“胜利当选之后，他便立即着手征集军队，与法律习惯相反，他把许多穷苦和贫贱的人编入军册”。

募兵制的实行打开了无产者志愿进入军队的大门，基本上解决了兵源问题。不过，采用募兵制后，义务的公民兵制度并未立即废除，直到公元前一世纪时，志愿兵并不总是能满足需要，往往仍需辅以强制征集。

固定军饷制的实行。军饷制的实行开始于公元前 4 世纪的卡米路斯军事改革，由国家发给士兵报酬，并由国家提供统一的武器装备。马略改革实行募兵制，士兵脱离生产，无法自养自给，为保证士兵的生活，马略不但规定了士兵可获得薪饷，而且可以从国家获得武器给养，并不在军饷中扣除。步兵每年军饷为 120 狄纳利，百人队队长加倍，骑兵则为 2 倍。而且士兵在

每次战争后分得的战利品数目更相当可观，因此农民尤其是无产者纷纷志愿参军。

士兵服役期的延长。在公民兵制度下，士兵服役是义务，罗马公民战时服役，平时则解散回家种田。只要跟邻邦处于和平状态，就不需要存在军队。共和早期，战争规模小且在家园附近作战，军队一般夏季出战，秋冬春返回家园生产。虽然国家规定 17 至 60 岁的公民均有义务承担军役，实际上参加过 16 次（或 20 次）出征即可免役；倘是骑兵，只需服役 10 次。这样一来，罗马公民往往未入中年便已解除军役。公元前 3 世纪后，长期对外扩张战争，军团不能每年解散重建，要求士兵长年离家服役，但在布匿战争期间平均服役年限也只 7 年。而募兵制实行后，士兵服役年限增加到 16 年。与此同时，马略的改革措施规定老兵服役期满后可以从国家分得一块份地作为补偿。先前占有土地方可服兵役，现在要想获得土地就必须先服役，服兵役却成了获得土地的前提。这正表明马略的改革措施是独立小农破产的必然结果。

虽然马略建立的是一支职业军队，但还不能认为是完全意义上的常备军。后来奥古斯都都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正式的常备军。

罗马军团的再改革与发展。为了使军队更加机动灵活地作战，马略对罗马军团组织又加以改革，创建了联队制的军团结构。联队是介于军团和中队之间的组织，每个联队为 600 人。每个军团建有 10 个联队，共 6000 人。每个联队辖 3 个中队，每个中队 200 人。两个百人队（各为 100 人）组成一个中队。联队制的特点是每个联队能够单独执行作战任务，独立进行军事活动，因而更富有灵活性。联队士兵一律为重装步兵。每个军团还配备有一定数量的、来自同盟者或行省的骑兵和轻装步兵。

在阵式排列上，联队制的军团仍实行原来的三列队法。10 个联队按四、三、三配置，以传统的五点形排成。也就是第一列为 4 个联队，第二、三列各为 3 个联队。前后列的各个联队相互错开，以便交叉挡住前列空隙，使军队作战力量更加密集，更富有冲击力，而又能够机动灵活。

联队制的军事组织，在帝国前期时稍有变化，但基本上一直维持到三世纪。

整顿军纪，加强训练。罗马军队历来以军纪严明闻名于世，同时，罗马军队也非常注意进行奖励以表彰军功，培养军人的荣誉感。但到公元前 2 世纪以后，军队开始腐化堕落，军队日趋松散，到朱古达战争时更为严重。马略组建新军后，加强整顿军纪，严格训练，使士兵闻风而动，令行禁止，大大提高了军队战斗力。他教育士兵懂得，“倘若逃跑就要被捕或被杀，只有武装才能保卫自由、国家和父母，并且获得荣誉和财富”。因此，马略的执法严格、赏罚分明，立刻就立竿见影，效果明显。

马略还对士兵严格训练，以提高他们的作战能力。在训练中，他着重训练军队适应环境，让士兵适应北非的酷热缺水，能使士兵惯于长途行军以对付远距离的日耳曼人。马略还要求士兵熟练掌握工兵作业，军队每到一处，均可根据需要做到修建运河，安营扎寨，保证军队有充足供应，并能让士兵安心等待作战时机，以免匆促作战。

马略的军事改革结束了罗马使用公民兵的古典城邦特色的历史，开创了罗马依靠雇佣兵维护其统治的先河，对罗马确有起死回生之效。

从此，军人以奉命作战为职业，服役期长达十余年。奴隶主国家也不必

为小农衰微影响兵源焦虑，军人服役期满可分得土地，与战争中掳获财物的老兵组成了地方上的小奴隶主阶层，成为了奴隶主政权的一个社会基础。

但是，职业化的军队长期追随其军事头领，容易成为将领的私属部队，造成“将可私兵”的后果。在罗马共和晚期内争激烈之际，拥有自己军队的将帅往往成为政治舞台上的决定性力量，军队遂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内争转为内战。这样造成反元老派借助军队建立军事独裁的帝制，也造成军人的跋扈，军队为自身利益而混战不休，人民饱受杀戮劫掠之苦，这种兵灾在帝制建立初期的太平盛世虽不多见，但在帝国后期却成为罗马社会的一大痼疾。

可是，在共和晚期和帝国初期，马略的军事改革确实挽救了罗马向前发展的危机。马略改革建立的军事组织制度，不仅适合共和国的需要，也适应了帝国的要求，基本上一直维持到3世纪。后来，奥古斯都曾对军队进行改组，使职业军队更适合元首制的需要，从而最终“完成了把罗马军队变为常备的正规军的事业”。

